# 燃灯者

赵越胜

# 读越胜《燃灯者》——代序

张志扬：

第一代人辅成先生是将人类知识奠基于人道的楷模；

第二代人宾雁先生是将政治救赎奠基于人道的楷模；

第三代人唐克则是来自知识的另一极要求在理性规范中伸张感性权利的人性欲求者。

如此三代人的创伤记忆编织成了一曲“人道颂”的勋伯格式变奏，它演奏着演奏者的巴黎夜曲，像Gabriel Faure的Après un rêve（《梦后》）。

然而，我读三篇文字，与其说读三代人，不如说读越胜兄弟。除了唐克，宾雁先生和辅成先生相继辞世——薪尽火传，记忆文字所燃烛者，不正是“火传”的仪式吗？

“人道”，越胜是接纳我“从个人尊严的辩护到思想自由的辩护”的第一人。但在我们之间重要的还不仅仅是文字、思想，而是印在心底里的感觉。

从81年到89年越胜去国前，几乎隔年我都要去北京，一般都要在越胜家小住两天。84年去旅顺参加全国首届电影学会成立大会，回来路过北京就为了看越胜。是时，大女儿蓓蓓才几个月。越胜为了在晚上同我聊天，特意把摇篮搬到我的房间让蓓蓓睡在旁边。半夜，蓓蓓哭醒了，我看见你高大的身躯一手抱着刚数月的蓓蓓，一手拿着奶瓶给蓓蓓喂奶。喂完了奶，你两手抱着怀中的婴儿，摇着，轻轻地唱起勃拉姆斯的摇篮曲。你们父女摇动的身影就这样在我眼前融化到摇篮曲中去了……13年过去，97年冬天我在巴黎又见当年的情景，不是蓓蓓，而是盈盈，以致我感慨，你胸中有多少柔情滋润着童贞般的心田啊——你怎么会老！

去国17年，你第一次回到北京，我从海南赶到北京见你。到北京已是下午三点。放下行李，亚平、张雪立即带着我，说是去“救越胜”。原来越胜和哲学班的老朋友喝酒喝过了头，还有原来工厂的一大帮师傅等着哩。救出了越胜就往师傅们聚会地赶，仍然晚到四个小时。一进门，热气腾腾，越胜像一滴水珠溶入了沸腾的锅炉。直到饭桌上，越胜在敬酒之前，对自己的晚到，硬是下了大礼，跪在桌前向师傅们谢罪！

……

孔夫子修诗从心所欲不逾矩：“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有素为绚，无素则糜。人，何尝不是。

2009年12月7日于海甸岛

朱正琳：

小说《1984》中那位“思想警察”对那位受审的“思想罪犯”宣称：“不！……我们对你所犯下的那些愚蠢的罪行并不感兴趣，党对那种公开的行为并不感兴趣，思想才是我们所关心的全部。我们不仅要摧毁我们的敌人，我们还要改造他们。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我以为，这话确实表达了人类世界中最狂妄的一种意图，绝非作者奥威尔凭空杜撰。曾几何时，那种意图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几近获得成功，而且至今也还远不能说它已遭挫败。我于是一直在想，在那种蓄意制造的暗昧笼罩下成长起来的我们，何以也曾得见光亮呢？

越胜写了三个曾经给他带去光亮的人物，并称他们为“燃灯者”，至少部分地回答了我的这一问题。薪火相传，这我原先也是知道的，有人也曾点亮过我心中的烛。然而我还有一问：那火种是怎样得来的？读越胜文，我终于是想明白了：人类这个物种自来有“盗火者”在。“盗火”并非普罗米修斯一次就完成了的行为，人世间每一次火的传递，都是一次传递双方共同进行的“盗火”。不是吗？越胜笔下的三位“燃灯者”，连同越胜本人，其实也都是“盗火者”。

在我的心目中，刘宾雁先生是鼓荡天地正气的志士，周辅成先生是守望普世价值的哲人，都是我仰之弥高的人物。但越胜写出了他们的寂寞，这让我得以和他们亲近。他们的寂寞，远离了孤高自许的文人情怀，直接滋生于一种肝胆照人的热切期盼：期盼着暗昧中有别的人也能得见他们所见到的光亮，期盼着那光亮能普照世人。

唐克其人更像是我的弟兄。年龄相仿，经历相似，并且都曾在同一种窒息中努力挣扎过。只不过在那场抗争中，他比我更为勇敢也更为敏锐一些。是他让我确信，“盗火”的事件并非只发生在奥林匹斯山上。他为越胜手制了一个改善音响效果的音箱，显然是想让越胜更真切地尝到“禁果”的本味。这也就罢了，他还在那个音箱上贴了一个当时几乎无人知晓的日本东芝牌商标！老实说，我真愿意成为他的同谋。我相信思想警察们当年若是看到了这个音箱，一定会觉得那个商标亮得刺眼。如其不然，多年后喇叭裤、蛤蟆镜怎么还会一度成为“精神污染”的标志？

言及此，不由想起1989年8月19日在匈奥边境上的那场“泛欧野餐”。正是那场民间发起的跨国“野餐”活动，引发了东德人取道匈牙利的越境大逃亡。成千上万的人跑啊跑，终于跑垮了柏林墙！二十年过去了，欧洲人每年8月19日都会聚集到当年突破边境的地点，纪念那场盛大的“野餐”。而我今日才恍然大悟，那是“盗火者”们的狂欢节啊！ 我记住了：人类历史上真的出现过那样的时刻，“盗火者”们竟像蚂蚁一样跑得满地都是！

2009年11月23日于贵阳

周国平：

越胜平生最爱有四，曰音乐、书、政治、朋友。把政治列在其中，实在勉强得很，他不过是作为一个草民，只在也只想在台下喊几声罢了。朋友聚在一起，他常慷慨评点时局，疾恶如仇。他真正所爱的是正义，但正义乃一抽象名词，和其余具体名词并列未免抵牾，我只好用政治一词代替。

其实，音乐和书两样，他也只想在台下。音乐不用说，不管发烧友到什么级别，明摆着今生不会做作曲家、歌唱家、演奏家了。书这一样有点奇怪，他嗜书如命，又写得一手好文章，却总是十二分地抵触出书，写了文章传给朋友一读，就　　此了事，从不肯结集出版。在所爱的四样中，他好像认定自己的位置是第四样，做音乐的朋友、书的朋友、正义的朋友，在这三样上都无意登台亮相。

所以，现在他愿意出这本书，我甚感惊喜，这个倔头终于让了一步。看内容，三篇文章都是写朋友的，而同时又是通过写朋友写了音乐、书、正义，唐克、周辅成、刘宾雁三位分别是他的音乐、书、正义之爱的“燃灯者”即启蒙人。因此，由这本书，我们看到的既是他对朋友的赤忱之情，也是他的精神生长的心路历程。

在所写的三位中，我只和周辅成先生略有交往。1995年，先生到巴黎，我也在那里，同住越胜家里。1997年和2000年，我先后两次随张雪到朗润园拜访先生。2005年，先生出面息讼，我应召去见先生一次。在先生家里，先生拿出我的书，赞誉有加，我当即惭愧万分。我出了一些通俗的书，没有多少学问，一直不敢献丑，怎么想得到先生自己买了，还仔细读了。先生对我厚爱，但在息讼一事上，我拂了他的好意，令他伤悲，我深感歉疚又无奈。先生每次谈话，声如洪钟，激情澎湃，正气凛然，哪里像一个耄耋老人。直到生命最后一息，在先生的血管里流着的始终是年轻人的热血。

先生是热情的，也是寂寞的。最后一次见面，先生赠我一册书，竟是一个打印的文集，我心中一痛。参加先生的追悼会，看到的场景相当冷清，我心中又一痛。晚年之作无一家出版社肯出，追悼会无一个北大官员肯到场，先生真是寂寞极了。可是，在这样一个只爱金钱和权力的时代，爱智慧和正义如先生，寂寞就是必然的了，这正是先生的光荣。

哲人已逝，现在读到《辅成先生》，方知我对先生了解得太少太浅。文中引述的先生许多话，何等睿智，何等痛快。我本来是可以有许多亲聆教诲的机会的，却因为疏懒而错失了。

回到越胜的这本书，最后我想说：既然你已经开了一个头，索性就继续下去，从此在出书一事上不要太倔了。我的无私的理由是，好文章就应该让更多的人读到，你不能只给我们这几个老朋友吃偏灶，而对许多你不认识的文化美食家的精神饥饿无动于衷。我的自私的理由是，你的清高给了我们这些文章不如你却挺乐意出书的人很大压力，使我们觉得自己像是俗物似的。再那么倔，于义于情都说不过去吧。

2009年12月28日于北京

徐友渔：

越胜在这本书中讲述了三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三个年龄不同的人，既是师长，又是知己，陪伴、指引和支持着他穿越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黑暗，使得孱弱、卑微的生命有了光明和暖意。这样的事情决非偶然和例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类似的故事到处都有，因为，人生活需要光，而生活中总是有光，哪怕黑暗以红太阳的名义妄图压倒光明。

一九六六年年中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大陆陷入空前的灾难，一代年轻人精神上的愚昧、狂热、野蛮暴露无遗，这当然不是出于中国人天生的劣根性，而是斗争哲学和个人迷信产生的恶果。但人性的强韧无时无处不在，与文革发动者想要塑造一代“革命新人”的愿望相反，反思、探索、反叛的火苗到处冒出来，而且，倒行逆施越疯狂，反弹力越大。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文革的大破坏、大混乱打破了以前严密的控制，禁书到处流传，不同地位、阶层、职业和年龄的人相互接触和交流，异端邪说或新思想通过各种渠道，以难于想像的速度传播。

越胜是幸运的，他在思想探索的道路上遇到了良师益友，没有为自己的离经叛道付出什么代价。事实上，在七十年代，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因为思想探索遭到镇压，有的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有的赔付了青春年华，贻误了终身前途。格外有运气的是，越胜得到了周辅臣先生这样的名师点化，得以直接沿着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正道行进，不像很多探索者那样在意识形态的浓雾中艰苦挣扎、曲折前进，耗尽了全身力气还是未能挣脱那精神上的紧身衣，为自认为叛逆的思想弄得精疲力竭、伤痕累累，其实是孙悟空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越胜是很感性、重情义的人，他首先是喜爱一个人，然后才喜爱那个人信奉的思想。他的运气还在于，招他喜欢的人在情与理两方面是统一的而不是脱离或分裂的，所以，对于他来说追求真理和享受友谊是同一个过程，暗夜中的灯火带给他足够的温馨。

越胜书中记载的三位师友中，两位长者——周辅臣先生和刘宾雁先生——已经逝去，但他们的音容笑貌通过越胜的文字将永驻我们心中，他们的光和热将永远照亮和温暖我们。

2009年12月于北京

陈嘉映：

我认识的人里，有文才的不止一二，但这样的回忆文章，我想只有越胜写才好。越胜不止于对人好，与朋友人交，交心；越胜与朋友交，完全没有自我心，他做，做得比别人多，却没有任何东西要表现。惟此，友人的情态，友人的天光云影，得以挥洒展现。不说长他几年的唐克，在7路无轨电车站依依不舍分手的周辅成老先生，在一起泡热水澡交换恋爱故事的一代英杰刘宾雁，偏这个没有自我的越胜有这福分！

有时候会觉得，那个时代的高人俊士，没有越胜不认识不深交的。文中偶一出入的高尔泰、张志扬、曹天予、周国平，还会有多少故事等着越胜写。“我爱真理，但我更爱朋友”，越胜当年如是说。其实，爱人，才能爱真理，才有真理。越胜写唐克：他撇嘴道：“谁画了，我自己买票看的。”语气大有二奶扶正、穷人乍富的得意。在越胜笔下，没有丝毫挖苦，倒让局外读者对这个中国“路上派”先锋唐克又添一份爱意。

三位传主都是奇人异人，他们带着那段异常的历史出现在我们面前。那是个险恶的时代，惟因此，友情来得特别真，特别重。那是个贫苦的时代，倒仿佛因此，人不得不有点儿精神。刘宾雁的坦诚，是每个认识他的人都立时感受得到的，坦诚自是一种优秀品质，但只有在那个时代，只有经历了宾雁所经历过的那么多思想者的苦难之后，坦诚才会闪耀那样奇异的辉光，散布那样温暖感人的力量。越胜心里，这段历史浓重得排解不开，惟在这种“历史感”的簇拥下，他笔下的人物才那样饱满。

这种历史感，并不止是感觉，它培育出正大的判断，只举一例：

“人们常说宾雁是‘青天’。这或许是苦难者习惯的幻象。其实，没有哪个称谓比它离宾雁更远了……作‘青天’的前提是和统治集团保持一致，当‘自己人’……宾雁是站在‘草民’和‘无权者’一边的……宾雁的劳作就是要消灭制造青天的土壤，让民族中的个体成为自由的有尊严的个体，从而让民族成为自由的有尊严的民族。这是权势集团不能容忍的。”

这三篇文章，实不只是纪念友情，不只是对已逝时代的缅怀，它们始终在吁请我们思考自己，思考我们这个尚未结束的时代。

2010年1月于香港

梁治平：

越胜嗜书，然甚惜墨，有文章，必为佳作。故此，我对越胜的文章总有双重的期待：希望他多写一点；俟篇成，必欲先睹为快。

过去这一年，接连读到越胜数篇新作，其中就有“忆宾雁”和他记年轻时友人唐克的这篇。八月，越胜携家人回京，朋友聚会时，他说到当时已经写作过半的“辅成先生”，更为没能在辅成先生离世前完成此文而倍感遗憾。十月，稿成，越胜即以之传示友朋。越胜作文，或因朋友之请，或为朋友之故，他最想知道的，也只是朋友们的意见。既然不为发表，这些文字便有几分私人的味道。然而，作者所记述的人和事，蕴涵的，却是这个时代的大悲大喜，几代人的生命经历。这样的文字，是不应当只在朋友的小圈子里流传的。

读毕“辅成先生”，我即函复越胜，略云：

此前读你写唐克的那篇，觉得写得很精彩，写宾雁先生的，则笔调深沉，情感浓郁，此篇似又深一层，描写更细而用意愈深。相信任何人读毕此文，都会对周先生纯真而高贵的人格肃然起敬，对他身上体现出的一代中国知识人出于中西古典文化熏陶的价值情怀深怀敬意，而这些东西，现在已经逐渐淡化，甚至为人所遗忘。但这也正是此文重要处。能够代周先生剖白心迹，而将其理想和追求记录、传达于后人，令其薪火不绝者，这是第一篇也是最具分量的文字吧。周先生有你这样的忘年知交，可以感到欣慰了。我读大作时也在想，这样的文字不可只在朋友的小圈子里面流传，甚至也不应该只在海外出版物上刊出，那样太可惜了，而且也失去了她原有的意义。

这些文字终能公诸世人，诚为读者之福。

越胜在信里说，他有意将此集题为《燃灯者》，又解释说：

燃灯者在佛家是指片语可开悟人的觉者。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皆可为燃灯者。辅成先生、宾雁不用说，是燃巨烛之人，而唐克小子亦是我的燃灯者。

不消说，越胜也是我辈友朋、读者的燃灯者。犹忆八十年代，越胜与一班朋友问学论道，砥砺思想，终至开创一番事业，引领一时知识风潮。那几年，大约也是越胜“入世”最深的一段。不过，即便是在那时，越胜仍然保持着一份逍遥。他淡泊的心性，温润的友情，对古典文化的追慕，和对趣味的好尚，在朋友中间最具魅力。他家的小客厅，总有朋友满聚，煮酒吟诗，纵论古今。还有他筹划的那些令人难忘的出游：攀古长城，踏夕阳残雪，水中泛舟，月下放歌，……山水之间，也是我辈精神滋养之所。

八九年，越胜去国。悠悠近二十载，世事丕变，人事亦然。这期间，我数度往巴黎。再见越胜，他率性依旧，爱家人，重友情，劳作之余，以音乐、诗歌为伴，说到读书，依然眉飞色舞，不改其乐。只是，他差不多与写作绝缘。不过，我知道，他心中的火焰从未熄灭，这些文字可以为证。我读这些文字，在莞尔与凝重、欢悦与沉郁之间，又被一次次地感动和启悟。读者诸君，也会有同样的经验吧。

2009年岁末记于北京西山忘言庐

# 辅成先生

*美德都是庄严宏大的。庄严，在实质上与慷慨一致，在形式上与勇敢一致。——托马斯·阿奎那*

我受教于辅成先生始自一九七五年底。当时我是北京“小三线”兵工厂一个开磨床的小青工，整天猫在怀柔深山沟里，忙着给红色高棉造40式反坦克火箭筒和72式反坦克地雷。而辅成先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著名教授。我与先生天南海北，两不搭界，怎么会有了师生缘份？其中故事要从头讲起。

## 一

七五年六月底的一个早晨，车间书记戴五正师傅到车间来，悄悄告诉我，昨天厂里接到通知，今年有一个去北大哲学系读书的名额。我一听，心直跳，这正是我朝思暮想的事啊。戴师傅说，碰到几个厂里中层干部，都说，肯定是你们车间小赵去了。七十年代初，毛泽东指示“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各个单位闻风而动，纷纷成立“工人理论队伍”。随后就有“六本书”的名单：《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我是车间工人理论小组组长，负责给师傅们辅导这些马列著作。六本书中《反杜林论》和《唯批》是哲学著作，在那些仅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工人师傅看来，这玩意儿纯粹天书。但是理论学习的形式绝不能缺。于是每周都有半天经典著作学习时间。我在台上讲，师傅们在台下睡，真可谓“聒噪与鼾声齐飞，唾沫与涎水同流”。也有几位从五机部机关下放到厂里的干部，文化程度比较高，有兴趣听我的辅导，常常给点儿鼓励。所以说起要送人去北大上学，便想到了我。

经过一个多月的基层推荐，领导讨论，最后的结果是我“名落孙山”。找戴师傅问究竟，他同情地告诉我，在我的人事档案中，有记大过一次的处分，所以政审没通过。这事得从去年夏天说起。

工厂宿舍对面山崖下有一深潭，潭水清洌，是个游泳的好去处。酷夏午休时，我们常在潭中嬉水。厂里的小兄弟都是北京来的七O届初中毕业生，自小穿惯三角泳裤，到山里依然如故。山村里的农民小伙下河都穿及膝大裤衩，三角泳裤在他们眼里等于赤身裸体。偶有村儿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从旁经过，我们这些人就有了调戏的嫌疑。那天中午，厂里的弟兄们又去游泳，有几个村儿里的小伙儿就站在河边骂。我正躺在岸上晒太阳，听他们用怀柔土话骂得有趣，便学着他们的腔调和水里的哥们儿开玩笑。大家嬉笑一阵，谁也没当回事儿。

下午上班时，我刚走到厂门口的水泥桥上，路旁猛冲出几条壮汉，扭住我双臂，大

喊“就是他，学俺们农民，带队部去！”边喊边扭着我往村里走，当头便碰上了来上班的众弟兄，拦住问究竟，言语冲突间便动起手来。村儿里的小伙儿固然身强力壮，但不如工厂的弟兄身手敏捷，交手片刻，已见有三两农民倒地不起。在壮汉的夹持下，我挣扎着抬起头，见“发小”嘉浩正从山坡上飞奔过来，身边又钻出小个子李志刚，上手推胸，下脚使绊，扭着我胳膊的壮硕青年便跌入河中。厂头儿跑出来劝阻，但人仍越聚越多，混战一团。大约半个小时战斗结束，有几个农民弟兄不知被何人下狠手，板儿砖拍昏，急送怀柔县医院。

这下子事闹大了。沙峪公社报怀柔县，怀柔县报北京市，定性为“破坏工农联盟的集体斗殴事件”，市委责成市机械局严肃处理。于是召开全厂大会，厂长高凤岐宣布给我“记大过”的处分。我不服气，找厂长理论，高厂长一席话让我哑口无言：“厂里给受伤的农民赔偿，轻伤800块，重伤1600，你赔得起吗？”结果就是档案中装进了记大过处分书，从此“底儿潮”。这次推荐上大学，档案就发挥了威力。知道政审没通过，我彻底绝望。在中国，档案就是一个人的命根儿啊。想想今生怕是再无出头之日，心里郁闷到极点。

盛夏时节，山中雨水充沛，林木绿色逼人，冬天干枯的溪流又喧腾起来。河道曲折处，水石相激，静夜远闻，隐隐若有歌吟。年轻时人不经事儿，心情苦闷便意志消沉，坚持多年的读书计划也停顿了，常与好友瓦宁携薯干酒半瓶、鱼皮豆一包、手风琴一架，倘佯林下溪畔，抚琴放歌。一次薄暮时分，俩人高卧青石之上唱得正酣，忽见一条两尺青蛇窜出密草，随琴声婀娜起舞。不知几次夜半扶醉而归，戴师傅严斥我放浪形骸。但我仍不知歧路而返。

九月初，弟兄们见我终日闷闷，便提议去登慕田峪长城散散心。清晨出发，踏着朝露，沿崎岖小径登山。道旁杂花缭乱，野香醉人。秋梨、山楂、苹果，艳黄、殷红、青紫相间，织成满眼的斑斓。一行人穿行林中，手脚并用攀岩，中午时分，古长城已在脚下。三十几年前的慕田峪还不是旅游点，古城墙大半坍塌毁损，一身岁月的苍凉，静卧在褐榻翠衾之间。登山顶烽火台眺望，远天紫纱轻幔，若沧海浩淼。峰峦间雾霭纠缠，如群岛隐没波涛间。长城随之起伏，分割关山一线。

京畿一带本是古幽燕之地，想陈子昂登台“念天地之悠悠”处就在近旁。在这天地雄阔浑涵之间，我身心如经大涤，止不住鼻酸眼涩。前几日尚觉性命攸关的失败，今日看来，不过鸡零狗碎。世界何其美好，人生何其诱人，少年心事岂能囿于尺寸得失。于是，向群山顶礼，欣欣然下山归去。

回到厂里已是晚饭时分，戴师傅急冲冲地在食堂找我，把我拉出买饭的队列，说有好事。厂里又有一个上学的名额，市机械局要办一个专职哲学进修班，老师都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这次不用再讨论，就让你去，你小子可别给我丢脸。我喜出望外，忙不迭地谢他，随后窜出食堂去找我的小弟兄们。当晚大家把这个月的菜票全凑出来买了散装啤酒，狂饮一场。月底把全部家当扔上一辆“大解放”，我一路烟尘地回到了北京。

## 二

一九七五年十月五日上午十点，一群来自北京市机械局各个工厂的“理论骨干”集合在德胜门城楼下，一辆大轿车把我们送到清河镇小营，原北京市机械学校。我们的哲学进修班就办在这里。全班约四十余人，年纪最大的四十多岁，最小的大概就是我了。由于我们都是来自工人阶级队伍，学校便没安排学工、学农、学军等活动，只是读书。课程有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自然辩证法、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经典著作选读。学习时间安排得很满，大课后分组讨论，也有单独的阅读时间，可以静心读书。

七五年，社会政治气氛紧张，清河小营倒真成了世外桃源。学校周围是大片农田，晚饭后，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总要漫步绿野，谈古论今。班里同学大都根红苗正，属于热爱毛主席、“志壮坚信马列”的一族。我们几个人就稍显异类，常品评时政、交流消息、关注上层权争。青年人说话口无遮拦，一次散步时，大谷放言“人民日报上登的东西，百分之八十是假的”，竟被人告发，甚至成立专案组，调查我们这个“小集团”。

按照课程安排，十一月份要开西方哲学史课了。教马列基本原理的陈楚余老师说，西哲史要由北京大学的“权威”来讲。说起“权威”，就让人联想起“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顶帽子。我却偏对这类人有好感，觉得既是“学术权威”，不管是什么阶级的，必定是有学问的人。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是我们经典选读课的重点。后来知道真弄哲学的人，没人拿这书当严肃的哲学著作，在当时却奉为经典。无论如何，这部书毕竟涉及身心关系、时空概念、意识与知觉、认识与存在等哲学基本概念，所以总想把它读通。何况列宁在批判波格丹诺夫、马赫、贝克莱时，涉及到了西方哲学史的重要范畴。顺藤摸瓜，也会探到有价值的知识。比如在讨论先验论时，必然牵涉到康德。我那时正死啃他的《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的译文佶屈聱牙，读来读去不得门径，总觉如坠雾中。听说有“权威”来给我们上课，心中就有企盼。

十一月初，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班主任韩老师走进教室，很郑重地告诉大家，今天西方哲学史开课，请北京大学周辅成同志给大家上课。片刻，进来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先生。他就是中国伦理学界的泰山人物，北大哲学系的周辅成教授，那时公开场合都称“同志”。

先生中等身材，微胖，身着一件四兜蓝制服棉袄，已洗退了色儿，有点儿发白。脚穿五眼灯芯绒黑棉鞋，头戴一顶深棕色栽绒双耳棉帽，步履轻捷，无丝毫老态。先生走上讲坛，摘下棉帽放在讲台上，露出短发皆白。白发不甚伏贴，有几簇支立着，先生也不去管它。我好奇，以往心目中的“权威”，大半和“高帽儿”、“挂牌”、“喷气式”有关，但见眼前这位老人温文尔雅，便仔细观察。先生长圆脸，肤白皙，丰颊阔额，眉间开，目光澄澈，鼻梁高，鼻尖略收，唇稍厚，下颌浑圆，表情开朗安详。

先生开口讲话，普通话中有川音，说受学校领导委派，来向工人师傅汇报学习心得。又说马恩和列宁本人都精通西方哲学史，所以要学好马列原著非有西哲史知识不可。几句简略的应景话讲过之后，先生从一只黑色人造革手提包中拿出一黄旧的厚本子，里面密密地夹着一些纸条。先生打开本子，转身开始板书：“古希腊哲学，第一节，米利都学派与希腊早期朴素唯物论思想”。先生讲得深入细致，旁证博引。每引一条文献，先生都会站起来板书。

有时会把整段引文全部抄在黑板上。我印象最深的是先生指出米利都学派的要旨是以物质性的存在来推断世界的构成。对米利都学派三哲，先生给阿那克西曼德的评价最高。先生以现存残简和哲学史家所论为据，指出阿那克西曼德已经开始用抽象的语言表述存在的单一性、万物的运动性和对立面的冲突。先生提醒我们注意，这些看法在初民的原始意识中，是以神话和诗歌来表现的。在这个意义上，米利都学派是第一批哲学家。

在先生的引领下，我惊异于希腊人的奇思睿智。先生只手为我们推开一扇窗，它面对着蔚蓝色的海洋。先生娓娓的讲述让我兴奋，希腊先哲的智慧令我神往。这群人物，既是沉思冥想的先哲，又是嬉笑玩耍的孩童，像泰勒斯，为了向人证明哲学家如果愿意也能挣钱，他预计来年橄榄会有好收成，事先包租下全城的榨油机，而大发利市，尽管他声称，他的乐趣并不在此。

教室里极安静，同学们都在认真记笔记，只听见纸笔摩擦的沙沙声。先生每要擦掉前面的板书，总会停下来问，同学们都记下了吗？然后用力抹黑板。板擦上的粉笔灰沾满双手，先生便不时地轻拍双手，但总也拍不净，有时想轻轻掸掉身上的白粉，反在蓝棉袄上又添白印。先生连续讲了一个半小时，屋里很暖，先生又穿着厚厚的制服棉袄，加上不断板书，渐渐地额头上有了汗意。先生不经意地用手去擦，不觉在自己的额头上留下一道淡淡的白痕。我坐在教室后面，远望着先生勉力的样子，心里隐隐被某种东西触动着，是什么？一时也说不清。以后在与先生的漫长交往中，才渐渐悟出一点儿。

课间休息时，先生去教研室稍歇，随后便回到走廊里燃起一支烟。那时先生吸烟，一个人站在袅袅轻烟中，有点落寞的样子。同学们忙着对笔记。我素来不大重视笔记，关键处记二三笔提示了事。见先生站在那里抽烟，便想过去搭讪，心里头打着私下请教的小算盘，想或许能把读书不通处拿来就教于先生。心里犹豫着，脚步却朝先生挪动。那时我烟也抽得凶，下意识地从兜里掏出烟，似乎有点儿向先生借个火儿的意思。先生大概看穿了我的把戏，反迎着我走来。表情有点严肃，却很和蔼地问，今天讲的有什么地方不清楚吗？我紧忙回答不，没有，我是想问您一些问题，但不是关于希腊哲学的。先生有些不解，今天不是刚开始讲希腊哲学吗？你的问题是什么？我说是关于康德的。先生喔了一声，似乎扫了我一眼，我觉先生眼中精光一闪。这时几个同学也走过来和先生说话，谈的是今天课上的内容。休息时间一过，同学们回到教室，先生又开始讲课。第一天的西哲史便以米利都学派的三哲之一，阿那克西米尼同质不同量的宇宙构造说结束。同学们鼓掌致谢，我当然鼓得最起劲儿。先生向同学轻轻一躬，便走出教室。

我们随后拥出教室下楼准备吃饭。见先生站在楼前台阶下，正等车送他回家。我快步趋前向先生招呼，先生说你刚才要问的问题今天来不及谈了,下周来上课，你可以把问题写个条子给我，我看看准备一下再回答你。我惊奇先生的谦谨，对我这么个“基本上是文盲”（父亲语）的毛头小子的问题，先生还要准备准备？后来才知道这是先生一生修学的习惯。车来了，我顺势拉开车门，扶先生上车。午饭时，几个要好的同学聚在一起，都很兴奋，大谈先生的课。班长庆祥摇头晃脑地说，看看，这就叫言必有据。确实，在我们这些心

在高天而不知根底的同学少年，这是第一次亲炙高师。先生的课让我自识学海无涯，工厂里混出来的那点不知轻重的小得意实在浅薄。

过一周，先生又来上课，第二讲从赫拉克利特一直到巴门尼德。先生有意把这两人放入一个单元，这样可以结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赫拉克利特的赞扬来反观巴门尼德的思想。先生认为赫拉克利特实际上是把人当作自然界的一部分来观察，可以称得上是个自然的一元论者。他从自然界的变动不居推论世界本质是永恒的变易，我们可由此推广至人类社会也充满了变易。对立面的斗争与统一是这种变易的表现形式。当时我理解先生是想借此打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以符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陈述的原则。那时我尚不知道毛泽东的《矛盾论》大半借用苏联党校的哲学教科书，所以免不了衷心敬佩毛主席他老人家是位深思雄辩，纵接希腊，横贯东西的大哲学家。

课间休息时，我把准备好的字条交给先生。我的问题是因读列宁的《唯批》而起。那时毛泽东的《实践论》是读哲学的日修课，在辩证唯物论的真理论中，实践标准是至高无上的。列宁在《唯批》中却认为实践标准并不是绝对的，它永远不能达成对真理的完全证实。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也有类似的表述。若从康德哲学论，《实践论》中所谈的实践之为真理标准仍属知性范畴，它不过是知性运用范畴统一感性材料的过程。而列宁对实践标准绝对性的保留却与康德界定理性认识能力相通。即然实践之为感性活动不能绝对判定真理，康德的物自体就有了存在的理由。

这个想法在当时有点大逆不道。但难道不正是先生讲到了哲学的爱智本性吗？就算因无知说错了，想先生也会宽容。先生看了一下我的问题，说你读书很仔细，这个问题几句话说不清楚，下次我带些材料给你，有些问题书读到了自然就解决了。先生的这句话让我受益终生。后来读书治学每逢难解之处，就想起先生的话。

那天课程的第二部分先生讲巴门尼德。先生用英文念出巴门尼德的名字，重音放在第一和第三个音节上。在第一个音节上还带上点“儿”音，听起来很特别。我一下子就记住了这种读法。后来读西哲史，对巴门尼德的称谓总是随了先生的念法。先生很看重巴门尼德的思想，虽然也批评他的僵化的唯心主义存在观，但却告诉我们巴门尼德在哲学史上是承前启后的人物，他对存在的解释开启了本体论的先河。

先生的讲课激起了我“狂热”的求知欲。从前以为自己还是读了几本书的，在厂里小兄弟之间也有点卖弄的资本，一不小心也拿自己当了回事儿。听了先生的课，才知道自己简直就是一张白纸，至多上面揉出了几道褶子。于是痛下决心要刻苦读书。可那时候，找书难呀！就先生讲过的这些内容，背景知识就涉及希腊历史、文化史、人物传，哪里找去？清河镇上有个小饭馆，是我们常去喝酒的地方。对面是个新华书店，进门一股子土味儿。陈列社会科学书籍的架子上就那么几大色块：深蓝——马恩全集；鲜红——毛泽东选集；深棕——列宁全集；屎黄——斯大林全集；暗红——马恩选集。一次和同学在小饭馆喝完酒出门乘兴进了书店，翻了半天，找出一本康德的著作《宇宙发展史概论》，算是难得的收获了。

又到先生来上课的时间了。现在每周就盼着听先生的课。先生很快将希腊哲学梳理了一遍，跟着开始讲授罗马哲学，卢克莱修、琉善一路道来，让我如沐春风。那天课间休息，先生在门口朝我招手，我急忙走过去，见先生从他那只黑色人造革提包里拿出一本书，说康德的著作不好读，蓝先生的译文也不好懂。大约是前次他问起我读了康德的哪些书，用的谁的译本，我便如实讲了。先生轻拍手里拿着的那本书，说这本书讲得清楚，译文也顺畅些，你可以读一读，有问题再讨论。我接过书，厚厚的一册，书页有点黄，是斯密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偉然译，商务印书馆出的。我谢过先生，回到座位上翻看，突见书中夹着一张纸条“供工人师傅批判参考”，心头一紧，才意识到先生授我此册是冒着风险的。

七五年，文革已经气息奄奄，但正因其将死而愈见凶险。先生这一代人被毛肆意凌辱二十余年，校园中也多见弟子反噬恩师的孽行。我与先生仅几面之缘，片刻交谈，先生便将这属于“封、资、修”的书籍授我。这绝非先生对我这个毛头小子青眼有加，而是我提的问题引先生“技痒”，那是久违了的“思想的快乐”。先生夹个纸条来遮人耳目，却掩不住几十年矻矻求真的一瓣心香。后来年岁渐长，阅历略丰，才明白那些真正投身思想事业的人，大半有犯难而上的勇气，正如苏格拉底宁死也要对弟子讲完最后的思考。当海德格尔深悟到“思想之业是危险的”时候，他绝想不到中国的运思者面临的是双重的危险：理念与人身。

自当局四九得鹿，紧追苏联，院系调整，改造大学，又以洗脑为万事之先，以致大雅无作，正声微茫，詈词横行，邪说盈庭。及至文革，校园皆成战场，师生半为寇仇，荼毒心灵，夺人性命，一至斯文涂炭，为华夏千年所罕见。在此暴虐之邦，先生心中寂寞啊。碰到能谈及学理的机会，先生便不愿放弃。后来读到先生写于一九三八年外敌入侵时的文章《中国文化对目前国难之适应》，更明白先生的举动是他毕生信念的反映。先生说：“古代希腊人虽然一个也没有了，但只要人类还存在着，他们那些寄托其理想的活动力之文物，流传下来，就会给我们后人以莫大的启示、鼓舞和慰籍。我们很可感觉到几千年前的人类精神文化，那些天才的灵魂与人格，与我们息息相关，并对我们殷切关照。”

我把先生授我的书认真读了，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理数有了粗浅的了解，但对先验辩证论一节总觉模糊，以为康德论述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总有捍格不入的地方。越读书问题越多，课下我向先生表露了这个意思。一次课后送先生下楼，先生突然说，你有时间可以到我家里来，这样可以多些时间谈谈。说完递给我一个旧信封，是别人寄给他的信，上面有地址：“北京大学朗润园十公寓204”。先生说你可以在周末不上课时来，我总是在家的。我极喜能有机会再聆教诲，便把这个旧信封仔细收好，心里盘算着哪天去叨扰先生。

三

七五年严冬，临近年关的一个晴朗寒冷的周日下午，我敲开了朗润园十公寓204的门。

朗润园在北大东北角。进北大东门，沿未名湖东侧北行，过小石桥行百余米，便有一组

楼群兀立。楼不甚高，红砖砌就。严冬时节，楼之间衰草枯杨在寒风中瑟瑟颤抖。进楼门，玄关处较常见的苏式建筑进深略宽，暗暗的。楼梯拐角处，堆放着一方大白菜，靠墙有几辆破旧的自行车。204号是二楼左手的单元，暗褐色的门上有几处破损的痕迹。敲门片刻，门轻轻开了，一位中年妇女当门而立，体态停匀，头发梳得净爽，一付南方妇女精明强干的样子。她就是先生的夫人，我后来一直称师娘的。师娘说话声音极轻，说“周先生在等你”。师娘在我面前都是这样称呼先生的。我进门，扑面一股暖气，夹杂着饭菜香。门厅甚暗，未及我眼睛适应光线，先生已从对面的一间屋子里走出，连声说欢迎欢迎，便引我进屋。这是先生的客厅，但大约同时住人，两只简陋的沙发，上面套着白布罩子。靠墙有张大床。后来才知道，文革起时，先生这套四居室的单元竟同时住过三家人。而我去时，仍有一户与先生同住。住房条件够恶劣的。

我刚落座，先生就忙着倒水。茶几上的圆盘里放着一罐麦乳精，一瓶橘汁，是那种需要倒在杯子里稀释了喝的。我想这是当时中国民间能见到的最高档的饮料了。后来知道先生爱喝咖啡，但七五年很难找到咖啡，先生大约就用麦乳精中加入的那点可可来替代。我忙起身，接过先生冲好的那杯热气腾腾的麦乳精，请先生坐下。心想就我这么个工厂里摸爬滚打的糙人，居然要喝麦乳精，先生太客气了。先生随便问了几句家常，知我母亲原来也是清华的学生，便说，那我们是校友，将来有机会去看看她。我忙说家母在清华拿读书当幌子，革命为主，属于不务正业。先生笑了笑说，她那才是正业哩。话入正题，先生说，希腊罗马哲学一个月四次课就完了。时间短，内容有限，你要有兴趣于哲学，怕还要多读一些，因为它是基础。我可以告诉你要读哪些书，我这里还有几本参考书，你看了，有问题再谈。我便把年内要来北大哲学系读书，没来成的事简述了一下，大约表示了有心向学的意思。先生注意听了，便说，这不是坏事，真到北大哲学系里你就读不了书了。他们很忙，就是不忙读书。倒是你现在这样好，时间集中，可以专心读书。先生说，要读希腊哲学，先要读希腊历史。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要紧的。我那时只在商务印书馆出的《外国历史小丛书》中读过介绍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小册子。希罗多德的名字从未耳闻，便问先生可有他的书。先生说有，过一会儿找给你。先生随即就讲起了希腊城邦的结构、社会等级、公民与奴隶、雅典与斯巴达的特点。不用讲稿，娓娓道来，条分缕析，启我心智大开。我拿出准备好的笔记本，仔细记下先生所述。先生说，这些都在书上，我给你提个头，你倒是读书时要多记笔记。

先生又问我，可曾读莎士比亚的戏剧。我一时反应不过来，不懂先生何以从希腊一下子跳到沙翁。便嗫嚅到，读过，但不多，只哈姆雷特、李尔王等几部。也巧，上初中时，班上有一姚姓同学，住炒豆胡同安宁里，其父供职中央戏剧学院.他家中有《莎士比亚戏剧集》，是朱生豪的译本，我曾借来胡乱读过一些。先生说，初中生，十三、四岁，读不懂的。现在可以重读。我问先生莎士比亚和哲学有何关系，先生提高声音说，莎士比亚的戏全谈人生哲学，比哲学家高明得多。先生又说，一等的天才搞文学，把哲学也讲透了，像莎士比亚、歌德、席勒。二等的天才直接搞哲学，像康德、黑格尔，年轻时也作诗，做不成只得

回到概念里。三等的天才只写小说了，像福楼拜。说罢大笑，又补充说，我这是谈天才。而我们这些读书人至多是人才而已。若不用功，就是蠢材。那时先生讲的话我不全明白，只觉得这里有些东西要好好想想。后来读了先生四三年的力作《莎士比亚的人格》，才明白先生治学，是以真、善、美的统一为人生与思想的最高境界。先生以为莎士比亚“具有一种高越的人格，他用他的人格，能感触到真的最深度。”

我对先生说莎士比亚的书不好找，又说到家里有一套“人人丛书”的英文版，是家母“革命”之余学英语时用的。家母的同学刘正郯先生是英语权威，曾编《英语常用词辞典》。他住在南锣鼓巷政法学院宿舍，时来家中走动，我曾听他用浑厚的男中音朗诵过这套书中的《哈姆雷特》，据说他是“标准牛津音”。先生大喜，说那就直接学读英文原版。我说我的英文程度太低，读不懂的。先生沉思片刻，坚定地说，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学英语。不懂外文，学不深的。将来你要读的书大多是外文的。现在回想，不知先生为何认定我会去念外国哲学。七五年，文革未完，我二十来岁一个小工人，英文大字不识一升，而先生似乎先知先觉，已经看到国家要大变了。

谈了许久，不觉已近黄昏。先生起身说，找几本书给你，先开始读起来。便引我出客厅，左拐推开了一扇门，进屋是一条用书架隔开的走道，狭窄的很，将能过人。书架后靠西墙一张硕大的书桌，黑色漆皮磨损得厉害，无漆处透出原木色，已磨得油亮。这便是先生日常含英咀华，纂言钩玄的地方。先生从书架上抽出几本书递我，记得有希罗多德的《历史》，汤姆逊的《古代哲学家》，和一本有关苏格拉底的书，似乎是柏拉图的《申辩篇》，译文半文半白。先生嘱我，希腊哲学家中最要紧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都是自他而来。坐在先生书桌旁，见高至屋顶的书架，上面摆满了书，高处还放有几函线装书。后来才知道先生得空也谈中国哲学，曾专论董仲舒、戴东原。先生书桌对面靠东墙放着一张单人床，顶头有一架书，都是外文，其中一套，暗红色皮面，烫金书脊，极厚重地挺立在书架中央。我过去用手摸，听先生淡淡地说，“那是康德全集”。先生语出，我摸在书背上的手似乎触电。从未想过与先哲如此接近，竟至肌肤相亲。我与先生相对无言。夕阳正沉在未名湖上，一缕金光入室。刹那，这狭窄局促的小屋显出辉煌。

离开先生家已是夜幕初垂。清冷的天空有几点寒星。天酷寒，我却浑身灼热，心中兴奋满溢。不为他事，只因先生授我一席话，借我几册书。以往，多少渴望冀求，晦暗不明地蜷曲蛰伏心中，而今先生的智慧和学识点亮烛火，通浚阻塞，唤醒了一个青年的精神生活，让他懵懂的内心世界疏朗清明起来。

七五年的最后一天，几个同窗好友约好在三里河三区的朋友家中相聚，一起送旧迎新。那天喝了不少酒，唱了不少歌。在七六年来临的一刻，我与好朋友走到木樨地，沿长安街东行，在凛冽的寒风中畅谈。我给他讲先生让我读的书，他谈写作的心得，一再强调我们写作的功底太差，要好好想想怎样才能写出好文章。当我们回到他家时，已是晨曦微露。就这样，在纯真的友谊和对未来的憧憬中，我们迎来了七六年第一个清晨。

几天后，收到先生一则短函，说七日他要进城看望朋友，约我晚上在萃华楼饭庄与他见

面。我心中有点奇怪，先生为何要约在饭馆见面。后来次数多了，才知这是先生的一个习惯。萃华楼饭庄在灯市西口和锡拉胡同之间路东。门口是几级很宽的台阶，玻璃门上挂着洁白的纱帘。我按时赶到，推门进去，见先生已在店堂深处入座。我急趋前，问先生为何约我至此。先生说他在城中看完朋友正是该吃饭的时间，上次的话没说完，正好可以见面，吃饭说话两不误。我很少在饭馆吃饭，少年时曾跟着一些大小“晃儿”去过莫斯科餐厅，边看那些张狂男女吹牛“拔份儿”，边低头猛喝奶油红菜汤。最喜欢就着抹了黄油果酱的方面包，喝甜腻腻的樱桃酒，喝着喝着觉得自己常佝偻着的瘦弱身躯竟壮硕起来。对先生讲了这些，先生笑笑说，莫斯科餐厅也曾去过，但那里“太高大了”，人在里面有点不合比例。此外，也太吵闹了些。我四面打量一下这个餐厅，才觉得这里清静，大小适度，适合先生这种儒雅之人。

先生点了菜，等候着，便开始问我上次拿的书读了没有。我告他先读了汤姆逊的《古代哲学家》，因为先生嘱我希腊哲学还要多看，所以先读有关希腊哲学的综述。先生马上说，汤姆逊的这本书水平不高，他是想用历史唯物论观点看希腊哲学的发展。但有的地方太牵强，没有说服力。其实我已经注意到先生读这部书时在天头地脚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对这部书的论述方法多有指责。先生说你只需从这本书得一线索即可。希腊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他多有忽略，比如苏格拉底，他几乎一字不提。柏拉图的《申辩篇》你一时还不能领会。我要告诉你，读哲学第一步就是读懂苏格拉底，他是哲学家们的哲学家，这一点你要用心记住。看先生严肃的样子，我岂敢不用心记。

先生以为，苏格拉底所使用的方法是所谓“精神接生术”，就是要人不是先思考哲学，而是先哲学地思考。前者是以哲学为对象，后者是以哲学为生活。以哲学为生活就要对社会中的问题取一种哲学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知道自己是无知的。苏格拉底最宝贵的知识是“知己无知”，自己的各类定见都可能是错误的。若有人告你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你先要怀疑这宣扬者的道德，因为他在说着一些他并未深思过的东西。何谓真理？何谓标准？但这并不是相对主义，因为它不涉及对某一具体结论的定评，只关心你是如何获取这些结论的。先生说，张扬人的精神生活的神圣性始自苏格拉底。人的精神生活要以寻求“善的知识”为目的。同样，教育的目的也在于使青年人学会探求善的方法。一个好的政治家就是懂得以善为治国理想的人。他曾谴责那些僭主“用装满货物的船只而不是用道德充满城邦”。先生特别强调，苏格拉底要做普通人的朋友，而不做权势者的辨士。先生又说，希腊大哲可分两类，体系型的，如亚里士多德，诗人型的，如柏拉图。但苏格拉底超于两者之上。柏拉图写对话录，亚里士多德写形而上学。先生佩服亚里士多德而喜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教诲了亚历山大大帝，真作了帝王师。柏拉图推崇“哲人王”，这点苏格拉底知道了会不高兴。因为他是信奉平等对话的人，而不要称王，哲人王就不会对话了。先生笑柏拉图自奉苏氏嫡传，却未学得真髓。

我聚精会神听先生讲，同时记着笔记，几乎没动筷子。先生却边说边吃，毫不在意。猛然发现我面前的饭几乎没动，便说该课间休息了，先吃饭。我狼吞虎咽吃完了饭，便抢着要

去付钱，先生拦住我说，你才挣多少钱？我们两人比，我是richpeasant，你是poorpeasant，便自己去付了钱。那时我是二级工，挣39块8大毛，先生的教授工资大约有200多块。从此先生和我去饭馆见面，总是先生付钱。

离开萃华楼，天大黑了。我陪先生到地安门，便分了手。先生乘7路无轨去动物园换32路回北大，我乘5路汽车去德胜门换车回清河。赶回学校，校门已关，翻墙进校，悄悄溜回宿舍，躺在床上把先生所讲在心里回述一遍，结果再难入睡。朦朦胧胧似乎睡了，觉得有人推肩膀，睁眼一看，同屋的守法站在我的床边，两眼含泪，哽咽着说："越胜，周总理去世了"。那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的清晨。

四

周恩来的追悼会开过了，邓小平含泪致悼词，毛泽东没有出席。会后出现了京城百姓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感人一幕，那一刻我也在场。后来我们知道，三周之后的除夕，毛泽东的工作人员在他的住地——游泳池放了欢快的鞭炮。毛终于让周死在了他的前面。这个决心其实自周查出患了癌症时就已下定。

班里的同学决定去天安门广场给周献一个花圈，表达悲悼之情。在那时，人们都认为周代表着党内正义和道德的力量。他的去世，使未来中国的政治变化更晦暗不明。当局已有各类禁令下达，老师也来班上劝阻，但我们坚持要去，学校并未强行阻挡。记得是杨晓明大姐找来的大轿车，袁懋珍大姐领着女同学扎起花圈，几位朋友商量着起草了悼文。在天安门广场凛冽的寒风中，全班同学宣誓，要以周总理为榜样，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离开广场后，我们几个人在南长安街北口康乐食堂吃饭，祖卫情绪悲愤难抑，伏桌痛哭。几个人酒后放胆，大骂阻挠人们悼念周的那些左派。只是我们当时还不知道，他们叫"四人帮"。这是毛泽东给他最亲近和信赖的人起的名字。

在这个激动不安的时刻，我一直没去先生家听先生教诲。二月初，春节过后，先生来信约我在康乐餐厅见面。康乐餐厅是家有名的餐馆，原先似乎在王府井一带。后来渐渐大众化了，成了普通的大众食堂，搬到了交道口十字路口西北角上。不过名声仍在，先生大约是因了这名声才约我去那里。北京的二月初，天寒地冻，刚在餐馆坐定，外面就下起雪来。雪花漫天飞扬，霎时间街宇皆白。天黑了，餐馆里的雾气在玻璃窗上蒙了一层白色的柔纱，透过它，能依稀望见外面雪花围裹着昏黄的街灯飞舞。

周恩来去世后，中国的政治空气格外诡谲。稍有知觉的人都知道，搏杀在即。但鹿死谁手殊难预料。先生这时约我见面，当然不是为了教我康德，他是心中不安。诗云："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先生心中的"君"就是国家大事。先生悄声问我，听说毛是故意不去周的追悼会的。他对周不满，认为周是反文革力量的总后台，可是真的？又自言自语的说两人共事这么多年，毛还不了解周的为人？周是不会跟他闹对立的。先生当时一再为周抱屈，却不指责毛的寡义，只是说毛身边的人对周不满，因为他们想拿到更

大的权力，所以在毛耳边说周的坏话。先生以一介善良书生之心，猜度党内残酷内斗，显得有点天真迂阔。其实，从七四年批林批孔开始，毛对周的不满早就表面化了。在毛看来，周身边聚集着一群随时准备清算文革的人，而这群人早晚会清算到他头上。毛对周的防范打压已是党内公开的秘密。周去世之后，京城内小道消息满天飞。大多集中在毛周关系上。先生听到不少传闻。他知道我消息渠道多，便总把听到的消息告我，核实一下是否可信。

和先生东拉西扯了一会儿，先生很小心地从他的制服棉袄口袋中掏出一张红线横格纸，上面有他手抄的温庭筠诗《经五丈原》：

铁马云雕共绝尘，柳营高压汉宫春。
天清杀气屯关右，夜半妖星照渭滨。
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
象床宝帐无言语，从此谯周是老臣。

先生递给我，说别人告诉他，这是周恩来在去世前抄给毛泽东看的。“象床宝帐”指被打倒的老干部，谯周指中央文革中的左派。其实，有关这首诗的传闻我早就听说过，在七五年下半年就有人传抄，我读到它是一位朋友抄给我的，用的是几可乱真的欧体正楷，那时他正苦临欧阳询的《九成宫》贴。但我确定先生所听传闻并无根据。同时流传的还有一个完全相反的说法，说这诗是毛泽东抄给他身边人的。“下国卧龙”、“象床宝帐”都是他本人自诩。所谓“空寤主”是指他费尽心力培养的接班人前途叵测，而最终谯周一类投降派会得势。联想七五年评《水浒》、批宋江投降派，而周恩来已被江青骂作投降派，所以说这诗是毛抄给他的亲信的，倒更像。我将此分析给先生听，先生连连叹气，说怎会如此。如果毛这样认定，则国事糜烂更加不可收拾。那天和先生吃饭，气氛沉重。先生不似往日的谈笑风生，显得心事重重。我少见先生如此，问他，他叹息道，国家如此下去怕有大乱啊。我当时年轻，并无先生那么深刻的危机感。只是深知专制体制全无人性，从心里厌恶这种粗鄙野蛮的权争。其实，政党权争本与百姓无关，林冲手刃王伦，关大宋百姓何事？伯尔上校与汉密尔顿决斗亦不干扰美国公民的生活。只是当局从苏俄学来的这套党国制度，让权争祸及百姓。

饭后，走出餐馆，雪已停了。街上少人行，清洌的寒气扑面而来。抬头见冷月高悬，夜空如洗。餐馆门前就是7路无轨电车，我要送先生上车，但先生说还早，“再走走，谈一谈吧”。先生喜说“再谈谈，再谈谈”。每逢此，我当然从命。我怕先生受寒，叫他放下栽绒帽子的护耳，再带上口罩。先生笑了，说那就既不能听，也不能说，你是要我又聋又哑啊。怕冰冻雪滑，我便在靠马路一侧轻扶住先生，先生抬起脚说没关系，我的鞋底钉了胶皮，不滑的。果然，见先生那双五眼黑棉鞋底上钉了一层轮胎。我们西拐，沿着鼓楼东大街，顺大、小经厂一路缓行。刚下的雪松松软软的，走上去嘎吱嘎吱响。街上几无人迹，偶有电车缓缓驶过，导电杆滑过电线，留下悠长的泛音，像巴赫“G弦上的咏叹”。车过后，晃动的

电线鞭打着路旁老槐树的枯枝，枝上积雪簌簌落下，洒在先生肩头、帽顶上。先生并不知觉，不时挥动一下那根黄藤手杖。在这静谧的雪夜，我伴着先生行走在玉洁冰清的世界里，不再理会四围黑暗的逼迫。已记不清具体谈了些什么，但肯定不是哲学，多半是交换对国是的看法，对未来的估测。不知不觉已走出两站多地，到了鼓楼墙下。怕再晚了耽误动物园的32路车，我硬让先生上了车。电车开动之后，先生举起手杖向我晃了晃，就坐下，随着电车启动的呜咽声远去了。

那天回家，半夜心不安，怕先生滑倒，怕先生没赶上末班车，怕……。早起急忙投了封信给先生，问个平安，那时先生家里没有电话。问声平安，要靠4分钱邮票。两天后收到先生的信，短短的，说“雪夜漫步京城，心情大好”。

三月间，也去先生那里。但后来查看当年的读书笔记，竟不见先生授课的内容，只记有先生指示我读的一些书目。想必三月里见面都谈国是、政治了。四月六日早起，大谷在班里悄悄告诉我，昨夜警察和工人民兵出动，血洗了广场。当晚，学校通知各班同学都去食堂听重要新闻，在播音员铿锵有力的声音中，我们知道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行动，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下台了。我立刻想到此刻先生必然心焦。他一直预感要出大事，果然就来了。心里计算着快点去看看他。那几天，课基本停了。大家都要讨论学习当局的新精神，表态、声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分子”。但实际上，讨论学习成了关起门的牢骚会。我瞅个机会就溜出学校去了北大。

想象着先生会很关注政局的大变动，正准备着倒给他一些新听说的小道消息。但先生出人意料地平静，说天安门广场他去看过了，人心向背已明，我们要等着看好戏。先生的书桌上摆满了一摞摞的书，书中插满了手抄的卡片。先生正在忙着案头工作。先生平静地说，学校正布置新的运动，这次批邓是重点。总有人会跳出来的，系里文革积极分子多得很。走近书桌看先生摊开的书，是《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言论集》，里面夹满纸条，纸条上注着一些书名和页码。先生见我不解，说这是六十年代为了配合反修，批判人道主义编写的资料集。书是他编的，序是他写的，但仅限内部发行。先生说这些年他又发现了许多资料应该补充进去，但重印这部书绝无可能。只是觉得工作总是要做的，得空就自己动手做。边说边苦笑道，也算个娱乐吧。在这黑云压城、风雨满楼的时候，先生却回到书桌，重伴青灯古卷。我一下想起袁世凯称帝后，风雨凄迷，鲁迅在京城绍兴会馆中抄稽康：

“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维
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

但先生所做，其意义却远超过伤时自悼。先生所披编者，是人类所共尊的一点人道之光。希腊先贤中，先生极尊梭伦。正是梭伦，在僭主庇西斯特拉图尚未得势时，警告追随他的“群众”：“你们真是重视奸徒的言行，跟着狐狸走”。在他掌权之后，又是梭伦

说，“僭主政治尚在准备之中时，较易阻止它，当它已经成长壮大，要去除它则是更光荣伟大的职责”。随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中，在平静中继续作诗指出雅典人的过错，“是你们给了僭位者力量，让自己沦为卑贱的奴隶”。先生踵武前贤，在四围的黑暗中，持守着人性与人道的圣火。

我翻看这书，里面尽是我所不知的先哲名言。读几段，不忍释手。先生见我喜爱，便走到书架上拿出一本崭新的书，说，我这里还存有一部，送给你吧。并在扉页上题字“送给越胜同志，周辅成于朗润园”。这是先生送我的第一部书，却是影响了我一生的书。后来我知道，它不仅仅影响我一个人，而是影响了一批有志于学的青年学子。天予就曾对我说过，先生编的这部书是让他“翻烂了”的书。先生在书的序言中写道：“二十世纪的人性论与人道主义思想，实际上是十九世纪的继续。不过社会主义的人性论、人道主义却更为壮大，影响也更广。这也是发展的必然趋势。苏联的斯大林，提倡集体主义，后来他的对手便以人道主义来补其缺点。至于西欧的社会主义，几乎全部大讲特讲人道主义，这也可算是时代的特点”。对我党所擅长的意识形态批判稍有记忆的人都应该知道，文革前夕，在阶级斗争的震天杀声中，先生敢讲人道主义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时代的特点”，敢直指斯大林的名字，提出“社会主义的人性论，人道主义”，该是何等的胆识。

七六年七月，京、津、唐一带天摇地动。许是十载文革戾气上动天庭？许是国朝夺鼎后千百万屈死的冤魂大放悲声？毕竟天地一怒无人能阻。只恨苍天不恤孤贫，又夺我中华无辜百姓几十万性命。那一段，社会似乎停摆，学校也停了课。我整天东游西逛，身上的书包中总装着先生赠我的书。先生授书给我时曾告我，皮科《论人的尊严》是文艺复兴初扬时的重要文献，是人道反抗神道的宣言。先生还说，爱拉斯莫的思想在人文主义兴起中意义非凡。《愚人颂》是一部需要反复读的书。他借愚妇之口对社会的讽刺批判拿到现在来看都不过时。先生在书中收《愚人颂》二万余言，看得出先生对此书的重视。

八月初，京城到处都在建地震棚。学校工厂内存有角钢、木方等材料，机械班的老齐、老穆几个哥们儿就拿来又锯又焊，盖起了号称“抗十级地震”的棚子。其实学校早就没人了，盖好也少有人住。那天我和祖卫去看老齐盖的棚子，随后就溜进了教学楼。地震之后，近十天没进过楼。站在教室里，见景物依旧，只是人去楼空。课桌讲坛上积满了灰尘，没有了往日的笑语欢声，没有了先生讲课的川音。我默默看着，有点伤感。祖卫突然唱起歌来：“在那金色的沙滩上，洒满银色月光。寻找往日踪影，往日踪影已迷茫”。歌声优美悲伤，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响。突然，我极想去看看先生，不知他的地震棚盖得如何。说走就走，从清河直奔成府。

先生的地震棚盖在离朗润园不远的一片空场上。那几日传说还有大余震，所以不让在楼里呆。人们只好栖居在地震棚里。我顺着各式各样的地震棚找过去，见先生坐在一把折叠椅上，一手拿着扇子不停地扇，一手拿着本外文书在看。见我来了，先生极高兴，起身说出去走走。一边抱怨地震棚里根本睡不好觉，说他夜里会溜回家睡，否则震不死也得累死，索性由它去吧，极达观潇洒的样子。沿未名湖向朗润园走，见十公寓楼旁的东墙上有一个大豁

口，好像是地震后墙壁毁损留下的洞。先生说可以从这个豁口直接走到校外，便领我踩着乱石钻出豁口。谁知墙外有道小沟，不深，但有近一米宽。我正想下到沟里扶先生过去，未及回头，先生竟一纵身跃了过去，身手颇矫健。可着实吓了我一跳。毕竟是年过花甲的人了，哪儿经得起这般躲闪腾挪。先生却全不理会，落定就向前面的田野走去。

我们一直向北，过一条小马路就进了圆明园。那时，圆明园不大有人去。福海是一片荒芜的芦苇荡，湖边阡陌交纵，杂树乱生，园内鸟啾蝉鸣，风清野静。可能在地震棚里憋屈久了，出外走动，先生兴致极高。我们信步漫走，我恭听先生随意讲评。过大水法残迹，先生指着倒在地上的拱形门楣说，烧园后很久，这东西还立着，后来是咱们自己人给拆了。先生又讲起火烧圆明园的经过，当年英法联军点火前在城内发告示，说为英法使团中被清廷虐待死的官员报仇。告示一发，就有刁民与太监勾结。英法联军捡了几处点火，火一点起，内奸们就入园大掠。为掩盖痕迹，掠一处，点一处火，致使大火蔓延不可收拾。这园子是外寇烧一半，内奸烧一半。先生讲起项羽烧阿房宫。照《阿房宫赋》所讲，阿房宫要胜过圆明园，但照样“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先生说，阿房宫这把火实际上是秦始皇焚书埋下的火种。秦始皇焚书坑儒，读书人便离心离德，认秦为“暴秦”。秦二世时，赵高指鹿为马，就是逼读书人昧良心说假话。章碣诗说：“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可是刘项手下读书人很多。所以，又有袁宏道说：“枉把六经底火灰，桥边犹有未烧书”。有未烧的书，就有读书思考的人。先生又说，其实这把火一点就是两千年。英法联军能欺中国之弱，秦始皇焚书坑儒是立了功的。

地震前，我曾把我们哲学班写的中国哲学史讲义呈先生过目，先生始终未置一词。现在回想，这部讲义跟着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思路走，其粗陋、荒疏想想都吓人，先生实在无法评点。此时先生倒略谈了一点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看法。先生说，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儒、墨、法、兵，各逞其能，是我们最有创造力的一段。而后，秦焚书，汉定一尊，中国思想兴衰就随当权者意志，独立思想很少见了。先生感叹，“礼失求诸野”都难。就算林下泉间有遗贤，要么默默终老，要么抓去杀头。先生问我是否读过稽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我说这些名篇曾背过一些。先生说稽康“七不堪”、“二不可”，推脱的够干净了。最后司马王朝不容他，不管你隐还是不隐，一样杀头。有思想的头脑都砍了，民族还能有什么创造力。“礼失求诸野”？恐怕朝野都一样，只剩乡愿腐儒而已。没听先生这么悲观地谈论中国思想，一时答不上话。后来读先生论中国思想的著述，发现先生原本是相信“儒分朝野”的。或许文化革命大扫荡，把先生最后一点寄托也吞没了。没想到先生竟说，他们那一代思想保守，经过太多运动，都成惊弓之鸟了。中年一代是搞运动出身，读书时间不多。倒是你们这些文革中长起来的年轻人倒可能做点事情，思想上没框框，敢想敢说。先生的希望让我惭愧，心想自己倒是敢说，但大半是胡说，倒是没框框，可也没规矩。跟先生说了，先生说书读到了就不是胡说了。

说到读书，我就请教先生，爱拉斯莫的《愚人颂》指东说西，扑朔迷离，不好抓住重点。先生说，愚妇的话有时需要从反面理解，她是正话反说。先生又点拨道，《愚人颂》三

大主旨：立身人道、宣扬宽容、批判专制。立身人道就是相信人性都是共同的，在共同人性之下，冲突都可以通过对话、妥协来解决，不像路德那种宗教极端分子，凡事非拚个死活。这就必须学会宽容。要争取宽容的环境，就非反抗专制暴政不可，因为专制暴政是人性和宽容的死敌。爱拉斯莫借愚妇之口说，那些道貌岸然，反对别人感官享乐的人，只是为了自己“独占快乐”，又痛斥那些不贤明的王者是“可怕的扫帚星”。还借愚妇之口大赞“无知”，说那些自以为是的极端分子，“本来自己是头驴，却以为自己是雄狮”。先生说文艺复兴时代诸贤人中，爱拉斯莫最近苏格拉底。后来读爱拉斯莫的传记，发现他果然崇拜苏格拉底，称之为“神圣的苏格拉底”。

地震后有十几天，京城不见太阳，终日灰蒙蒙，闷热蒸人。但那天与先生在圆明园散步，却倍感清凉。不是天气变化了，而是听先生谈古论今，心里觉得畅适。先生还教我，读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东西，不能忽视那一时期的艺术。说丹纳的《艺术哲学》可以一读，那里资料不少，傅雷译笔也佳。可惜他文革一起就自杀了。先生说他有朋友和傅雷很熟，知道他的死是让人逼的，而逼他的人现今正坐着高位。说罢黯然。

圆明园走走、说说、坐坐，不知不觉已近黄昏。先生又说找个地方吃饭吧，反正家里也开不了火。我坚持要走，不打搅先生，先生却执意不放，说吃好饭上楼把丹纳的书找给我。于是随先生沿北大校园外墙走了一会儿，到了南门外的一个饭馆，随便吃了点东西就送先生回家。进了家门，天尚未黑，先生很快找到了丹纳的《艺术哲学》。我随手一翻，见书里天头地脚又有许多先生的批注。读先生用过的书，顺便读先生的批注，仿佛听先生讲课。先生又走回书桌，拉开抽屉，拿出一叠纸，说这篇东西你可以读读。请人译了，但没有收入资料集。我接过手，见是手稿，极工整地誊写在方格稿纸上，是拉波哀西的《自愿奴役论》。先生嘱我一定保存好稿子，读完还给他。说仅此一份，没有副本的。我小心地把稿子放进书包。先生见我放妥帖了，又说，托尔斯泰是流泪读这文章的。我竦然。

回去展读这篇手稿，一连串的句子敲击心扉。

拉波哀西劈面就提出问题：“我只想弄清楚，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乡村，这么多城市，这么多民族常常容忍暴君骑在自己头上。如果他们不给这个暴君权力，他原不会有任何权力”。况且这个暴君“多半来自全体人民中间最胆怯和最软弱无力的人。这种人并不习惯于真正上阵交锋，倒是习惯于比武场耍弄花招。他不但不能治理别人，就连他自己也是由百依百顺的妇人来侍奉”。在拉波哀西看来，要想改变这种受奴役状态甚至不需“战而胜之，只要国人都不愿受奴役，自然不战而胜。不必剥夺他什么，只要不给他什么就行了。国人无须为自己做任何努力，只要自己不反对自己就行了”。因为从根本上，“是你们自己使他变成现在这样强大，为了造成他的伟大，你们不惜牺牲生命。他唯一的优势还是你们给了他的，那就是毁灭你们的特权。只要决心不再供他驱使，你们就自由了。........只要不去支持他，他将会象从下面抽掉了基础的庞然大物一样，由于自身重力塌陷下来，就会被砸得粉碎”。

然而，拉波哀西却绝望地看到：“人民丧失了理解力，因为他们再也感觉不到自己的病

痛，这就已表明他们是奄奄待毙了。甚至现在的人，连热爱自由也觉得不自然。………人们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自由，所以要唤醒他们把自由收回来，是困难的。他们甘愿供人驱使，好像他们不是丧失了自由，而是赢得了奴役”。拉波哀西分析说，“人们最初是受迫才供人驱使的。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就再也看不见自由，他们已经无所遗憾地供人驱使了。他们自愿地完成着他们的前辈只是由于强迫才去做的工作。所以，生于羁绁，长为奴隶的人，都把他们出生的环境，当作自然状态。竟然从来不愿意看一看自己的遗产证书，以便弄清楚他是不是享有了全部遗留给他的权利，人们是不是从他自己身上或者他的前辈身上剥夺了什么东西。”

拉波哀西断言：“暴君没有爱过，而且也不会爱任何人。友谊是神圣的名词，是一种神圣的感情。只有正派人才能建立友谊，也只有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友谊才会发展。它不是靠恩惠，而是通过正直的生活才能维持下去。”拉波哀西呼吁：“让我们行事善良吧，不论是为了我们的良心，不论是为了对美德本身的热爱。我深信，在上帝看来，没有比暴政更可恶的东西了。上帝会在来世单独给暴君和他们的走狗，准备下特殊的惩罚。”

放下拉波哀西的文章，心绪难平。先哲对自由燃烧着的渴望，对人之为人的权利与尊严的捍卫，打动着我，也困惑着我。我从未经历过这样一种精神上的冒险，也从未意识到从公民政治权利的角度上看，我们根本就是奴隶。更没有想过，这奴隶地位是我们每日欣然乐在其中的。意识到这点，有痛苦，有无奈，但更想知道为什么。想此文对托尔斯泰的震动，便觉我们与先哲之间心曲相通。从先生不及一年，但渐渐明白，我们其实从来没受过教育，只听过宣传，便把那些欺人的大字眼当作了人生指南。我们的心灵蒙昧昏暗，我们的热情虚骄盲目，很容易被人鼓动起来去作伤天害理的事情。文革初起，我尚年幼，但也曾羡慕过哥哥的同学们手提皮鞭，耀武扬威的样子。由仇恨浇灌的心田最适合生长致命的毒芹，只有自由与博爱的乳汁才能养育高贵的人格与优雅的心灵。我给先生写信谈我的心得，先生回信说，作奴隶不可怕，人因不可抗拒的原因而沦为奴隶的情况时常会有，但记住不要自愿做奴隶。读书思考就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沦为奴隶而不知。先生对此点的警觉与反省坚持不懈，九一年先生在印度寄文章给我，先生说：“过去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好好地爱它，让它少受阴影的干扰，有负于它。更令人痛心的是，我们竟然也随着阴影活动，作了它的顺民、奴隶、帮凶，有时自己还和他们一起，觉得自己了不起，自鸣得意，真是可怜可悯，又可耻！”先生这样一个纯厚之人竟如此痛责自己，他内心的深觉，我们晚辈能不悚然？！

一个月后，毛泽东离开人世，再一个月，他的亲信被他的战友下了大狱。一股莫名的欢乐席卷中华大地。我写了一篇文章叫《秋天里的春天》寄给先生，先生来信鼓励我这篇初中生习作，又说，尘埃落定，你应该读书了。

## 五

七七年底，社科院面向社会招收社科研究人员，经父执介绍，我递交了几篇论文，竟得

哲学所领导首肯，过了年就去哲学所报到。先生知我到哲学所工作，很高兴，说哲学所的专业图书在国内首屈一指，特别是有购书外汇，每年可以购国外书刊若干，能够随时了解国外哲学研究的新进展。先生说仅为此就应该好好庆贺一下，约我去他家吃饭。

七八年，时值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校方给先生配了一套新房，在北大西门外蔚秀园。文革中先生在朗润园一直与别人同住，起居读书皆不方便。当时有人劝先生不要离开朗润园，说再坚持一下，别人总会搬走的。但先生太盼望能有一方自己读书的清净天地，故坚持要搬家。大约在三、四月间，我去了先生新居。当时楼刚建成，路都未整修好，楼前水泥管、钢筋、灰土烂泥，一片狼藉。先生新居在一楼，敲开门，先生神情愉悦地引我进屋。我祝贺先生乔迁之喜，先生笑答，不是乔迁，是被扫地出门。想想先生是无奈才离开居住了几十年的朗润园，我也有些伤感，毕竟那里才是我开启智性之航的港湾。回想与先生促膝窄室，四周典籍环绕，听先生谈古论今，那熟悉的氛围，甚至气味都如在身边。我本天生怀旧之人，在这陌生的新居里，有点不适应。真是新房子，屋里满是油漆、水泥、沙灰的味道，打搅了旧有的书香，往昔的静谧。幸亏那两把旧扶手倚还在，见之如遇故人。不过先生在这里，等几日，书香自会归来。

先生问起我进哲学所后的工作，我告他正在随刘青华先生学做哲学期刊资料的主题分类。先生说你正可借机大量浏览。我告先生其实还难见真学术，大量文章属拨乱反正之作，仍在清理四人帮的思想。先生自然又问及我读书的事儿。自先生七五年底命我攻外文，七八年时我已能对英文原著粗通文意。先生说你能读原著，便要选几部耐读的名著来读。现在你还不到广泛浏览的时候，所以要读得少，读得精，像希腊哲学，伯奈特的《希腊哲学史》是要读透的。先生指点我说这部书哲学所图书馆一定有，但也许借的人多，若你借不到，我从北大图书馆找来给你。遵先生嘱，我找来这本书读。这确是一部博大精深之作，特别是对苏格拉底的阐述独有所见。他强调苏氏提拔精神生活，集宽、智、勇于一身的求真精神。先生以为伯奈特讲哲学家从人格着眼，梳理精神气质与学理探求的关系，很高明。在先生的引领下，我常在所里图书馆留连，果见群书沓来，目不暇接，眼界为之大开。

七十年代末，解冻之始，玄冰渐融，开始有了西方古典音乐、中外名著面世。也上映了一些外国影片。其中有一部日本片子，它改编自日本女权主义作家山崎朋子的纪实作品《山打根八号娼馆——底层女性史序章》，记述日本世纪初贫苦女性被迫漂流东南亚为娼的史实。这些被称作“南洋女”的底层民女，或被骗，或被卖往南洋为娼，受尽折磨凌辱，多数人死而无归。她们渴望回到故土，回到亲人身边，死后的埋骨地也面向大海，朝向日本。所以电影的名字叫《望乡》。由于影片涉及到南洋女的卖春史，影片中有些妓院的场景和暧昧的镜头，所以上映后引起一些卫道士的不满。

那天我在所里资料室看资料，碰巧翻到几封有关《望乡》的群众来信，其中有些言辞激烈，大骂影片“诲淫诲盗”、“腐蚀青年”，声称毛主席他老人家地下有知会死不瞑目，等等。用语极粗鄙、狂热、刻毒，能感觉文革阴影不消，余孽犹存。更可怕的是他们要求立刻禁演此片，并组织专门机构重新审查各类文艺作品，判定香花毒草。当时严家其先生在资料

室，我把这些东西给他看，也谈了我的看法。严先生赞成我的观点，要我写篇文章来辩驳，说他会送给光明日报，因为当时光明日报是思想解放的先锋。我连夜写完了文章，由于文章涉及到道德问题，题目就定作《〈望乡〉的伦理学》。第二天交严先生看，他提了几点修改意见，我便请他共同署名。我是新人，为尊重严先生，请他署名在先。严先生谦谦君子，说文章是你写的，我只是提了点意见，你当然是第一作者，说着拿笔把稿子上他的署名改到了后面，就拿着稿子走了。两天后文章就在光明日报上刊出了。几天后我收到了先生的信。

先生祝贺我发文于光明日报，说你这是第一次发文章于正式刊物，希望今后能多有议论公之于众，同时鼓励了我的文章，说这是一个很要紧的论题。先生感叹几十年来道德学说荡涤一空，人们只谈阶级而不谈伦理。虽说社会有阶级区分，但善恶标准却是不移的。善恶是人内在品质的表现，并不依人的社会地位来评定，更无涉于个人所操何业。先生引《礼记》中语“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先生说你谈《望乡》的伦理学，实际上是谈妓女的道德。这看似悖论。妓女在世人心目中总和道德沦丧相联。妓女这个名词似乎就是道德败坏的象征，但谁能说妓女就没有道德？先生说，谈妓女的道德人格，古今中外并不罕见。古有唐人白行简的李娃，清人孔尚任的李香君，今有陈寅恪的柳如是。外国有萨特的丽茜，《望乡》中的阿琦婆。她们都是心中有大义大爱的人。贫贱屈辱中不失善良与自尊，倒是那些高居人上的帝王领袖常常是大恶之人。在中国古有桀纣，今有四人帮，在外国古有尼禄、卡利古拉，今有希特勒、斯大林。先生说权力、地位并不带来善。权力只在弘扬和实现善时，才是有道德的。可惜世人常以地位、权势、金钱来衡量价值，判断善恶，结果把肆无忌惮的罪恶当作伟大来崇拜，实为大谬。那些大受崇拜之人正不知做了多少大恶，人们却依旧闭着眼睛朝拜。这实在是扬恶抑善的人世大悲剧。先生援引《孟子》：“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与先生几年交往，在言谈话语、往来书信中能感到先生心中的炽热。凡论及时政、品评人物、阐发学理，总着眼于家国兴亡、善恶扬抑、大道存废，偶谈及文革中对读书人的摧残羞辱，炽热便化为幽愤，指斥群邪若金刚怒目，大异日常的温文尔雅。此时真如子夏所言君子“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国朝几十年的政治洗脑、思想管制、学术式微，让先生心有隐痛。先生苦恼于讲坛之上难谈真学问，而奉承时尚、照本宣科又必致谬种流传。这个矛盾常常撕扯着先生那样不肯全盘输诚的老一代读书人。陈寅恪先生哀叹“而今举国皆沉醉，何处千秋翰墨林”，先生亦有同悲。在先生看来，文革不仅破坏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同时也败坏了社会道德生活，而这是动摇了立国之本。先生长期致力于道德哲学，对此乱象有较他人更刻骨的体认。先生以为拨乱反正主旨在于收拾人心，而我却以为要在制度的脱胎换骨。与先生争辩，偶有言语过激，先生也不以为忤，总是静静地听我陈述，若觉我乖谬过甚，先生的救治也是引经据典，或示我以必读之书。此次先生来信，指评我的文章，也随带教我Ethics与Moral在用法上的细致差别。我本对道德哲学所涉甚浅，却提笔妄谈伦理学，先生抓住此点，让我一窥门径。

七八年初夏，有位同窗好友想报考北大哲学系，开始复习功课。我一直忙于调动工作，

未及准备，现在受他鼓舞，也想一试。七八年十月底，先生体检时发现尿蛋白偏高，怀疑肾脏有问题，入住北大校医院检查。我去医院看先生，见他精神很好，似未把这病当回事。见先生依旧谈兴十足，便和先生谈起我想报考的事。先生想了一下，口气肯定地说，我看你不必报考大学本科了。先生说中国大学之前的教育是没有哲学一科的。哲学系本科生入校要从头学起，都是上基础课。你已经有相当基础，再从头学起有些浪费时间，不如直接报考研究生。当时的政策允许有同等学力者直接报考研究生。先生的话让我兴奋，但因不知其中深浅而有些犹豫。先生斩钉截铁地说："你能行"。

先生说我行，自然就要一试，便问先生取何专业方向。当时从先生读哲学史较多，便问先生是否报考西方哲学史专业。先生不赞同，说读思想史是为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打基础，专做某一哲学史流派的题目容易限制自己的眼界，成为"专家的专家"。先生说研究题目还是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找吧。至于报考何处的研究生，先生的意见是不必报考北大，因为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都是起步不久，哲学所的条件可能更好些。前不久我浏览国外现代哲学时曾对阿多诺的《音乐哲学》有兴趣，后又被马尔库塞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批判后现代社会所吸引，听先生讲要在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中找题目，心中便定下了法兰克福学派为研究题目。七九年初便报考了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杜任之先生的研究生。随后，几个月闭门不出复习功课。待考取之后，因杜先生年事已高，身体不适，便转在徐崇温先生名下读法兰克福学派，同时继续随辅成先生读西方古典。虽不在他门下，但先生仍视我如弟子，开始新一段收获甚丰的读书岁月。

六

入读研究生院之后，我只去了趟哲学系所在的十一学校，便不再露面。那时社科院研究生院没有自己的校园，上课要借用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舍。像我这样家在北京的同学除了看着课程表去师大之外，真是自由自在。当时除了专业课，我选了英语提高班和宗教系的课，曾去听赵复三先生讲基督教。念研究生三年，基本上是泡图书馆。除了所里图书馆就是北京图书馆。当时的北图在文津街，紧贴北海西岸，是明玉熙宫旧址，屋宇恢宏肃穆。进大门，穿过条石漫地的庭院，沿汉白玉砌就的台阶拾级而上，跨过厚重的古铜色门槛入厅，一股馥郁的书香扑面。高大空旷的阅览室内，一排排笃实古朴的长桌，一把把宽大舒适的圈椅，一盏盏黄铜绿罩、柔光泛泛的台灯；黄昏时分，夕晖透过高高的花棱窗泼洒到光洁的水磨灰地砖上，绘出规则的花纹，宁静、温馨，坐久了便有微醺。

先生有个习惯，每个月初都要到北图来查阅新书目，借阅一些北大图书馆没有的资料。自我开始读研究生，先生便提议每月选一天在北图见面。先生说我在读书学习中碰到问题可以在北图查书解决。同时可以"见面谈一谈，然后找个地方吃饭"。这个约定持续了两年左右。没有特殊情况，我与先生每月初都会碰头，直到我的学位论文答辩结束。许多要读的书都是在北图借读的，例如杰伊?盖的《法兰克福学派史》，哲学所和北大图书馆都未入藏，

是先生用他的个人借书证从北图借出来给我读的。那时办理北图的个人借书证需要一定的级别。记得当时哲学所有一张北图的集体借书证，需要借阅北图馆藏时得请所里图书馆出面借，很不方便。先生有一张北图的个人借书证，可能是教授的待遇。所以每次在北图见面，我会请先生为我借我想读的书。一天先生听人说起，党的某级领导干部可以在北图办个人借书证，而且因为首长忙，借书时不需本人出面，有联络人可以代办。先生说你可以当你父亲的联络人。我大喜，原来只知有内部购书证，现在知道还有内部借书证，于是请父亲单位开了介绍信，由我充当联络人，在北图顺利地办了一张个人借书证。当我把那个深绿色塑料皮的借书证放进口袋时，山川日月一身藏了。

每月享受随先生出入北图的快乐。有时我到晚了，见先生已在阅览室伏案工作，桌上放着一摞书，桌边靠着那支黄藤手杖。先生聚精会神地翻阅抄录，偶尔会起身到目录柜去查卡片，动作轻快敏捷，那支手杖冷落地倚在桌边，有些失意的样子。与先生轻声打个招呼，就去查阅自己的资料。各自工作到中午，还掉书，一起走出图书馆去吃饭。通常沿文津街向东，过北海大桥，绕着团城围墙走到北海南门外的仿膳小吃店用餐。我读研究生后工资涨到五十六块一月。但先生仍坚持由他付账。经我力争，先生同意轮流付账，但几乎每次他都执拗地说上次是你付了，这次该我了。结果我大约从来没付过账。

八一年初春，依惯例与先生在北图见面。先生说景山西街新开了一家粤菜馆，名叫大三元，今天完事后可以去尝尝。傍晚时分离开北图，沿文津街老路往景山西街。三月春浅，太液西岸新柳初黄，和风轻拂，柔条依依。北海在文革中曾作了公仆们的私家园林，我们高贵的压寨夫人曾骑马园中徜徉逡巡，而今重新向民众开放，也是政府的一份恩德。上得北海大桥，天上飘起绵绵雨丝，北京春雨后特有的那股土腥味扑鼻而来。蒙蒙雨雾中，见左手琼华岛上朱墙金瓦掩映绿丛。不远处，故宫角楼黄昏独立，寂寂似有幽怨。这里是京城最美的一隅。惟靠中南海一侧，庄严华美的汉白玉桥栏已被二米余高，带倒钩的铁栅栏所替，给这柔美秀丽的景致平添几分狰狞。行在桥上，先生举手杖一指铁栅，说他们总要把自己关在监牢里。想当年光绪帝幽禁瀛台时，这里也没装铁栅栏。共和百年之后，我们却只能透过铁栅栏眺望瀛台了，怎不让人掩涕叹息？

过三座门儿进景山西街，大三元酒家坐落在路东一个古色古香的院落内，门口国槐树下立着一个菜单的招牌，倒是前所未见。我一眼看去，菜单上多为5元-10元一道菜，觉贵得离谱。想当年我们在清河小馆喝酒，滑溜里脊、银丝肉也不过5毛钱。没想几年后竟见到十倍价格的菜。我对先生说此处忒宰人，不知京城穷书生尽是打秋风的。先生说偶一为之，尝尝粤菜也未尝不可，便非要进院。我想这次肯定又是先生付账，这么贵的菜让先生破费太多，便执意不肯。先生拗不过我，只好作罢，但心有不甘，唠叨说“一顿饭也吃不穷人”。我挽着先生胳膊，半拉半拽地带先生出了景山西街，沿着筒子河向沙滩走。河边宽宽的人行道旁满栽丁香、迎春、榆叶梅，浅紫、亮黄、深红杂错。薄雨渐止，嫩芳新濡，淡香四弥，初暝暗染。我与先生缓行在早春的温馨里，虽迥异于七六年初踏雪深冬的凛冽，但先生教我爱智求真，立身以仁的宗旨却一如既往，无丝毫改变。

一路行来，我向先生讲起近来读批判哲学的心得。讲到马尔库塞在分析后现代社会对人的控制时，借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特别是用弗氏的本我、自我、超我分层结构来讨论社会文化问题。先生便问我是否注意过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说白氏的理论中也谈过自然的、人文的、宗教的三级结构。他的核心概念“内在掌控”（intercheck）其实也是心理学的用法。白璧德也把人格分为“高尚自我”（higherself）和“卑下自我”（lowerself）。在谈到宗教问题时，白璧德有个“原我”（ordinaryself）的概念，认为原我被高尚自我所控，就产生宗教感。而弗洛伊德把宗教感归因于超我投射（projection）。虽然两个人用的术语不同，但意思却有相近处。先生仔细想想说，他不记得白璧德曾谈起过弗洛伊德，虽然他们差不多是同时代人。白氏也曾抨击镀金时代的物质主义，这和法兰克福学派对单维社会的批判有相似处，似乎是同一问题的不同阶段。先生说白璧德在中国影响很大，吴宓先生和《学衡》同仁对白是顶礼膜拜的。要思考二十世纪前半段的社会文化思想，白璧德值得一读。先生特别讲到白氏对大学教育的看法，说白氏最反对教育有“进步”一说。他以为教育就是要“保守古典”，大学教育必须是人文的，连科学训练也不能脱离人文观照。真有趣，马尔库塞本人也有类似看法。先生说这不奇怪，自希腊以来的思想传统大抵不脱巢臼，后来的科学至上主义是走偏了。对现代文明的反省总还是要回到古典中去找资源。

先生又讲到吴宓的往事。他与吴先生私交甚笃，称吴先生为老师，其实他们是亦师亦友。翻阅《吴宓日记》，见多处提及先生。先生曾几次撰文谈吴宓的人生观和道德理想，解读吴先生诗作。先生指出吴宓的理想是“向上迎接理想，迎接至真、至善、至美”。而叹吴先生道之不行，一生蹉跎。先生总结说：“吴先生的不幸，在他个人，最后也只能把自己的浪漫主义化为他的道德理念学（moralideology），把他的爱化为宗教精神，以安顿自己的生活。这是不幸的命运安排，但也是既悲且壮的安排，求仁得仁，有何怨尤！”

后来我才明白，先生谈吴宓，其实也是谈自己，谈他们那一辈读书人。他们浸淫于中国古典，又漫游于西方精义，从来就抱着打通两造、消泯畛域的雄心，也就是以求无分东西的普世价值为最高理想。在先生看来，是人则要用自由意志、自由选择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凡有理想高悬则必会在自由与必然、道心和人心上有冲突。不过，这种冲突的解决，恰恰要在求自由、求理想中实现。这是个神圣的任务。先生说“人类若无自由，不过是一架被动的小机器”。先生分析吴宓何以独赏柏拉图的《裴多篇》与《理想国》，说：“两者都是要证明纷纭世界之外还有一理想世界，这是‘一’。如果以这个‘一’或理想为基础，可以在繁杂的人世困乱中，寄托人的灵魂，在那里可以有和谐静穆，可以安身立命，也是人类最后要实现的目的。当希腊雅典已经由盛而衰而亡，群情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柏拉图的理想虽然来得太迟，无补于实际，但以后西方人民每每以此为理想，造成中世纪和近代的文明”。先生何不想实现此一理想？然一代淳儒，命运多舛,夙愿不遂，人皆凋零。但先生亦深知“求仁得仁，有何怨尤”。

谈话间已走到沙滩，在老北大红楼旁边胡同里找了个小馆，随便点些东西吃。先生在饭桌上写下几部英文书名，都是有关新人文主义的，其中有白璧德的《卢梭与浪漫主义》、

《法国批评大师》，说这些书北图都有，很容易借到，要细读了才知道新人文主义与批判理论究竟有何异同。大体上看，本世纪西方知识分子关注人文、艺术、道德问题的，都对工业文明有所警惕。二战之后反思现代化更是热门话题，但其中视角各不相同，都反思现代化，却有相反的结论。走出饭馆，天已全黑，华灯初上，京城春夜的味道真迷人。听先生一席指教，有春风风人自沉醉的感觉。陪先生上8路汽车，在地安门换7路无轨，像七六年的冬夜一样，先生挥挥黄藤手仗就远去了。

七

八二年三、四月间，我开始准备学位论文。那时我读完了国内能找到的马尔库塞的著作，对他的理论有了大致的了解。我认为他虽然是以新马克思左翼著称，但骨子里承继更多的是德国古典哲学浪漫一派的血脉。以我当时所能见的资料，尚无人这样定性马尔库塞的学说，所以我准备了一份提要，陈述我论断的理由，和先生约好，去向他请教，希望先生能判断一下我所准备的有关德国古典哲学、浪漫主义文学艺术的材料是否扎实。

到先生家，见他正在安一架新的咖啡机，是那种用沸水直接冲磨好的咖啡，通过纸袋过滤的新式机器。见我便兴致勃勃地说是唐君毅先生的家人托人从香港带来送给他的。先生与唐君毅先生青少年时就是至交，抗战时期曾一起和牟宗三、程兆熊编刊《理想与文化》，先生曾回忆起："我们几位手无寸铁的书生，想借此表示我们为民族奋斗的决心。……当时大家心中都想起宋代学人张横渠在抗金战争时期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以及西方费希特在德国国难时期《对德意志国民的讲演》的故事。我们都感觉到不能都去喊抗日的宣传口号，还需在本岗位上作些踏实的哲学建设工作"。先生对我说那时一起编杂志，常常挑灯夜战、通宵达旦，困了就喝浓咖啡。他喝咖啡的习惯就是那时养成的。先生边说边摆弄咖啡机，一定要尝尝这新玩意煮的咖啡好不好。忙活了一阵，咖啡器终于嘶嘶地响了，片刻，淡淡的咖啡香便弥漫在屋子里，阳光正爬进窗子，三两方光影漂浮在咖啡的香气中，缓缓地游动。

先生倒好两杯咖啡，便像往常一样，坐在那只老沙发上，头向后仰，靠在沙发背上，左手在扶手上轻轻叩击。我坐在先生右侧，拿出笔记本说，上次和您谈起准备论文中的几个问题，想听听您的意见。先生微闭双目，缓声说"请讲"。我知道，每逢此时，就是先生要集中精力认真听而长考的时刻了。我刚一说出题目，先生就笑了，说浪漫主义的题目最难讲，"它太浪漫了"。海涅有海涅的浪漫主义，白璧德有白璧德的浪漫主义。有十篇文章可能就有十种定义，你给自己选了个最麻烦的题目。我说虽然麻烦，但并非羚羊挂角、梳理各家之说能得其大意，况且不是求几何定理，要精确到一丝不苟。思想文化批判总是取其一般特征。先生点头说，这自然是对的，就看你对一般特征抓得准不准。我说像笛卡尔和卢梭，虽然都以概念、推理论思想，但区别极明确。这种大特征是抓得住的。以此看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就有话可说。

我以为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给人的审美艺术活动以突出地位。他在讨论审美艺术问题时，给自己规定了任务，要证明在美与真、艺术与自由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这表明他要完成德国古典哲学和浪漫主义文学早已提出的任务。他要在康德、黑格尔、席勒奠定的坚实基础之上，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重建审美新秩序，以对抗后工业社会的“工具理性”和“现实原则”。这个秩序正是诺瓦利斯“兰花幽谷”中的秩序。他要以“自由游戏”作为无压抑文明的标志，以卸载现代文明强加在人的心理上的“多余压抑”，使心理和生理上的愉悦统一于诗的王国。他要让古希腊的神祇，爱与美的象征俄耳甫斯、那喀索斯代替后工业文明中的英雄：政治强人、商业大亨、运动明星、社会名流，使人成为独立的、审美的、有尊严的自由人，而不再是一群傻呼呼的、患有成长延缓症的追星族。

我列举了所使用的各种材料，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家、浪漫主义文学家的著述，有关浪漫主义专题的论著，欧洲十八、十九世纪思想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史实。先生认真地听着，当我谈到“自由游戏”概念时，我引席勒《美育书简》中的话“在美的国度里，人们彼此只作为自由游戏的对手显身，这里唯一法则是把自由供献给自由”。先生便问我，席勒的自由游戏概念出自何处，我答出自康德。先生很严肃地说，既有前因，你绝不该忽略，引征材料要尽量溯其源头，这是个方法，也是个原则。先生原则两字说得很重，让我脸红。先生随后说，我看你对康德《判断力批判》读得不细，其中第九节专论游戏概念，你要回去再看看。我忙点头。

我接着谈到马尔库塞不仅极赞赏康德以审美活动为联接知性与理性，自然与自由的枢纽，更认为这种枢纽功能意味着提高感性地位以反对理性暴力，最终要摆脱理性压抑性的统治，使人通过审美活动开拓人与社会的另一维度。先生说这种讲法已经远离了康德。在康德那里，三大批判无高下之分，各司其职而已。三大批判的核心就是一个“人”字，以人为中心，考察人的认知能力、道德诉求、自由意志，最终目的就是人。在这个出发点上可以说马尔库塞仍在德国思想传统中。从他的论证方法、思想资源、价值评判上看，你说他是个浪漫主义者，我想是站得住的。特别是他总谈美是自由的表现形式，这和席勒是一致的。先生说席勒的理想除了写在他的美学论文里，更多的是写在他的诗里，你要去读他的诗，毕竟席勒作诗人比他作哲学家更有地位。遵先生嘱，回去读席勒诗集，读到这样的句子：

走出陌生的他乡
重寻天真单纯
重回幼时茅庐
摆脱冷酷的枷锁
在自然怀中温暖安眠

这简直就是马尔库塞的论文“审美之维”的诗意表达。真感谢先生指点迷津。

先生又问我，你认为马尔库塞这一派对现实的意义在哪里。我答至多表示一种信念坚守

罢了。我对理论改造现实的可能根本就极悲观，尤其是后现代社会的整合力，批判性的知识分子都边缘化了，绝不可能有启蒙时代的哲人那样大的号召力。先生笑了，说我们的老祖宗孔夫子就是“丧家犬”。又说读书人不为世用并不可耻，倒是读书人当了权势的帮凶才不光彩。我问先生论文题目是否可以叫《马尔库塞——批判哲学的浪漫主义骑士》，先生说论文题目你要听导师徐崇温先生的意见，我对论文不发表意见。又问先生能否参加我的论文答辩，先生说只要杜老和徐先生请他，他当然参加。

回家之后我又反复思考先生的问题，批判理论的现实意义何在。这在论文中是极重要的一块。思考的结果记在笔记中是这样一段话：“建立无压抑的文明，在现存理论框架中看，确实是个幻想。马尔库塞本人颇明了这点。因而，若想走向他所指引的无压抑文明，大半不能靠脚而要靠头，或者干脆靠心。想起这点真让人悲从中来。但午夜时分，一支烛光也能为踟蹰暗夜的旅人燃起一丝希望。朝霞纵然绚丽，但那要待晓雾四散，而并非人人都能等到清晓莅临的一天。因此不管天光大开，还是烛光掩映，清醒的灵魂总守候着，只要有人守候，就总有破晓的可能。怕就怕我们都沉睡了。守候于幽夜是一种幸福，正如西西弗斯是幸福的一样”。后来我把它写入文章寄给先生，先生回我信说：“愿与你和朋友们共同守候”。

八三年读到贺麟先生的文章《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贺先生说：“周辅成先生在一九三二年写了《康德的审美哲学》（《大陆哲学杂志》一卷六期），……周辅成先生是研究西方伦理学的，周先生曾‘惋惜中国尚不曾有介绍康德的美学的文字’，自告奋勇写了这一篇文章。周先生的介绍相当详细，全文共分两大部分，一是批判力与悟性和理性的关系，一是审美判断之批导。这是我国对康德美学思想最早较有研究水平的文章”。我才知道先生是介绍康德美学入中国的开山之人。我问先生为何从未向我提起，也未叫我读他论康德的文章，先生淡淡地说，那是五十多年前写的东西了，不一定有价值。我坚持向先生要，他挺不情愿地从北图复印了一份给我。我仔细拜读先生的文章，虽然行文风格是五十年前的，但先生对康德美学梳理之清晰，解说之明确，总体把握之贯通，以我当时所见中文文献，尚无人能及。老一辈学人学风真淳厚。像这种开创性的工作，不过是做过便完了。能与先哲对话，能有成果惠及后人便达初衷，其余世间名利不过淡然处之。这种淡泊雍容，来自浩然之气的涵养，来自古卷青灯的陶冶，来自“大道如砥”、“德不孤，必有邻”的信念。先生已点燃烛火，又约我们同守暗夜，小子岂敢怠惰。

## 八

八二年六月，我要通过硕士论文答辩，先生应邀担任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那天先生早早就到了哲学所，在走廊里遇见先生，觉先生今天的样子有点特别。后来才意识到先生特意着了装，显得格外整洁肃穆。我趋前问候先生，他很严肃地点了一下头，就进了现外室，答辩就在这里举行。答辩过程中先生问了我两个问题，记得有一个就是有关康德所论“无目的的目的性”。我回答得大致正确，其他先生也问了一些问题，所幸未出大错。随

后我便出去等候。再进房间，见各位答辩委员面带微笑，就放了心。杜任之先生宣布我的论文通过，我向各位先生鞠躬表示感谢。所里派车送先生回北大。见先生上车，想起七五年底在清河小营机械学校送先生上车的情景，不由百感交集。

论文答辩结束不久，我便启程去武汉，为即将在庐山召开的全国现代西方哲学讨论会打前站，办自武汉至九江的船票。上山前在九江烟水亭旁的小酒馆与国平和苏国勋大哥喝酒，望窗外蒙蒙雨雾中兀立的点将台。相传赤壁之战前，周瑜曾在此演练水军。上庐山后，忙于会务，得暇与朋友们遍游庐山名胜，甚是快乐。一日，与北陵、友渔、国平、苏大哥，步行二十余里去访三叠泉。返回时已是暮色四合，山风渐起。向晚的天空蓝水晶般纯净，几颗早到的晚星倚着绮云，平添几痕绚丽。远山云雾缭绕，影影绰绰，几人正踏歌徐行。苏大哥突然指着远山说，那是五老峰，山下就是白鹿洞书院，明天我们会去参观。我心一动，想起南宋淳熙年间，朱子在此升坛开筵、门庭兴旺的情景，不免心往神追。接近庐林宾馆时，天已全黑，在黑黝黝的松林中行走竟看不清路，几人相呼着在林间小径上摸索。不经意间，眼前豁然一亮，庐林湖已飞临身旁。润玉般的湖水静卧秋夜，岚气幽幽，摩挲秋水。湖畔烟雾飘渺，修竹袅立，伴微风簌簌纤歌。凉夜已深，皎月破云，寒星数点，清辉散落。几人似闯入画中，皆收足敛声，不敢搅扰这人间仙境。待回到宾馆，躺在床上，仍未从刚才的梦境中回过神来。又想起一早起来要登五老峰，游白鹿洞，不免辗转反侧，很久未能入眠。

读史知道始建于南唐升元年间的白鹿国学是中国最早的书院。书院者，读书、答辩、慎思、精进之处也。选一方山水清幽之地，奉一套求真悟道之理，聚一群心向大义之人，延几位德高饱学之师。行如朱子在《白鹿洞书院学规》中所言，“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南宋淳熙六年，朱子任南康太守，踏勘书院旧址，以为“观其四面山水，清邃环合，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真群居讲学，遁踪著书之所”。便主持修复，招收门生，登坛讲学，白鹿洞遂成理学圣地。我读中哲史，对朱子一直有好感，觉他论道明通，平易晓畅，绝非道学面孔。不过读先生论戴东原的著作，却见他力斥理学，极赞戴震所言“人死于法犹有怜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其实先生扬戴抑朱也有其不得已处，对朱子亦有回护。先生认戴震所反对的宋明理学“基本上是指清代的统治阶级所了解的程朱哲学”，又痛诋清际文字狱之残酷，这其中的宛转，倒要向先生好好讨教。今天在白鹿洞拜朱子，要想好回去如何向先生“交代”。

书院的大门并不煊赫，上有李梦阳题匾。据说古时门外大道边曾立有石刻“文官下轿，武官下马”。我们的先人倒是重知识轻地位的，而今却尽入渔樵闲话了。进门便有清凉之气扑面，寻清风起处，是自后山奔流而下的一道清溪，溪边巨木参天，阴翳匝地。溪中有巨石数块，其上有朱子手书“枕流”二字。向左拐，进一庑廊，皆石刻，中有朱子手泽，和李梦阳五言绝句。诗境清幽篤静。进朱子祠，向朱子顶礼。随后转入白鹿洞，有后人凿石鹿，殊粗糙。四面游逛，随意观览各处楹联，大多陈词滥调，忽见明人周相所撰一联，“二李读书看白鹿，书中得几分，白鹿中得几分；三贤讲道对青山，道外无一事，青山外无一事”。觉

得有趣，多看了几遍，暗记住了。进文会堂，见朱子手书“鹿豕与游，物我相忘之地，峰泉交映，智仁独得之天”。想到底是朱子，出手就是不凡。出堂下阶，沿明溪缓行，听水声潺潺，似鸣素琴，真可一洗尘心。不知朱子名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是否得自于此。跨过几块卵石，便站到“枕流”石上，想既为“枕流”，便当曲肱而卧，于是便横卧石上，仰望白云苍狗。

古希腊，柏拉图建立了雅典学园，亚里士多德建立了吕克昂学园。正是在这些学园中，希腊哲学蓬勃生长。这学园大抵便是我们古时的书院了。有趣的是，希腊哲人讲学论道也要寻个清幽怡人之处，在《斐德若》篇中，柏拉图记下了苏格拉底与斐德若的谈话“在梧桐树的浓荫下，四肢舒展，躺在青草地上，夏日的凉风轻拂，把脚放入清泉，一阵沁人心脾的凉爽，用芳香的青草作枕，斐德若，来吧，我就躺在这儿，你来读你的文章吧，在这仲夏的温暖中”。再看朱子对白鹿洞的喜爱，中外大哲所思所感冥冥契合，在精神的至高处，何来畛域！

书院、学园中研习之道的优越处是讲辩结合，有讲有问，有答有辩，文意互发，疑义相析，攻防之中，道理渐明。因为只有自由辩论最能激发思维的活力。想自八一年西安会议，结识嘉映、正琳，相约每月一次的黑山沪讨论会，一年多来确觉思路大开，学力渐长。此次庐山聚会，他们未到，让我惋惜不已。见嘉映业师熊伟先生兴致勃勃地游览白鹿洞书院，心中忽发奇想，若辅成先生亦在此地升坛讲课，该多么有趣。那时我辈友朋、学子机锋相夺，义理相搏，如君子之射，“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这个向往存我心中多年。八九年与正琳、嘉映、友渔、国平、阿坚、苏炜诸君筹划《精神》杂志，特设“学园”栏目，想收各家争辩于其中。不料虎貔之师直入京城，狼烟起处，精神遁走。九二年与力川去梵蒂冈博物馆，却见到这理想坚不可摧地存于拉斐尔的《雅典学园》中。大师随心所欲地把他尊崇的哲人，不分门派，不论年代，一网打尽在他的巨作中。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联袂而下，宽袍飘飘，如天神下奥林庇斯山。再看学园中群贤尽至：放浪形骸的第欧根尼，思考流变的赫拉克利特，定“在”为“一”的巴门尼德，万“有”归“数”的毕达哥拉斯，色诺芬、普罗提诺、伊壁鸠鲁……，最后大师自己也厕身其中，聆听论辩。在拉斐尔心目中，人类的精神生活尽在雅典学园中了。学园、书院，思想者的家园。

下山回京，庐山带给我的激动尚未平静，急冲冲去看先生，要给他讲的故事正多。自八O年起，先生开始主持新成立的北大哲学系伦理学教研室。先生毕生致力于伦理学，但在几十年谀桀颂纣大合唱中，有谁听良心细弱的呼声。现在伦理学能登堂入室，先生很高兴，也极关心国内学界的各种动向，我向他介绍了会议的情况，记得还带了几份会议论文、简报给他。在和他聊起白鹿洞书院时，我说先生虽不喜欢程朱，但白鹿洞书院实在是个好地方。先生马上严肃起来，说朱熹是真儒，儒家的好东西，朱熹挖掘光大了许多。南宋时外敌威胁，讲儒学的人都能体会得到。讲理学也是讲心灵的力量。王守仁的心学是继承这点的。我说戴东原批理学，先生是赞成的。先生大笑起来，说你说的是我那本论戴震的小书吧。他的思想我确实很喜欢。我在清华读书时，就听说王国维可惜戴的哲学思想不受重视。其实那时我就

很注意他。这本小书是我五六年写的，那时候让我们学艾思奇的哲学，分唯心、唯物两条阵线。戴东原的哲学是朴素唯物论，所以就写了他。那种书容易写。先生又说，戴东原是个很了不起的人，永远替老百姓说话，其实我在书里还是发了一点牢骚的。我说清代文字狱之残酷史无前例，想的就是共产党得天下后，各种批判就没停过。满人入关后对汉人中的读书人很警惕，像吕留良，死了还要掘墓剖棺，后人、学生都不放过。过后再细读先生的书，果然能见出先生运笔立论处处用心良苦。先生说："戴震生当文字狱最厉害的时期，他反抗现实的文字是表现得很曲折宛转的。虽然如此，但我们一读其文章，立刻就可以感到他对当时统治者有极沉痛的愤慨，比如他说'在位者行暴虐而竞强用力，则民巧为避而回遹矣。在位者肆其贪，不异寇取，则民愁苦而动摇不定矣。乱之本，鲜不成于上，然后民受转移于下，莫之或觉也'"。先生以为，这是戴震思想的中心，归乱源于统治者，而人民是受害者，这表明了戴震的人民立场，其实这是先生观察社会、评判是非的一贯角度。在平民与权势、卵与石之间，先生总是站在平民一边，站在卵一边。

话头一撂，我便把在白鹿洞记下的那副对子念给先生听，想请先生参详。先生说，朱熹讲道心人心两不分，天地人心两不分，陆九渊讲"道外无事，事外无道"。到王阳明哪里，更是心物一体。这副对子是明人所撰，看来是心学之徒。不过里面已经有些禅的味道。王阳明的心学本来就得益于佛学，我看这上联是说悟道不只在读书，青山白鹿都有道心。下联是说心中之道与身外青山本为一事。朱熹有个重要的思想，理在物与在身是一回事，这就是理一分殊，格物致知的最高境界就是达于至理。这副对子写得不错，我觉先生解的也好，便记了下来。先生自嘲说今生未去过白鹿洞书院，枉为读书人，又提起王阳明曾亲往白鹿洞格物致知。问现在可有王阳明的遗迹，我答似未见，只是书院大门上的匾额是李梦阳所题，他和王阳明是同时代的人。先生便说，明前七子是要搞"文艺复兴"的，文必秦汉，诗宗盛唐，一时左右文坛。我把记下的李梦阳的五言绝句呈先生看，诗云："登山眺四极，一坐日每夕。行看夜来径，苔上有鹿迹"。先生看了片刻，便起身走到书架旁，翻检出一叠复印材料，说歌德有首诗和这意境有点相似。随即便翻到一页递给我，是《游行者之夜歌》，宗白华先生译的：

一切山峰上
是寂静
一切树杪中
感不到
些微的风
森林中众鸟无音
等着罢你不久
也将得着安宁

这诗我曾读过梁宗岱先生的译文，他译作《流浪者之夜歌》，两公译文各有其妙。梁先生在诗后加有一注：“一八三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歌德快八十二岁了，距他逝世日期仅数月，他一鼓作气直登伊门脑旧游处，重见他三十八年前写下的诗句，不禁潸然泪下，反复沉吟道：‘等着吧，俄顷你也要安静’”。经先生提醒，再对读两诗，发现果有意境相通之处：皆是独登峰巅，寂静寥落，鸟声无闻，鹿影不现。惟歌德诗苍凉沉郁，梦阳诗空灵清缈，物色仿佛，而心境相异。

看先生授我的这叠复印件，是一部叫《歌德之认识》的书，它是先生在民国二十一年所编。翻看目录，作者、译者皆为一时之选。有冰心女士的诗，宗白华先生的《歌德之人生启示》，贺麟先生的《歌德处国难时之态度》，辅成先生的《歌德对于哲学的见解》，唐君毅先生的《孔子与歌德》……顿觉眼前云蒸霞蔚。看先生撰写的前言说“今年国难期中，临歌德逝世百年纪念日到来，国人们对此纪念是如何地热闹，证明我国人在物质困苦里还没有失却对精神价值的欣慕”。我真不敢相信这部书竟完成于外敌入侵，国脉危急之时，这要何等的毅力和定力。我问先生，战乱之中您还想起要编这样一部书，而且能印出发行？先生正色答道，好不容易啊!当时巴金在上海问了多家书店，都不肯印，是宗白华先生送到南京朋友处才得印行。那会儿人心惶惶，谁会在意歌德，我们几个青年人却觉得越在危机时才越要向歌德致敬。那时知道日本人也纪念歌德，我们便想表现一下中国人的能力。我给文化界的朋友、师长写信，几乎所有人都回信支持，好热烈。先生用四川话讲出“好热烈”时，刚才低回的感叹顿成昂扬的自豪。看先生皓首低垂，热切地翻书的样子，我暗问自己，可曾有先生这种对精神价值坚韧不倦的“欣慕”。

在庐山时就想向先生请教书院和读哲学的关系，我拿白鹿洞书院和宋明理学说事儿，和先生开玩笑说，大学的哲学系应该统统取消，改成书院、学园。想读哲学的人去投奔各处书院，各位先生自筑杏坛，哲学自会精进，再有个诸子百家时代也未可知。先生笑答，国家不给书院出来的学生发文凭，他们靠什么吃饭？柏拉图办雅典学园时，伊苏克拉底就嘲笑他教出一群只会抽象推理的呆子，是只知爱智慧却不懂实行的空论家。他自己办学校收费很贵，却保证学生能学到实用本领，将来好混世界。柏拉图绝看不起他的一套，骂他唯利是图，说他教的修辞、辩术那一套不过雕虫小技。我回先生说，朱子倒和柏拉图相通，“非徒务记览，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是白鹿洞学规。朱子要他的学生以讲明义理为求学目的。先生说其实务实入世与求纯知的界限并不绝对，柏拉图的学园也要教人作政治家，教人治国之道，还要作“哲学王”呢！顾贞观、高攀龙立东林书院，除了孔孟曾颜之外就是遵崇白鹿洞学规。他们本来就是要继承朱子学脉的，对王阳明都有不满，以为他的心学走偏了。从学理上讲，他们的志向就是保持儒学正统。东林党的主要人物，像杨涟、左光斗、黄尊素，都是信理学的大儒，一旦入世，就把自己的儒家信念、道德操守带到行动中。和魏忠贤斗，是性命相拼啊。杨涟被锦衣卫折磨得体无完肤，最后是铁钉贯脑而死。左光斗被拷打得几无完形，也不低头。真是天下读书人的楷模。

先生说，这些理学信徒们平日谈经论道，似与平民百姓无甚关系，想不到他们一旦挺身

抗恶，百姓竟以死相助。苏州数万市民上街，对抗来抓捕东林党人的锦衣卫，真是正气鼓荡。孔子讲“礼失求诸野”，我看这就是了。后人修五人墓，张溥作《五人墓碑记》，就是把中华民族的真精神留下来。我看这也就是儒家的真精神啊。文革中“破四旧”把五人墓砸烂了，那是断自己民族的血脉啊。先生讲至此，摇头痛惜，眼中似有泪光。我竟一时没有追上先生的思路。以前胡乱读史，对魏阉暴虐，厂卫横行的史实不过一带而过，并未深思。苏州市民义愤群集、痛殴厂卫，而后又有周文元等五义士“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对此我当然是极为崇仰，但从未以先生所谈之真儒精神来思考。张溥曾问：“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先生竟以为这就是“礼失求诸野”的明证。先生心中的礼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之真儒之礼，是由“守死善道”而出的一套行为规则。以此观之，苏州市民皆守礼之民，苏州之地为礼义之邦。而文革之中，砸五人拱墓，辱先烈遗骨，当此时，华夏已为鬼域，子民皆成暴徒，此中华命脉危殆之象。

听先生情绪激昂地大谈东林党，我从白鹿洞带回的道外青山的闲逸，一下子被淹没了。我突然意识到白鹿洞书院绝非仅是鸣泉素琴、朗月清风的世外桃源，先人讲纯思至理，也包含着坐言起行。华夏儒生并非皆是追名逐利、献媚邀宠之徒，舍生取义本是题中之义。讲道也意味着护道、殉道。不参透两方，谈何了解儒学。自己的感觉太过轻浮，还要沉下心来，重读古典，深入思考才是正途。向先生谈了我的感想，先生教我说，中国哲学中，理学的情况比较复杂，入清之后，批它的人很多，有一个原因是清朝大捧理学，又兴文字狱，让一些读书人心怀不满，借批理学来发泄。所以读朱熹要读点明史，特别是晚明史。晚明多次禁书院，但禁不住，这里就有朱子思想的力量在。先生叫我先读谢国桢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朱长祚的《玉镜新谭》。说如果再有时间，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要细读的。黄宗羲是东林子弟，他父亲黄尊素的死让他思考了许多问题，多有真知灼见。和先生分手时，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毛泽东活着的时候，谈明史是很危险的”。待后来读书稍多，才明白为何谈朱元璋和海瑞的吴晗，谈李三才的邓拓，不管如何献媚邀宠，终是死无葬身之地。

九

八二年底，先生搬回朗润园了。这次占据朗润园半壁江山的人搬走了，先生终于收复失土，所以特别高兴。这两三年，先生全力以赴，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这又是一桩奠基性的工作。以往谈西方伦理学，多是跟着阶级斗争的路子走，常常材料不明却上纲上线，宏论大发，结果是无根游说充斥。先生想抓住机会，提供一些真实材料，让谈西方伦理学的人有所依凭。先生说这也算是正本清源吧。前些年曾从先生处借阅过是编的上卷。那是因为先生教我读莎士比亚时，要我注意莎翁对英国伦理学家的影响，特别是沙甫兹伯利和赫

起逊。当时先生就说这部书的下卷已准备多年，不知何时能编出以成完璧。从先生写的编者前言中知道，上编编成之日是一九五四年，正是我出生的那年，而第一版印出时已在十年之后了。编这种名著选是吃力不讨“巧”的工作。虽说有范本在前，但要厘定标准、规依体例、剪裁文章、推定译名、校改讹误，都是细碎繁琐之务。仅以我读过的上卷而言，800多页一大厚册，自古希腊至早期资本主义时代，涉及重要思想家近50人，著作60余种。编者下的是笨功夫，对后学却是功德无量。

八三年七月酷暑，几天前和先生约好去看他，顺便还几个月前借走的《新旧约全书》。那时圣经不好找，先生说读国学要通六经，读西学要读圣经，授我他常用的那册旧和合本，包着白色道林纸皮，已被先生翻阅的起了毛边。我知这是先生常在手边浏览的书，便抓紧时间粗粗读了一遍，想着赶紧还先生。约好下午两点半到先生家。但偏巧头天晚上在黑山沪嘉映那里聚会，与友渔、正琳、苏大哥几人聊得高兴，一夜未睡，沿着京密引水渠散步，在月影星光下“喳”歌儿，从贵州小调一路唱到贝多芬《自然神的赞美》。天亮后仍不愿散，接着聊，一直到中午。那时年轻，“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心中满是激情，眼中全无人物，寂静中偶有一曲飞起，不知是何，已然泪流满面。一个纯思唯美真爱的年代。当时嘉映已决定赴美读书，我挤兑他不能免俗，他只是狡猾地笑着，顾左右而言他。中午和嘉映分手，便去朗润园赴先生的约。

从黑山沪骑车到北大，不过二十几分钟。到了北大看时间还早，怕打搅先生午休，便在未名湖畔拣个树荫坐下读书等候。谁知一夜兴奋，加上天热蝉噪，竟在湖畔的轻风中睡着了，猛醒过来已是下午三点。天啊，迟到了，起身便往先生家跑。待拐弯离了湖边，却迎面碰上了先生。他老人家正急冲冲下小石桥，向东校门方向走。下午三点，骄阳似火，先生走得急，身上宽大的短袖老头衫几乎被汗水浸透，贴在身上，额头上满是汗珠，从白发间淌落。我上前拦住先生，问他为何当此酷暑。先生见我似大松一口气，说已经三点了，见你仍未来，想前几天有学生与校外孩子冲突，学校发通知，加紧门卫，不得让闲散人员随意入校。所以想你被拦在校外了，便下来看看。我真是羞愧难言，不过是自己睡着迟到，却害先生烈日下奔走。先生已是70多岁的人了，万一中暑，我罪莫大焉。急忙扶先生回家，先生却若无其事的样子，反对我说，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陪先生到家，屋里甚凉爽，一架电扇轻轻送着凉风。师娘埋怨先生，对他说不会进不来的，他不听，非要去看看。我忙给师娘赔罪，都是我的不是，下回不敢了。进先生书房，见书桌上整整齐齐摆着一摞复印件，上面有先生手写的几页稿纸。问先生，先生答是《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已全部完成送商务印书馆了，这是副本。我极为先生高兴，这件工作从五四年上卷编迄，至今已经快三十年了，终成完璧，是学界大幸，亦是后学大幸。先生神情愉悦轻松，说放下这副担子，可以优游岁月了，又说今天我还有“新式武器”给你看。见先生那张老书桌左侧靠墙处新放了一个架子，上面摆着一架双卡磁带录音机，是当时国内颇走红的一个型号“夏普575”，左右声道各有一大一小两个喇叭，放在先生桌上显得挺气派。先生告我这是stereo，又说旁人告他这是市面上最高级的机器，边说边向我演示只要同

时按下record和play键，就可以转录磁带，有人在旁边说话也不怕，没有干扰的。一听先生说就知道老人家不明白麦克录音和内置线路录音的区别。在音响器材方面，我自信比先生所知略多，便给先生解释录制磁带的基本方法。先生也不理会，只是得意有了他的“新式武器”可以借磁带来自己复制。

和先生处久了，便愈觉老人家无论腹笥多么宽广，修养多么丰厚，都会时时“倒空”自己，他永远敞开着，不带任何成见地听取意见，汲取知识。这在先生那里是自然而然，毫无刻意的。在先生意识里，没有“功成名就”这类玩意儿，求知之于先生，如呼吸之于生命。先生很早就知道我对古典音乐很用心，说他也极喜欢听，文革前有重要的演出他都会到场，还回忆起曾有一段当局和知识分子的蜜月期，那时有节目，学校会派车送老先生们去听。不过自打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就难再有这种恩泽了。文革之后，古典音乐被划归封资修黑货，都扫地出门了。和先生谈起音乐演奏的各种版本问题，先生大感兴趣。说以往听音乐只关心曲目，没注意过演奏中的不同诠释，要我给他找些范例。“有事，弟子服其劳”，先生的这个要求正是我可以效力的地方。因为那会儿，我正跟着建英兄满北京“跑片子”呢。

建英有个作曲家朋友，供职于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该厂音响资料室有“外汇指标”，可以从图书进出口公司购外国音乐资料。可惜资料室的工作人员不熟悉国外音乐资料，对该购何种曲目，哪个演奏版本心中无数。这位朋友就请建英帮忙选购。这对我们不啻于发现一座金矿。建英提出帮忙的条件是买了新唱片，我们先录一道。用他的话说，叫“先开槽”。通过这个途径我们转录了许多第一流的演奏。我给先生复制了一些精选的曲目和演奏。有时就把建英复制好了的磁带直接送先生复制。每次拿了磁带去，先生总要立刻复制，又不肯使用快速复制程序，说会破坏音质。所以送两盒90分钟的磁带，就会在先生家盘桓几小时，边听边聊，听先生谈天说地，真是快乐。一次建英告我他手里有一版极好的《福斯塔夫》，是卡拉扬指挥，Gobbi和Schwazkof领衔演出。我知先生喜欢这个戏，便告先生我们的“虏获”，先生说他也要一份。不记得因为什么原因耽搁，我一直没空去北大，先生竟来电话催问，想听这个版本的急切心情像个年轻人。先生似乎已经成了我们发烧友队伍中的一员。建英当时正在北大读研究生，我便请他上学时给先生送带子去。建英去先生家送了带子，还和先生聊了许久，回来告我周先生真有意思，说无标题音乐总听不大亲切，喜欢听歌剧，因为有词，听得明白。我们喜爱先生的天真谦逊。建英说当然不是先生听不懂，是先生自谦啊。其实先生爱音乐是有所本的。一次和先生聊起音乐在希腊的地位，先生说苏格拉底都梦想当音乐家呢。先生是在讲《裴多篇》中苏格拉底所说他多次梦见自己应当去从事音乐活动，制作和演奏音乐。甚至当他以为他所从事的哲学就是最伟大的音乐时，又被那些梦所困扰，最后竟认定自己应该去从事通常意义上的音乐。他甚至用竖琴与和声的关系来讨论灵魂不朽的问题。在先生看来，哲学和音乐在其根本处是相通的，一个读哲学的人是不能不听音乐的。

过了一段时间再去先生那里，见书桌正面也摆上了架子，放满了录制的磁带，大约有两三百盒。除了我和建英为他录制的，他自己也搜集了不少音响资料。先生最感兴趣的仍是歌剧，尤其是以莎翁戏剧为底本的歌剧，逢此必收，版本颇全。威尔弟谱写的《奥赛罗》、

《福斯塔夫》、《马克白斯》都有二、三个版本。但直到我把玛丽亚?卡拉斯演唱的《奥赛罗》、《马克白斯》送到先生手上，他才真满足了。当时我甚至对先生说，能唱出莎翁悲剧感的惟卡拉斯一人而已。先生将信将疑。我手里有一版EMI公司出品的卡拉斯演唱威尔弟悲剧唱段全集，建英对此评价极高，我便为先生翻制了一套。先生听后感叹说，卡拉斯就是当代的塔尔玛啊！在莎士比亚的传奇剧中，先生最爱《暴风雨》。在先生的文章《莎士比亚的人格》中，先生极推崇普罗斯彼罗深厚的宽容精神。以为自此，莎翁的人生哲学原理、行为的最高规范便是“直接诉诸于人”。但对贝多芬受此剧影响谱写的d小调钢琴奏鸣曲（op31N°2)却觉听不出门道。先生自己分析说，许是对《暴风雨》一剧读得太熟，心里装了太多的定见，不自觉地在贝多芬的音乐中找，反而迷茫了。我便谈了自己的感想以就教于先生，说贝多芬在作品中表达的是他读《暴风雨》的感受和思考，用音乐这种极具体又极抽象的形势表现出来，不太可能有具体的对应，例如哪个乐句表现了沉船，哪个乐句表现了爱情、复仇、宽恕。先生回应说听音乐也要心无定见，才好体会。其实，贝多芬在一八O二年写下的《海利根镇遗书》中已经提到，他盼望在他死后，能与世界宽恕和解，与此同时，他创作了被称作《暴风雨》的d小调奏鸣曲。他对申得勒说，要理解这部作品，“去读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吧”。这绝不是巧合，先生从《暴风雨》中读出的“出自深心之中的诚恳之念”——宽恕和解之道，必敲击过贝多芬的心弦。在先生看来，莎翁在他的《暴风雨》中告诫我们“凡是一个人，都与我们同样，即使他犯了错误，只要有醒悟，我们都有义务来回报自己的充分宽容……。他已从对自然的幻想与对人的过分要求转变为对人类缺点的哀怜”。我以为这正是贝多芬在d小调奏鸣曲中所要宣示给人们的。先生自然是懂贝多芬的。智慧与仁慈的心灵在彼此呼应着。

一次和先生谈歌剧，先生说威尔弟谱写的莎士比亚最能得其精髓，因为他也是个农民，是从乡下进城的，他从龙科莱村去米兰，莎士比亚从斯特拉特福去伦敦。起初我不太明白先生的意思，后来反复读先生论莎翁，才明白为何卡莱尔会说“我们宁肯交出一百万个我们国家培养的英国人，也不愿意交出这个斯特拉特福的农民”。先生以为莎翁的人格来源“第一他是平民，因此能对人的各方面的生活都体验过，都了解。第二，他是真实的平民，故不为世俗的矫揉造作的生活所欺所蔽。虽为女王嘉许，虽结识贵族甚多，但毫不受其影响，能够独自超越。第三，他是自得的平民，故虽受苦，但不绝望，不激愤，依然冷静”。先生拈出“平民性”来标定莎翁的人格基础，因为先生一贯以为平民性是普遍人性的基础，正是在这一点上，先生认定威尔弟和莎士比亚在人性上是相通的。事实上，威尔弟这个龙科莱村的农民，这个常独坐农舍、眺望荒野的天才，心中最尊崇莎士比亚，称莎翁为他的“教皇”。他不仅为莎翁戏剧谱写了《奥赛罗》、《马克白斯》、《福斯塔夫》，心中还酝酿着《哈姆雷特》、《暴风雨》、《李尔王》……。他的《利哥莱托》实际上是对未能谱写《李尔王》的一个伟大的补偿。

先生爱莎士比亚，把他当作知心朋友，甚而“总觉他是一位亲人，一个慈母，他不像父亲那般责我们的过失，却像母亲一样为我们的缺点原谅，还要亲切地问一声‘你这样怕过得

不舒服罢’”。在先生面临人生低谷，想高蹈海外时，莎翁的人格抚慰了先生苦闷的心灵。先生看这个人格平易、深厚、丰饶，如同四季时序的幻化多姿。春时“在他的人格的召应下，又如人在树荫下，一望四野碧绿的田畴，你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梦幻，产生自然爱，充满人间生活的喜悦，配以热情，加以幽默，如此整个宇宙都象在欢迎你”。“夏日，天空清朗，偶见薄薄浮云，远远传来断续的蛙鸣，不禁使我们心弦颤动。夜间明月下，再来一线萤火奔流，我们便不免梦幻人生”。“秋天来了，就象我们出了峡口，任我们的生命如何奔放的人，到此也要稳打浆，慢慢摇了”。“冬天的雪，风一来，人类的什么情感、欲望都显得收缩了。生活没有昔日的活跃，差不多凝固起来，真象一个冰房”。与四时交替相伴，各色人物粉墨登场，在世界大舞台上各逞其能。初春的凡伦丁、盛夏的福斯塔夫、霜秋的哈姆雷特。最后，在冬日的宁静中，斐迪南向米兰达唱出了热烈而凄婉的尾歌“只要在这牢房中能见到这女郎，地球的每个角落让自由的人去受用吧。这囚室已让我觉得很宽广”。

在先生看来，莎翁对笔下的众生，只让其上台亮相，谢幕下场，任其喜怒哀乐，生死浮沉，却不做道德评判。但是他从人性的深度去了解人，剖析人，却是一无形的“最深刻的道德批评”。先生治伦理学，是把莎翁笔下的人物性格、道德行为、善恶分野当作了研究标本。如歌德所言：“莎士比亚已把全部人性的各种倾向，无论在高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描写的竭尽无余了”。先生则认为“随着莎士比亚当学生走了一生。及到书本一丢，我们该说，我们了解了人”。记得我受教于先生之初，先生就教我读莎士比亚。先生要循着莎翁笔下的人物的踪迹，直探人性幽深的秘府。后来先生授我他的《自述》，先生说：“这时候，我在学哭，也在学笑。但哭笑都学得不好。我羡慕莎士比亚对福斯塔夫的笑，羡慕达文西所画《莫拉?里萨》的超善恶的笑。同时也向往托尔斯泰听完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和读完法国波埃西的《自愿奴役论》后的哭。但我要学他的，怎么也学不到。不过我仍要哭笑”。这是先生剖心析骨之言啊！

## 十

八十年代，中国的政治气候忽阴忽晴，盖因国朝始终上不了宪政国家的轨道。那些控制思想言论的老伎俩总不停地摆弄出来吓人。当局对知识人的自由思想、独立人格有着与生俱来的恐惧和憎恨，这是列宁式党国制度的遗传基因，不到这个机体灭亡是不会消失的。

八三年十月，邓小平在二中全会上讲了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自由化。思想理论界对当局的政治动向极为敏感，一闻风吹草动，立刻寻找此次谁是挨整对象，或扑过去咬几口，或避之唯恐不及。没想到这次锋芒所向竟是个德国古典哲学的概念——“异化”，“异化”的背后是人道主义。而挨批的对象竟然是前“文化沙皇”周扬。意识形态总管胡乔木竟对他的老哥们儿痛下杀手，说精神污染是个现实政治问题，周扬关于异化问题的观点可以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的政治纲领。周扬文革前害人无算，文革中坐了八年大狱，有点良心发现，想讲点人道，又不敢真讲普世人道，所以找到老祖宗年青时用过的词来说事儿。本来就是跪着造

反，没想到当家的还不许。天良未泯的周扬一怒之下再不说话，生生气成脑软化去世。看来要想在这块地盘儿上混，脑软化就是心软化的代价。

八四年春节，我去给先生拜年，闲聊中说起理论界的动态。先生对人道主义理论的前景极关注。问社科院是不是要组织批判人道主义，他有点担心文革余孽卷土重来。临走时，先生给我一本书《马克思与人》，我说这可是当红的题目。先生说里面的文章是他前几年写的，也谈到异化问题。回家后翻看，才读到先生写于一九八二年的《论人和人的解放》。读先生此文，感觉有点怪，他肯定通过异化问题研究人道主义、人性论是个"令人发生兴趣的学术趋向"，这是因为"自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现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后，有人据此认为人性异化的问题，即要求人的复归或人性的复归就是人性化。人性论比阶级论更根本"。先生以为从阶级论回到人性论，最终还是要追求个人的尊严、自由、幸福。对此先生并无异议。但先生又认为，人性的复归是"指一切有劳动力的劳动者（或生产者）的本来状态要复归。这是一种阶级论或阶级解放论的理论形式，最终是劳动人民的阶级解放"。据此，先生说"就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而论，只怕阶级论有时就比人性论更重要"。对先生的这个结论，我有不同的看法。在马克思的《手稿》中，阶级的解放是一切人的解放的手段。马克思是从普遍人性出发，经由阶级消亡而达于普遍人性的实现。在理论上，马克思《手稿》中的论述是自洽的。阶级论不过是人性论大议题中的一个论题，从而人性论是更具根本性的命题。而当阶级论被夸大到绝对时，必然引发对人权和人性的肆意践踏。这是斯大林和毛泽东权力斗争的看家功夫。

我给先生打了电话，明确告诉先生我不同意他的结论，希望能有时间向先生面呈我的看法。先生听后很高兴，说这个问题他自己也觉得没想透。他只是担心普遍人性会淹没具体的社会阶层的利益，法国大革命中就出现过这种情况。用现在的话说，先生关注的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先生的苦心我是明白的，先生在文章中也指明它的立足点在于"我们应该参加劳动人民的队伍，为'大老粗'、'土包子'讲几句公道话"。很快，我就去先生家向先生陈述了我的看法。先生仔细听了，说劳动人民在争取自己的自由和利益时，普遍人性论就要让位于阶级论。在这种情况下，阶级论比人性论更重要。法国大革命中的人权宣言是讲普遍人性的，但大革命中看到的是各阶级代表在争自己的的利益。我说那也要对结论严格限制。先生说他在文章中讲到法国大革命的史实也可算是一种限制。我强调阶级论的危险性，先生说他知道阶级论在共产主义国家中常被用作清除异己的工具，但阶级论本身是来自历史事实，不能忽略。我显然不能完全说服先生，便举出周扬的遭遇为例，以证明人性论如何成为阶级论的殉葬品。先生听后无语，长叹一声说，现在形势不好，连周扬都自身难保。六十年代先生曾为了伦理学科的设置问题和周见过面，那时他颐指气使，神气得很。文革中他吃了大苦头，看来是有所觉悟，想从阶级论返回人性论了。见先生谈及此，我便不再争辩。

八五年前后，先生曾要我读《尼克马可伦理学》。先生多次讲，读哲学一定要考虑伦理学问题，道德哲学是极要紧的。我以往读亚里士多德多注重形而上学和政治学的问题，先生认为是极大的缺失。其实先生很早就提醒过我，说《尼克马可伦理学》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本

书。后世治伦理学的人所讨论的各种问题，在这书中都有论述。但我读研究生时忙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梳理，竟一直未得空读亚里士多德，毕业之后才重回古典。读《尼克马可伦理学》我用的是勒布古典本。不懂处问先生，他对该书极熟悉，谈起来如数家珍，问他问题，总是随口解答，还常常告我某卷某节也谈到相关问题，可参阅。我在所里资料室查到先生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长文，细细读了，收益颇多。但向他谈及，他却说这文章受当时大气候影响，谈阶级论过甚，叫我还是直接从原文领悟为好。

二OO七年初，去国十七年后回京看望先生，在炒豆胡同老宅整理残简，竟然翻出一页与先生的对话记录，纸已发黄变脆，似乎一捏就碎，重读这几行文字，回想往昔与先生对坐，听先生解惑的情景，啊，那醉人的、一去不复返的时光！这页残简中记着如下对话：

问：求善难道没有现世意义吗？
答：亚氏以为幸福即是善的尘世报答。
问：但又何谓幸福呢？它难道不是一种心理感觉吗？
答：幸福当然是一种心理感觉，但是一种有伦理意义的心理感觉。
问：既然是心理感觉，那就无统一标准，而善在伦理学中是有特指的，此两者如何交汇？
答：那就需要确定幸福的含义，幸福的层次，一，心理上的愉悦、快乐，二，崇高感，三，美感。亚氏的层次，一，动物性、植物，是基础，二，理性独为人类的特性，无理性即无道德。
问：柏拉图的范型伦理，善的范型难道不是普适的善的理想标准吗？不是暗含抽象于尘世的诸种行为的普遍范型吗？……

问答中断以后，是我手记的几段话，大约是先生后来所述："为一无道之邦'自豪'是为大恶，因为自豪必是德行。自豪之人必备完美德行。""最高幸福不是道德状态，而是智慧的工作。直觉是最高机能，所觉皆崇高事物，故此得之乐为真乐"我的记录太简略，有些句子由何而来似应有上下文才好理解，但当时每次对话都令我茅塞顿开。

八四年，先生自全国伦理学学会中退了下来，少了些虚头八脑的名义，也避开了那群"马列主义老头老太太"，我为先生高兴。先生这种尊贵之人，与那些污七八糟的萎琐之辈周旋委蛇，我想起都觉心痛。先生退下来之后，更常召我去家里，或谈音乐，或聊形势，或论思想，或讲掌故。先生想谈的事极多，开口就停不下来。当时甘阳已经开始筹划他的丛书，我见他挑的那些书好，便愿意助他一臂，上手帮他打点编委会杂务。为编委会的事常去北大，每去必拜先生。先生对编委会的事情极关注，给以高度评价。甘阳曾想在编委会之上设一个学术顾问委员会，请一些老先生为编委会的学术方向提提建议，名单上就有先生的大名。此事商议过几次，甘阳却终未下决心实行。

十一

八九年底去国之后，难免要考虑在国外安身立命之道。心中所念也大多是政治问题。有一年多的时间，所读之书竟全涉及英美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史，没有什么超越的思想向先生汇报。那时家事国事天下事纠缠一身，心情颇劣，整天恍惚在《未完成交响乐》的氛围里，给先生的信也少。倒是先生常有信来，多不长，询问我在国外的境况而已。先生体谅我的难处，从不问我在干什么，只是鼓励我多看、多听、多想。先生对国内急剧左转的政治气氛很担忧，也很无奈。九一年来信说他心情颇不舒畅，也想出国呆一段。年底突然接到他从印度寄来的信，知先生去了印度桑地尼克坦的泰戈尔国际大学。泰戈尔曾希望“这所大学是印度献给全人类精神财富的代表。它向四周奉献自己最优秀的文化成果，同时汲取他人最优秀的精华，这是印度的职责”。先生在这里要盘桓一年左右，除了给学校开几次中国文化哲学讲座之外，再无他事，正可以读书冥想。在这《吉檀迦利》的故乡，“如今正是时候了，该静悄悄地同你面对面地坐下，在这寂静的横溢欲流的闲暇里，吟咏生命的献诗”。

不久就接到先生从印度寄来的文稿《人间野语》。先生劈头就问：“这个世界可爱吗？你真的爱过它吗”？先生分析道：“在这个世界上，偏有一些人，不肯进步向上，他们不做人事，偏做鬼事，……老百姓称之为魔鬼。即是魔鬼当然不认为这个世界是可爱的了”。先生痛省到，“我们受这些魔鬼的欺骗够多了，够久了……，他们的权力让我们的天真丧失，本性丧失，这还不算，甚至还要我们不能不同他们一起，在这个世界共同作阴暗的工作。我们耗尽了心血，作了违心的事，有时对魔鬼还感谢不已。这真是人生最大的悲剧”。但先生并不绝望。这世界终究是可爱的，因为有那样一些人，“他们仍然若隐若现的留存人间——不，也许更象夜间的皓月，照耀着人间，不与热烈的阳光争胜，却静静地冷眼看世界。人在烈日刺激下，总是不敢抬头看一看太阳，只能低着头看着太阳在地上的影子。但一到夜间，推开窗户，或独立窗前，便可放开眼目看月亮，看星星了，这是面对面的欣赏，面对面的倾吐，这是何等畅快呵！”

随后，在桑地尼克坦的绿树浓荫下，先生把眼光从天上皓月转向人间历史。这次他向伟大的莎士比亚致敬，用哲人之笔撰写历史之剧。先生写就了三幕历史剧《秦镜高照》，反思秦王朝兴之也速，亡之也速的历史。先生虽是从儒家的传统立场来看待秦亡原因的，但其着眼点却是中国的现实。先生借子婴与宦官韩谈的对话来阐发国朝几十年不得安宁的原因。

韩谈：“我是觉得我们的国家，弄到今天这个样子，真是十分可悲的现象。统一前，天天打仗，天天听杀死敌人多少的消息……，统一了，我们都以为天下安定了，谁知不久就感觉战争似乎还在打。但是，它不是在关内或关外的战场上，而是在秦国原来的国土内，起初，也许可说是在儒生范围内，被杀的人，也不过四、五百人，后来，扩展到同情儒生的人也逃不掉……。这种杀的办法，定罪方式，弄得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吭一声。甚至还要闭起眼睛，拍手称好。否则也是犯罪。这算是国泰民安吗？”

子婴：“你看，发生这情况的原因在哪里？”

韩谈：“首先，始皇帝在统一天下后，总觉得自己在战场上有大功劳，有自己成功的经验，过度相信自己，成了孤家寡人，众叛亲离。还有，最大的错误，恐怕还是，搞不清楚什么叫‘战时’，什么叫‘平时’。什么叫夺取政权，什么叫维护政权。国家一有什么不如意事，就疑神疑鬼，就用战场上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付手无寸铁的臣民或亲友，这样怎能不把和平安定的世界变成恐怖世界？即使是建国元勋，但治国无术，动辄就拿起刀剑来骇人，还不会把国事弄得一团糟吗？”

这里潜隐着的问题已不是简单的“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的判断，而事涉一个国家如何长治久安。是以战争方式治国，还是要走宪政国家的道路。先生借秦二世与赵高的对话，讽刺那些前不久还以秦王朝方式处理国家事务的红朝肉食者。

二世：“赵老伯，你的话，更说得我心里如雷一般震动。我想不到为了一顶皇冠，竟要这么多的亲属流血，我真有些心软了。”

赵高：“你的心太仁慈，这仁慈是不能对付政治大事的……。我看，你该横下一条心，再多杀一点，一方面可增长威风，一方面如能把杀人看成政治上常有的事，好似从水果袋中取桃子一样，久了，你的心就会慢慢地平静下来了。也许还是一件快乐事呢！”

九二年底，先生回到北京。邓南巡之后，左风稍敛，先生又乐观起来。我写信劝先生对国朝中事不必太放心上，这个国家要走的路还长，先生还是多多保养身体，冷眼旁观的好。象我这种人，关心国朝政治也不过是关心裹在政治圈中的朋友，所以体会不到先生对民族国家惓惓衷肠。那些劝慰先生的话轻飘的象一缕浮烟。

几年间，我们在法国安顿下来，心里就存了个念头，想接先生来法国住一段。九五年初，和嘉映商量能否实现。雪正好回国有事，便去面见先生，请先生首肯。先生很高兴，说能来法国见见我们也是他的愿望，于是雪便去安排机票、签证诸事。正巧灵羽也要来法国，便请她陪送先生。以为万事妥帖，谁知临启程前一周，嘉映来电话，说先生心脏不太好，大夫不同意老人家长途飞行。这消息让我左右为难。想见先生心切，又担心先生长途飞行万一有个闪失。先生毕竟八十五岁的人了。打电话和灵羽商量，她倒是快人快语，说先生一直在做启程准备，一门心思要去巴黎看你们，这时要他放弃，才真是要命的事。干脆依前议行动，其他不要考虑了。想她说得有道理，就安下心来等先生。九五年八月五日，灵羽护持先生到了巴黎，同行的还有先生的女公子邦洛大姐。我们在机场接到先生，回首先生八九年十二月在北京首都机场送我出国，已经五年多了。

安顿先生休息好，便和先生商量在巴黎参观游览的事。八月份我们休假，正好可以陪先生。先生说他最想看两个地方，一是先贤祠，他要拜谒卢梭的长眠之地。二是巴士底狱，他要凭吊法国大革命先驱建功之所。知道先生身体需加小心，故“强行”规定先生半天休息，半天游览。先生抗议说我到了法国，反倒不自由了。我们笑笑不理会他的抗议，反正心里打定主意，要让先生在法国平平安安。和先生商量后决定先去巴士底狱广场。我知道先生从来都关注法国大革命，这和他极喜爱克鲁泡特金有关。先生与巴金是老朋友。先生告我，巴金

先生曾一度信奉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故取名巴金。先生年轻时受巴金先生影响，也信仰过无政府社会主义。我曾经问先生哪本书对他一生影响最大，先生毫不犹豫地说是克鲁泡特金的《自传》。因为他从克氏的自传中“看到一个洁白、无私、坦诚，而为人类牺牲的灵魂”。克鲁泡特金的名著《法国大革命》是先生观察法国大革命的基本视角。即从普遍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待革命之不得不发生，它的伟大理想和革命过程中的缺失与迷途。

在先生看来，克鲁泡特金的精神是欧洲文明的根本，即“爱人，自由和牺牲”。先生指出：“人道主义在西洋流行已千年了，但西洋人的精神仍循着这条大路前进。西洋人提到爱自由，总是心志焕发。有人说西洋人是宗教精神维持的，我觉得这话说得笼统了，应该说是由广大的爱所维持的”。先生不赞成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批评，说法国大革命是平民为争取作人的权利而发起的革命，柏克站在传统英国保守主义立场批评大革命，偏见很深。先生极喜克鲁泡特金所论，革命应能带来道德上的进步，否则必是假革命的名义以行的权力之争。

第一次陪先生去巴士底狱是在一个傍晚。广场旁的巴士底狱歌剧院玻璃幕墙上还映着朦胧的天光。广场中央的七月圆柱顶上，金色的自由神披着灿烂的霞光。我们开车在广场上缓行一周，给先生指出刻在广场上的当年巴士底狱塔楼底座的痕迹。先生说白天还要再来一次，要照几张相留念。几天后，选了一个阳光普照的日子，又陪先生去巴士底狱广场。如他所愿，以七月圆柱及自由神像为背景照了相。先生手持那支黄藤手杖，挺立柱前，表情严肃。后来先生为这张相片写了一首诗：

“看那巴士底广场
纪念碑雄立中央
碑身是监狱砖石建成
碑底有烈士遗骸埋葬
碑顶巍然自由天使
面向众生庄严高唱
‘人间地狱终将倒
伫看历史公正大旗飘扬’”

并亲笔题写在照片背面，当作新年贺卡寄给我，我一直珍藏着。

去卢浮宫的头天晚上就和邦洛大姐说好，让先生好好休息。因为卢浮宫太大，拣要紧的看也要三个小时，对先生来说，是个“重体力活”。但先生兴致极高，显得“斗志昂扬”。待先生午休起来，便向卢浮宫进发。进德农馆，先到了意大利雕塑馆。先生在米开朗基罗的《被俘的奴隶》和《垂死的奴隶》像前伫立良久。随后顺长廊穿过波尔盖茨藏品厅进叙利馆，远远见米洛的维纳斯兀立长廊尽头。雕像前人头攒动，先生便止步，远远观看，说这座雕像远看亦佳。沿大台阶拾级而上，见胜利女神若凌空而降。扶先生上到台阶顶层，以胜利

女神为背影，与先生合影，便进入法国绘画馆，起始就是新古典主义，左手不远处，大卫名作《贺拉斯誓言》赫然在目，凛凛浩气扑面而来。先生连说："真英雄，真英雄"。请先生在《拿破仑的加冕》前坐下小憩片刻。先生说这画大的有些逼人，象身临其境。起身前行不远，就是德拉克罗瓦的《自由女神引导人民》，先生说在国内，有人以为这幅画是画法国大革命，还写成文章，其实它是受一八三O年七月革命启发而作。出法国绘画馆，左拐进"大画廊"，终于走到《蒙娜·丽莎》面前。那时还未给她修专馆，就和其他意大利绘画一起陈列在"大画廊"里。先生最赞她那"超善恶的微笑"，现在站在她面前，先生说原来想象画的尺寸要大一些，眼见才知并不大啊。我回先生说尺寸不大名气大，先生随口说这不是壮美，是柔美。看来谈到艺术品，先生就想到了康德。尽管参观时间已不短，先生也有些累了，还是走到了斯芬克斯厅，让先生与柏拉图头像合了影，先生读了一辈子哲学，岂能和哲学巨人失之交臂。告别柏拉图，便劝先生结束参观，回去休息，若还想看其他内容，可以再来。先生点头，便缓缓走出卢浮宫。巴黎的夏季天很长，黄昏时分，天仍很亮。先生兴致不减，说这么美的风景，应该再走走。于是我提议去圣母院旁休息一下，再去看看莎士比亚书店。这是毕奇女士印《尤利西斯》的书店。在神所医院旁停下车，和先生慢慢走过圣母院正门，经过查理曼大帝骑像过双桥，过河就是莎士比亚书店。

此时，夕阳的余晖正把圣母院的倒影投入塞纳河心，游船驶过，波浪起伏，摇荡一河碎金。我扶先生步上双桥，先生突然停步，凭栏而立，眺望河水，沉默不语。我侍立一旁，不敢打搅先生，心里却好奇先生在想什么。许是想起夫子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许是想起赫拉克利特所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许是想起阿波利奈尔的《桥上吟》"疏钟阵阵，流水荡荡，我们的年华一逝无踪"？不，先生此刻倒可能想的是身边这个顽劣小子，二十余年耳提面命，而今却遁身绮靡之乡，混迹孔方之场，武不能剑行天下，文不能笔写华章，虽忝为弟子，却不窥门墙，年岁徒长，依旧废人一个。可以想见先生心中的无奈与失望。但先生大人大量，从未因此责备过我，至多是嘱我不要荒废学业，有时间还要多读书，多想问题。先生的话我是谨记在心的。

先生到巴黎时，国平从德国过来，住在我这里。国平是先生喜爱的学生，能相逢异乡，先生极高兴，得空便谈天说地。正巧远在美国的胡平恰恰有事路经巴黎，住在离我不远的一个朋友家。这次师生邂逅巴黎，先生也称巧。胡平得空就来看先生，执弟子礼甚恭。万公润南两次过来拜见先生，也谦称是先生的学生。因万先生在清华念的是给排水专业，我就和他开玩笑，说周先生只讲希腊，不讲给排水，你算哪门子的学生。先生却一脸严肃地说，我和万公都是清华毕业，我们是校友啊！先生在巴黎和旧雨新知相聚，兴致极高。有时我要拉先生出去玩，他反会问我，今天会不会有人来啊？

先生在巴黎去先贤祠拜谒了卢梭和伏尔泰，又去巴比松村参观了米勒的画室。先生在北京的书房里，很长时间挂着米勒的《钟声》，先生在他的《自述》中说："我看到农田里的农民，总想到法国米勒的画《拾穗》和《钟声》，心里便豁然开朗起来"。拜谒卢梭，参观米勒画室是先生的夙愿，终得一了，先生心情极好。有邦洛大姐在旁精心照料先生的起居饮

食，先生说他在巴黎住一个月，人都胖了。我和雪能得机会侍奉晨昏，也觉心满意足。时间飞驰，不觉先生离法的日子就到了。虽说早知聚散无常，但偏偏“情之所钟，惟在吾辈”，终不能若无其事，心中怅怅是难免的。送先生返京的那天，托运好行李便与先生坐在咖啡吧闲聊。先生突然从包中拿出厚厚一叠纸张，一看是先生的全套医疗档案。心电图、化验单一应俱全。先生说我来前知道医生不愿我长途飞行，但我决心不理会，为防万一，我还是准备了一份病例副本，省得万一需要看病让你们措手不及。听先生这样讲，我鼻子有点酸，急忙打岔，安慰先生，说知道先生身体无大碍，必有百岁洪寿。先生大笑，说“老而不死谓之贼”，我可不愿当百岁老贼。送先生到登机厅，先生过安全门后回过身来，举起手杖，双手做一揖，便转身去了。我一下子忆起七六年初，寒冬雪夜，在鼓楼送先生上七路无轨的情景，一晃二十年了。此一别，与先生远隔重洋，不知几时才能相见。一下子眼泪夺眶，急拉住雪，掉头走了。

十二

先生回去了。随后几年常有信来，但多不长。新年春节必有贺卡，永远是殷殷的关切。我虽然忙于俗务，也不忘常给先生去电话。每次电话先生都会讲许多话，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到熟悉的友人动向。常常说着说着便突然停住，问我长途话费是否很贵。我和先生开玩笑，说挣钱不就是为了打电话吗，否则我会游手好闲。先生说他知道，在国外生活不易啊。

九八年初，先生辗转托人带来他的书《论人和人的解放》，里面收了一些他早年的重要作品，其中有我最喜爱的《莎士比亚的人格》，也收先生近些年的新论。读先生的著作，观点或许有异同，但知先生发言皆出自肺腑，这是他为人为文的一贯风格。他说“人，如果不是语出自丹田，谁愿老是听你只是喉管发出的声音，或者重复他人讲过的废话”。先生晚年发言不多，但“米豆千甑，不如明珠一粒”，言论与思想的价值不是以数量衡量的，先生在展望中国伦理学建设的前景时，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以为二十一世纪的新伦理学，首先不是把仁或爱（或利他、自我牺牲等）讲清楚，而是要先把公正或义（或正义、公道等）讲清楚”。“爱而不公正比没有爱更可怕、可恨”。先生何出此言？我想因为先生深深知道，正义论或伦理学中的正义问题，从根本上牵连着政治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由此，我们或可明白何以罗尔斯会继《正义论》之后，再作《政治自由主义》。

该书中收有先生作于一九三八年的文章《中国文化对目前国难之适应》，六十年前的文章，竟似为今天而作。先生说：“仅仅是生命（或生存）与财产，并不能构成神圣的人权。其必须以人格为根基，始能使人权成为不可侵犯的东西。须知动物也有生命，有生存，但不能因此作为权利……。仅有经济关系，仅有私产亦不能成为权利，经济，必须是有人格的人为其理想而努力所取得的成果，始有价值的意义，亦因而是不可侵犯的权利。这对那些鼓吹吃饱肚子就是有了人权的国朝上师，不啻一痛击。在外寇入侵，国脉危殆之时，先生力扬中国文化深厚的生命力，因为“中国抗战力量不在中国都市，而实寄存于中国的农民身上。

……须知我们几千年来文化之所寄托，都是在于乡民的生命上”。先生深信中华民族之抗敌精神深藏于中华文化之中。“所以我们今天该提起精神来，清楚地认识文化，并不只是指几箱古物，几本破书，几个团团圆圆的所谓学者之流，文化该是这一民族所有为其理想而努力之活动力。……文化，就是从久远的过去所流来的潮水，人沐浴于文化中，就是与一个巨大的生命之流结合，它能洗涤我们的心灵，也能鼓舞我们的心灵”。先生沉痛而激昂地宣示：“我们眼见日本军士的野蛮，他们国内人士之轻浮，以及使得我们最会生活的人民妻离子散，女污男亡，生活艰苦，相对饮泣的种种事实，都是他们予我们的反面鼓励。我们的人民，将会知道这一次战争，不仅是战场上的争战，还带来了文化的危亡，理想价值的毁灭问题。我们受过几千年训练的文化活动，决不会坐看其价值理想受辱甚至灭亡的”。

六十年前，先生就深信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是深蕴于那些胼手胝足、辛勤劳作的大众之中，六十年后，先生又提出“人民伦理学”，为那些被权势集团欺压凌辱的细民呼喊：“伦理学就是研究人民平时过道德生活的生活，他们当然既能爱“好”，也能恨“恶”，而道德生活就是靠爱与恨两个经验的积累，构成他们的性格和人格。而我们的民族精神，也要靠这些诚诚恳恳过生活，尽神圣义务的人去维持。……人民伦理学是非常朴素但又非常扎实的东西，也是十分广大十分深远的东西。既不以甘言媚世，也不对权势者奉承。它只是如劳动者的手足，一步一脚印地耕耘”。先生积一生之学，持平实之论，立足典籍而心在田野，从无一时动摇。其理念之一贯，心性之坚实，足为我辈后学楷模。念及而今某些学界“新贵”，不能守观念之贞于片刻，不惜诋毁华夏文人所秉持的“清流”理想，为求“用世”而狼奔豕突于权势之门，更知何谓“万物皆流而金石独止”。

二OO二年晚秋，竞马回国开独唱音乐会。我一时不能回去，雪带着盈盈回去了，知先生最喜歌剧，便嘱她一定请先生出席音乐会。那时先生已偶尔需轮椅代步，但上下楼仍坚持自己走。竞马在音乐会上献唱了焦尔达诺的《安德烈-舍尼埃》。这位法国大革命中泣血的夜莺唱道：

“我去近旁的教堂，
一位祈祷者伫立在圣母与圣徒的神龛旁。
他收敛着全部的施予，
却全不见颤抖的老人正徒劳地用哀求的双手，
乞讨微薄的垂怜。
我走过劳动者的茅舍，
听到他高声诅咒
脚下的土地、贵族和
他们的骄奢。
这苦难可使你高贵的心灵感觉歉疚？”

这正是先生熟悉的主题，也是先生常常垂念的问题。先生从头至尾聚精会神地听完了演唱。音乐会结束后，北陵亲自驾车送先生回家。雪从北京回法，带来了先生的信。先生用大字写了“范竞马伟大”五个字，觉得出来他极高兴听竞马的音乐会。只是信的结尾有些伤感地说，我九十岁了，这或许是我最后一次听音乐会了。

二OO五年，先生又寄来打印成集的文稿，题字在上面，说是“老残留言”。这些文稿我大多已经拜读过，惟有附在文稿中的一封毛泽东论及先生文章的信令我好奇。毛泽东让刘少奇读先生发表于一九六二年九月九日上海文汇报的文章《希腊伦理思想的来源与发展线索》。毛泽东就先生文章议论到：“所谓伦理学，或道德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是讨论社会各个阶级各不相同的道德标准的，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其基本对象是论善恶（忠奸、好坏）。统治阶级以为善者，被统治阶级必以为恶，反之亦然。就在我们的社会也是如此”。毛泽东的批语作于九月十五日，也就是说，先生文章一见报，毛就注意到了。几天之后，他就想到要让刘少奇读先生的文章。毛这位深谙权诈厚黑之学的枭雄，绝不会平白无故对希腊伦理学感兴趣。若不是有现实用意，这个问题对毛实在是太遥远、太抽象了，什么是其中玄机？

我给先生打电话讨教。先生说其实他一直不知道毛曾对他的文章有过批示，不久前北大李醒尘先生告他，并给了他一张复印件。这事让他也有点想不明白。只知道当年作文时曾着重谈了梭伦的调和妥协精神。先生还赶紧补充说，我是给文章戴了阶级斗争的大帽子的，那时候在这顶大帽子底下谈几句调和中庸已经很不容易了。再问毛何以会对他的文章感兴趣并要批给刘读。先生说他在文章中谈了两点，第一，梭伦的折衷调和成为后来希腊奴隶主民主派的政治路线；第二，梭伦手拿大盾保护双方，所以他心中的公正内容就是“调整公理与强权，协和共处，人人各得其所”。先生说，六二年初，中共开了七千人大会，毛刘在政治上有冲突，毛想向刘发出调和的信号，大家不要再争斗了，同心协力挽回局面吧。或许毛看到我的文章讲中庸、调和，就让刘也读一下，不要再揪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的事了，讲点中庸和谐吧。我吃惊先生对这事的判断与历史事实相差太远。先生对毛的用意的分析只反映出自己的善良和天真。这真是无奈，宅心仁厚之人对党国权力斗争中，人心之凶残险恶，永远缺乏想象力。

事实上，在七千人大会前，刘已经准备了一个讲话提要，共有四点：一，要放开讲错误，重病用猛药；二，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三，批分散主义要讲事实，一个都不能少；四，党内斗争过火，民主不够，庐山会议只反右不反左。这四条表明，刘已认定毛的路线是造成大灾难的原因。刘又在正式会议上讲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名言。毛这个猜忌心极重、整人术到了炉火纯青的人难道不明白刘这个“人祸”所指何人？六二年七月上旬，毛刘在中南海游泳池发生冲突，刘急不择言，竟说出“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人相食要上书的”。这是狠批了毛的逆鳞，犯了毛的大忌。偏偏在这次冲突之后，八月一日，人民日报重发刘少奇论道德修养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九月份又出单行本，共产党员人手一册，发行量竟一时超过《毛选》。共产党高层诸公中，刘是唯一一个写著作

涉及道德修养的人。虽说这部书早在红朝得鹿以前就发表了，而且毛早就赞赏过这部书。但在共产党的伦理中，对错的取舍永远系于最高独裁者的好恶需求。九月九日，先生的文章见报了。这真是历史的巧合。

先生的文章共分四节，一，伦理学来源于社会矛盾；二，为奴隶制所决定的社会生活的特点；三，围绕“中庸”“和谐”为中心的表现形式；四，争论的问题与流派。正像先生所说，他是给希腊伦理学的思想戴了“阶级斗争的大帽子”，但重点放在梭伦的中庸调和思想，这是先生想说的话。依我看，毛恰恰是看中了先生讲道德的阶级分野一题。因为“阶级斗争”正是他那时已经选定的整治刘和党内稍有异见者的致命武器。正因此，毛在给刘的批示中强调伦理学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还特别指出“就在我们的社会也是如此”。毛对先生文章的关注点，恰不在“调和”、“中庸”，而在把伦理学中的某些理论问题用作“现实阶级斗争”，其实就是党内斗争的工具。这种文本误读真是有趣。不过，是先生误读了毛，而毛是绝对不会误读先生的。毛借先生文章中所谈的问题给刘下好了套儿，只等着“收围”呢。

在毛将先生的文章批给刘少奇读的八天之后，毛就忍不住向熊向晖大发牢骚说“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六七年文革已起，刘已成毛的瓮中之鳖后，毛对巴卢库讲了实话，说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我们就发现资产阶级已经在党内占据高位，要推翻我们了。其实在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已经明确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并且点明，“这种斗争要反映到党内来”。这明明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刘却不明就里，在会上拼命迎合毛的阶级斗争路线，真是都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六七年，王力、关锋写了《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一文。毛亲笔在文中加了一大段话。疾言厉色地说：“千万不要上《修养》那本书的当。《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宣传唯心的修养论，对这本书必须彻底批判”。这才是六二年毛将先生的文章批给刘少奇看时没明说出的心里话。毛的枕边人江青不小心说了大实话，“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受了气，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给毛主席出气”。六八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冲毛撒娇发嗲，说彭真欺负了她，毛立时给娇妻撑腰，说“彭真算什么，我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打倒他”。这就是中国最高权力机关的会议，形同黑帮团伙。毛自己倒是说得坦白，“我们就是造反，和当年宋江差不多”。

我丝毫不想苛责先生对毛的误读。心底光明的人常常对那些内心黑暗纠缠的人缺乏体识。房龙何等聪慧之人，看纳粹在德国的种种恶行，竟以为是“希特勒在搞小孩子的恶作剧”。罗斯福阅人、阅世不可谓不深广，在与斯大林打交道时竟然“直觉他是个高尚的人，可以和他携手共建民主世界”。就在这时，希特勒正在制定灭绝犹太人的计划，斯大林已下令在卡廷森林枪杀了二万余名波兰军官。善恶相较量时，恶总会在当下的争斗中占上风，这真是造化捉弄人。后来我几次向先生讲述我的看法，也举出许多确凿的史实来说明。先生有

些同意我的分析，但又说他还有一个角度不可不虑及。毛本起于草莽，素称自己是“土包子”，骨子里是朱元璋一类的帝王，他亦喜欢魏武，外显壮阔雄大，内藏阴柔权诈。最不耐烦道德修养一路酸文假醋。而刘偏偏在七千人大会之后重印《修养》，搞得全国轰轰烈烈学习，让毛心里不舒服。我力争这绝非个人性格喜好问题，而是由一套政治制度所决定的权力斗争方式使然。先生感叹说毛这个人一生待人处事，于公德私德都大有欠缺，对刘的斗争就太残酷，几乎搞到尸骨无存。我说，为保个人无上权位，而一逞狂想，陷亿万生民于水火，如此人物岂是公德私德有欠就可尽括？几十年来，国朝上下道德沦丧实自毛始。先生说“你讲的有些道理”。

二OO六年，突然接到先生自国内打来的电话，有点吃惊，平日都是我给先生去电话，先生有何急事找我？让先生挂下，我再拨打回去，先生在电话中语气沉重地问我，是否知道天予把国平告上了法庭。这事缘起于国平在《自传》中提到建英的哥哥郭世英文革前因X小组案被整肃的事，其中提到了天予，而天予认为所言不实，一定要讨个公道，便要与国平对簿公堂。先生为此事甚着急，从北京来电就是要我劝两造和解，说事已至此，怕只有你能劝说他们两人息讼。我告先生我完全无能为力。先生却不依，执意要我有所行动，说真打起官司来，必是亲痛仇快。先生说现在重要的是反省批判那个年代，在那时候，谁说过什么，做过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先生情绪有些激动地说，同学之间有什么账好算？谁和毛泽东算过账？谁和刘少奇算过账？那场把天予整成反动学生的运动是彭真直接领导的，谁和他算过账？如果不记取教训，对同学们受过的灾难不反省，将来悲剧要重演的。

我当然同意先生的看法，但比先生更了解此刻的国平和天予。人难免有一“执”，事关自身名誉时，便愈发“执”得厉害。天予、国平当然都是尊敬先生的，但年轻时结下的怨真不容易化解。人很难改变年轻时认定的事实。在先生看来，俩人仍旧都是他所喜爱的学生，老师说话总会起作用。在我看来两人皆囿于自身所执之事，以为原则所在不能退让。先生为此事几次催我有所动作，我想先生太高估了我的能力。我知道先生曾请国平到家中，表示由他亲自作东，请天予、国平吃饭恳谈。先生幻想能把盏尽欢，前嫌冰释。尽管学生们仍敬重他老人家，但要他们尊师嘱行事已不可能，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国平当时表态说只要天予撤诉，他愿作东请客与先生一聚，答谢先生的关心。先生也与天予谈过，天予说只要国平道歉，他也有息讼的意愿。但难就难在“只要”两字上。这是一死结，解执惟一方退让，而这一步实在难退，因为两人都有道理可说。天予是科学家，国平是诗人哲学家，看问题的方法、角度都不同，这样两造又如何调解？先生爱他的学生，以为必须呵护两人，谁也不该受委屈。我爱我的朋友，但知道男人间的事，该杀该打只能由他们去。这点难向先生言明，只好敷衍先生的嘱托。我对先生说，您就自当哥儿俩打架，家长两不相帮。让他们打个头破血流自有停手的时候。先生刚直纯正之人，总也搞不明白我在扯什么淡。最终先生不愿看到的情况还是发生了，问题终在法庭解决。判决国平胜诉之后，我与先生再次通话，先生只是重复说不应该，不应该啊，都是受害者。在先生心中总觉自己是有孩子受了委屈的家长，但

先生不知，天下哪有听家长的孩子。

O六年底，去国十七年后，我终回故土。孤舟一系，当然首先要去看先生。十二月二十六日，飞机落地正是中午，怕打搅先生午睡，便先到正琳家吃饭。与正琳八九年别过再未相见，此刻重逢，今夕何夕？兴奋难以言表。付大姐的牛肉粉真是天下第一。在正琳那里呆到三点钟，便去看先生。与先生自九五年巴黎分手，已逾十年，而告别朗润园十公寓已十七年了。楼前老白杨树仍在，而木叶尽脱，几株干枯的植物在寒风中萧瑟。走进楼道，见玄关更加破旧，似乎这这些年来没人维修过，楼梯已有数处剥落。寒风从楼门破损处吹进，寒意袭人。想昔日同学少年，谁个不宝马香车，华屋美舍，更见先生此处的清冷落寞。敲门，邦洛大姐开门，引我们进屋，先生已坐起等候。原本嘱邦洛不要早早惊动先生，但先生毕竟知道了，中午竟未午睡，一直坐在那里等候。先生的房间仍是老样子，那张老书桌忠实地陪伴先生阅尽岁月沧桑。屋子里多摆了一张躺椅，愈显得局促。记得一位波斯国王曾往潘布罗克小屋拜会曾两任英国首相的约翰?罗素，罗素先生为房子的狭小向国王道歉，国王说："屋子确实不大，却住着一位大人物"。先生能在这方寸之地亲炙中外先哲，又有何小可言？书房门上挂着先生手泽，为文天祥在元兵狱中所作：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
唯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先生在旁注道：为国尽忠，乃义之尽也，为民族尽孝，乃仁之至也。

南墙原来放置康德全集的小书架搬走了，挂上了先生手书条幅"殷鉴不远，多行不义必自毙"，注明"二OO一年六月四日"。知先生心中仍牵挂着十七年前少年学子的喋血。那些曾经鲜活亮丽的青春之魂始终活跃在先生的记忆里。这悲哀如此深重，在已近百岁的先生身上，几是世纪之哀。与此相比，我更惊异于那些衣马轻肥的学界新贵，他们那样轻浮不屑地对这些模糊的血肉扮着鬼脸，尽管我亲见他们也曾在死者生前的行列中举起过拳头。敬问先生起居，先生频频点头，说好，好，只是老了。先生确实老了，临近九十六的人了，能说不老吗？先生走路要人搀扶，或靠支架扶持行走。但先生的活力和精神又好得让人吃惊，尤其是谈吐问答之敏捷，头脑记事之清楚，几乎是一奇迹。我们也知道有近百岁的老人生命虽在，但灵魂已走。而先生，正如圣?奥古斯丁所言："只有能拿走我灵魂的人才能带走我的生命"。向先生呈上在香港出版的宾雁纪念文集，先生拿过左右端详，说书印得漂亮。又急忙让我读他前几个月在唐君毅先生纪念会上的发言。先生在这文稿的一句话下面重重画了道红线："唐先生对人类，爱其生，悲其苦，一生依靠一只手，一支笔表达他的善意"。我想这正是先生夫子自道。先生曾在《论人和人的解放》一书后记中写道："我佩服古往今来站在人民一边，捍卫人民的权利与人格的有良心的志士们的气节与灵魂。我手中只有半支白粉

笔和一支破笔，但还想用它来响应这些古今中外贤哲们的智慧和勇敢”。正想着，突然耳边听不见了先生的声音，原来老人家已经聚精会神地读起了宾雁纪念文集，不再理会我们的闲谈。北国的冬日，天真短，只觉片刻，天竟黑了。打开灯，柔和的灯光洒在先生的白发上，先生捧着那部厚厚的书，凑近眼睛，读着，读着……。我们不再说话，静谧飘来，带我回到七五年的冬日，我初登先生门的日子。就在这个时刻，就在这间小屋。

三十多年，走近先生身旁，受先生教诲，体会先生的伟大人格，渐渐明白，希腊先哲所区分的“静观的人生”与“活动的人生”在先生身上是浑然一体的。先生用超越的纯思贡献学术，又以入世的关注体察民生。平日慎言笃行，却不忘读书人“处士横议”的本份。邦有道，先生闻鸡起舞，邦无道，先生鹤衣散影。内心守死善道，终不忘循善取义。见先生手录佛陀临终语置于案前，“诸有为法，悉皆无常，精励行道，慎勿放逸”，知先生是勘破红尘后仍素怀持守。想先生这一代读书人运气真差。古来“士可杀而不可辱”，而国朝治士，前是先辱后杀，后是辱而不杀，再后，直教读书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觉其辱，甚而以辱为荣，反辱同侪，竞相作辱人者的同道。清流尽扫，士林心死，其哀何之？先生知其辱而保其尊，守其弱而砺其志。信大道如砥，虽身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说：“我希望人类终有一股正气来让人类能安静生活下去，可能这也只是希望，但比较合理一点，也许是可能的。狂风暴雨之后，将有晴朗的一天，这大约是气象学上的规律。我们过去已经等候久了，可能还要等候。今年我给朋友的贺年片上都写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话，看来天总归是要明的”。钱钟书先生曾拈出刘孝标《辩命篇》一语，“‘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故善人为善，岂有息哉”，来解山谷诗。先生引此语，亦恰是此意。九一年时，先生曾作文总结好友许思园先生的一生，先生说：“他在特有的孤恃外，更有他特有的天真，使人觉得这个世界究竟还有一些在天空下独往独来的人，令孤独的人不觉得孤独。他好似月夜里一颗孤星，并不被睡着的人看见，但却为那些整夜不能入睡的人，忽然从床上透过明窗发现——它的光是何等清明。它的面目是何等安详而令人遐想！人为什么非在烈日阳光下，鸟语花香中生存，否则，便不算生活呢？为什么在半夜里、天空中、寂静地蹒跚而行，就不算是一种良好生活呢？”我以为这段话再恰当不过地描述了先生的一生所求。

O九年一月一日，给先生打电话恭贺新禧。先生那天谈兴极浓，说话滔滔不绝。谈到国内形势，先生说，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大人物只关心自己的小事情，而小人物的大事情却没人管。先生怕我不明白，特地解释说，大人物的小事情就是升官、出国、捞钱，安置子女。大人物做起这些小事情来卑鄙得很。小人物的大事情是生老病死，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社会没有公义啊。先生又说，大人物可要注意了，小人物的大事情办不好，大人物的小事情也会出麻烦。一个社会没有正义，必定要出问题，人类几千年历史就是这样走下来的。听先生这番话，我几无言。昔庄周大小之辩，辩在孰优孰劣，而今先生大小之辩，辩在黎民苍生啊！先生又讲起国内学术腐败问题，说已成痼疾，从前为士林不耻之事，而今竟成通则。士无廉耻，国无希望啊！人在海外，对国内学术界的糗事常有所闻。年前回国，朋友

们相聚也谈及此事。我却不甚吃惊，本来自红朝得鹿，谀桀颂纣皆是文章，而今革命怒吼为市声喧嚣所代，焚琴煮鹤亦成雅玩，此事本一体两面，不足为奇。伤心惟是中华三千年衣冠文物，旷绝幽奇之事渺不可寻。先生纯然一读书人，痛心疾首也是当然。我们无能挽狂澜于既倒，只能寄希望于中华文化生命坚韧顽强，破土重生。

先生耳朵有些聋，说话怕我听不清，便声高起来，话筒中竟觉得有些震耳。先生最后感叹说，过年我就98岁了，还想去法国看你们啊，就是不知航空公司肯不肯卖票给我这个“98病叟”啊。说到“病叟”两字，先生有点自嘲地大笑起来。在先生的朗声大笑中，我却不由泪水涌出。怕先生察觉，匆匆挂断电话。

呆呆坐着，许久，许久……。天渐渐暗了，几点细雪飘落，悄悄地洒在青竹赭瓦上。先生言犹在耳，透骨的悲凉弥漫开来。寂静中，仿佛见到先生，在清河小营哲学班的教室里。先生刚擦完黑板，回身转向我们，飞舞的粉尘在阳光的裹挟下变得金灿灿的，罩在先生身上，先生的身影模糊了，像峨嵋金顶上隐现的佛光。而耳边的天音却有着川腔：“巴门尼德说‘存在是一’”。

后记

今年元月二十八日先生起床穿衣时不慎跌倒。夜间便觉背痛，送医院检查，未见骨折，返回家中。二月四日，腰部见有小块红肿，又去医院查。医生仍说无大碍。那几日常与邦洛大姐通话，手边自一月份动手写的《辅成先生》已完成四章。想全文完再呈先生审阅。本来写先生就感绠短汲深，未成全璧的东西更不愿给先生看。还有一层私意在，盼先生能平安养好跌伤，成其百岁之寿，这样总能看到我的全文。但雪说，还是尽早把成文的东西呈先生寓目吧，让他知道你在写他。问邦洛大姐先生可有精力读文？大姐说先生每日仍能读两个多小时报刊文章。于是传文过去，大姐打印出来送先生过目了。先生一气读完，只说了一句：“写写也好，让别人也看看”。此是何意？先生知我往来素不过两三子，这“别人”是谁？莫不是先生想让我将此文公之于众？

二月十八日，再打电话，邦洛说先生正在电话旁边，今日精神不错，可以说几句话。等了片刻，话筒中传来先生的声音，大不似往日的洪亮，有些气促声微。只说身体不太好，又问我几时回来。我即告先生今年暑期放假即归探望先生，请他千万珍摄，耐心治疗，等我回来。先生说声好，便再无声音。这是和先生最后的接谈。放下电话，便告雪定下八月一日返京机票。

二月底，胡平自美来电，说听到先生病重的消息，心里很着急，问我可有新消息。我告他前几日还与先生说话，胡平似稍放心，嘱我有消息尽快告他。并说已请嘉映代他去看望先生。三月八日，胡绩伟先生亲往朗润园看望先生，告之自己大病终愈的经验。先生闻后甚受鼓舞。三月十一日，嘉映往朗润园看望先生，回来后电话告我先生精神尚可，坐谈近两个小时，先生还忆及九五年在巴黎的日子。我听后稍安心，三月二十八日，家兄自美回国，与家

姐共往探视先生。因我与家兄长相相像，先生竟以为是我归国，惊问“你几时回来的”。家兄竟一时未敢道明真相，许久后才说我不是越胜，是越胜的哥哥。先生即送家兄文稿一册，并坚持要签上名字。但四月一日，病情急转之下，送北医三院诊治，不料一月中竟四次转院，进进出出，元气大伤。期间因插胃管引起胃出血，又加肺部感染，一度入住重症监护抢救室。五月二十二日，是嘉映父亲的追思之日，家姐前往途中接邦洛大姐电话，告今晨因医生反复“洗胃”，造成先生血压陡降，然后上一系列抢救措施。先生始终神智清醒，平静注视医生们的忙乱。在医生最后挪动头部时，突然闭目辞世。先生平静而绝然地走了，始终保持着哲人的尊严。

五月二十六日，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先生生平介绍中说“一九八七年因故办理退休”，此话甚蹊跷。何谓“因故”？因何故？语焉不详。或许那些秘密档案终有大白天下的一日吧。北大校方无一人出席告别仪式。先生服务北大近六十年，育人无数，而校方竟吝于表达些微的谢意。蔡先生的学校已然变得如此缺乏起码的礼貌和教养。让我宽慰的是，我们哲学班的同学来了，向先生作最后的告别。虽然离开先生已多年，仍知为先生执弟子礼。先生教过的孩子，仁义总是在的。

八月返京，往朗润园先生故居，已是人去屋空，只剩先生翻过的那些书卷默默地看着我。往老山谒先生灵，对先生说，我来晚了，未及送您老人家。我想先生等我，而您终等不及，先自去了。见先生遗容，雍容大度地微笑着，知先生不怨我。后将《大悲咒》一卷奉于先生灵前，作永久的祈福。先生一定知道小子的心愿。

此次回京，得空往故园祭扫先慈先严墓。事毕随北陵及姐弟览观五台，寻古刹清凉。山路蜿蜒二十余里，见岚气出岫，虬松挂崖，青霭苍苍，层层染绿。山中阴晴不定，骤雨突至，一片迷蒙，忽又骄阳扫雾，满谷黄金。有孤寺高居梁上，隐约疏钟回响。转一急弯，素石碑楼兀然矗立，乃入清凉界。昔阮嗣宗遇大人先生于苏门山，即此太行余脉。大人先生与之畅论天地玄黄，大道存废，后长啸而隐。嗣宗归而传之曰：“先生从此去矣，天下莫知其所终极，盖陵天地而与浮明遨游无始终，自然之至真也”。

清凉寺中庭有巨石如船，名“清凉石”，纵横十余尺，高丈余，重数十吨。石身苔藻斑驳，遍体纹理飞动，隐然有灵气，似远古高士化身。其沉稳坚厚，古意萧远，寂然独在，不正如辅成先生吗？先生远行已近百日，谁知其所终极？依先生心性，必会寻此清幽之地以避嚣尘，托体崇山而岿然静卧。有天风流荡，万籁谐响，巨木俯仰，群鹤环翔，又有幽泉濯之，云霞蔚之，丰草绣其锦缛，冷梅献其芳馥，伴朝暾夕曛，夜月晓星，闻晨钟暮鼓、梵呗法音。于千山万壑中得大自在，历万世而不坠，同日月而永光。

呜呼先生！呜呼先生！

二OO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完稿，十月六日改定于奥赛小城。

# 忆宾雁

宾雁，你已离开我们独自远行。时隔多日，我却依然沉默。不是思念你的哀痛令我不能开口，而是心里有太多的话想对你说，壅滞在心间，竟不知如何说。去年为你八十华诞，苏炜来电话邀我写点什么。我答应了，但坐在桌前，却茫然不知如何下笔。近三十年交往的记忆如一道奔溪，从心间流过，想伸手留住它，却仅在纸上洒下点滴印象，而你这个人竟在这些杂乱的记忆中消失了。于是明白，你这个人不是轻易能写的。没有普鲁塔克，吉本式的巨笔，又怎能去描绘那些横空出世的人物。结果竟爽了约。

自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和你通话后，心中便有种不祥的预感。从话筒中传来你的声音，以往的浑厚已经变得沙哑，说几句话就要停下来深深喘气。我不敢和你说话，急催你不要讲话，只听我说。但你执拗地要说。谈起你的病情，一如既往地乐观，甚至谈到出现了腹水时，也仍安慰我说“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我要挂断电话，你突然说“最近不要总打电话了，有事就通个消息”，之后还不忘问起张雪和盈盈，“噢，别忘了问她们母女好”。放下电话，我在黑暗中静坐良久。问自己，什么是“有事”？莫不是你内心中已经听到神的召唤？果然通话不到两周时间，你就再次入院，随后就永远离开了这个让人眷恋又厌恶的人世。

西塞罗说过“那最具美德和最正直的灵魂可以直达天国”。宾雁，倘有天国在，你的灵魂必直入天庭。你终于离开行走一生的荆棘之路而得永恒的安息。这便是我们仅存的安慰。

这是怎样的行走啊！虺蛇啮咬，飞沙掩埋，酷日烧灼；在高山荒漠中厉声呼喊而罕闻回音，却时遭虫豸的冷嘲；你想掘出一眼清泉，来浇灌一个民族饥渴的灵魂，却只见无涯流沙，干枯冷漠；你在暗夜中寻求光，它却隐匿着，吝于透出一丝微茫。你走在一条西西弗式的道路上，只有攀登没有到达，只有劳作没有收获。

但你从不动摇。像古往今来一切大智慧的先知，你总在关注那些歌德所称的“公开的秘密”。在卡莱尔看来，这些“公开的秘密是那种展示给所有的人，却鲜有人能察觉”的“事物的真实本性 ”。九州之上又有多少这种“公开的秘密”。只因独夫沐猴而冠，便有动用国家暴力的宗教迫害。只因统治集团需要利益瓜分，便不惜毁家裂土。盛世喧嚣，淹没着苦难的哀声。政绩建设，上演着弑母的狂欢。权势者的腐败成为时尚标志，宣教者的伪善变作道德楷模。社会生活被治人者有意引向堕落，智慧的声音挡不住意识形态的蛮横。网络有思想警察殷勤照料，言论被宣传官员严加管束。没有个人尊严，它遭受着当权者的恣意羞辱。没有个人权利，它已经被一党全权代表，却不需任何授权。有谁不知这公开的秘密？ 只因日常不得不与之相处便视而不见、见而不怪了。你却被它折磨得寝食难安，仿佛命运托付给你这个使命，“做一个公开秘密的揭示者”。而这正是先知的使命。每念此，我都被你的大勇所感动，却在心里悲叹先知的命运。这些勇者很少不是悲剧性的。

如今，你离开我们已过半年。先人所说的“生前身后名”，其实早已于你无碍，只剩下亲人和朋友的思念真实而久远。宾雁，你上路时正是飞雪漫天，而今已是盛夏，万物欣欣。

清晨，我行走在林中河畔，你的身影会浮现眼前。还是那条你所熟悉的林中路，我们曾在这条路上漫步倾谈。你在这里时，当是嫩竹初栽，眼下却已亭亭玉立，纤杨细柳亦成浓荫。人说，枝繁叶茂时最宜回忆，我奢想能记下我们近三十年交往的点滴，将这微薄的记忆之光奉献给你。或许它能陪伴你的英魂，度过寂寞的时光。为此，我祈求诗人羽翼的庇护：

“我眼前所有的已自遥遥隐遁，
那久已消逝的要为我呈现原型。”——《浮士德》

## 一、苦寒的拂晓

北风其凉
雨雪其雱
惠而好我
携手同行
—— 《北风》

一九七八年，我去社科院哲学所《国内哲学动态》编辑部工作。这是一个不公开发行的小刊物，目的在于更快地收集和反映全国各地的思想理论动态。编辑部主任是从《中国青年杂志社》调来的任俊明女士。一天，编辑部在开例会，我的座位正对着门口，忽然门轻轻开了，进来一位身材高大魁伟的男子。他是来找任俊明的，看我们正开会，便轻轻一弯腰，对任说：“我过会儿再来”，就转身出去了。任女士回头问我：“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刘宾雁，毛泽东钦定的大右派，刚调到《哲学译丛》编辑部。”熟悉中共建国史的人，对刘宾雁这个名字恐怕不会不知。七六年“四五”运动期间，我曾和父亲争论过中共统治二十余年的是非功过，在谈到反右时，我还提起过他。刘宾雁在我心目中是争取新闻自由的先驱，五七年蒙难，死活不知。今天突然出现在眼前，又和我在一个单位上班，让我惊奇又好奇，很想找他聊聊，问他几个藏在心中、长久不得解答的问题。

当时我年少气盛，没想过严格说来我们是两代人了。为了找个和他搭话的由头，我特意去问任女士，他在找什么。任告诉我他在找东欧国家哲学界的动态资料。我便请资料室刘青华先生帮我收集有关这个主题的目录。青华先生给了我一份东欧国家哲学界的论文目录，我拿上它去《译丛》办公室找宾雁。看到我手里有这么多他感兴趣的文章题目，他极高兴，连连谢我，反复说还是哲学所资料室资料全，让人大开眼界。我问他为何对东欧国家的哲学感兴趣？宾雁的回答让我吃惊，他说：“我想看看里面有没有解冻的苗头”。这话的深意我是后来慢慢体会到的，但“解冻”这个词却令我兴奋。

从爱伦堡的《解冻》发表之后，这个词就为渴望自由的心灵所向往。它使我们俩人的对话立即顺畅起来。宾雁对我这个素不相识的毛头小子如此坦诚，颇令我意外。想想他这一辈

子遭受的苦难吧。在这块土地上，他永远是敌人，伴随他的总是监控、告密、批斗、凌辱。二十几年下来，他竟对人毫无防范之心。我们一直聊着，一起去食堂打饭。通常中午休息时，宾雁会在译丛办公室把两张桌子并在一起，铺块毯子就在这桌上小睡片刻。但那天宾雁没有睡午觉。自那时起，我们常常一起下班，骑车沿南北小街回家，一路交流各种政治信息，谈论最近读的书，想的问题，永远有说不完的话。到东四十条分手，我往左拐回锣鼓巷，宾雁往右拐回三里屯。冬天刮西北风时，看他费力地逆风而行，努力躬着身子蹬车，寒风吹散他已经花白的头发，骑出几十米必定回过头来再招招手。我心中感动，认定这是个今生今世的朋友。其实我比宾雁小近三十岁，真有点不知天高地厚。

那时我正关注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首先吸引我的是阿多尔诺的音乐哲学，因为觉得他对十二音体系的论述太政治化而转读马尔库塞的美学心理学批判。看到宾雁对东欧国家哲学界的动态有兴趣，我便把马尔库塞的成名作《苏联马克思主义》介绍给他。宾雁读书极快，几天后就把书还给我，说这书很有价值，应该翻译出来。并对我说，其实他最感兴趣的是南斯拉夫哲学界实践派的思想，读了马尔库塞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认为它们之间有相通之处。他一再提醒我应该去读马尔科维奇。我不熟悉这个人，宾雁告诉我，他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当作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七八年初，异化问题在国内哲学界还很少有人关注，宾雁却已经注意到这个概念对瓦解现存意识形态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异化是确立人道主义的基本概念。宾雁思想之敏锐，视野之开阔，让我吃惊。有趣的是，宾雁在介绍南斯拉夫实践派时，用的是“新左派”这个词，给我印象极深。宾雁是做事认真的人，几天以后，他就复印了一篇马尔科维奇的长文《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要我读，说他正考虑编一部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想收入这篇文章，要我读完之后把它译出来。真巧，我从西方的法兰克福学派读社会批判理论，宾雁从东方的南斯拉夫实践派读社会批判理论，竟是殊途同归。现在回想在七十年代末，“社会批判”这个概念为何如此吸引我们？更确切地说，为何宾雁会对之如此着迷？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或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是以后现代社会为批判对象的。但当时在我们心目中，马尔库塞所使用的 Establishment（现存权势集团）完全可以拿来指称专制集团。所谓“单维人”的概念也可指极权社会中受压抑的个人。特别是无压抑文明的概念，对于无往不在枷锁中的国人更有感召力。宾雁关注南斯拉夫实践派，也有几个特别的着眼点。一是以人民名义行使统治权的党政集团，怎样异化为全社会的压迫者。二是马克思的人道理想怎样引出了无人性的社会制度。三是马克思关于自由人的论述怎样变质成压抑人的精神自由的意识形态，它敉平人的创造性思维，使人丧失人性。这些问题令宾雁思索。因为他曾把青春献给这些理想，却眼见它们成为当权者的谎言，而那些真正信奉和实践这些理想的儿女反遭吞噬。当时我认为对共产政权的决定性批判已经由两部旷世杰作所完成，理论上是吉拉斯的《新阶级》，文学上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但宾雁不同意，他认为，列宁主义是一个极坏的转折，他的阶级、政党、领袖相互关系学说，是使马克思理论彻底变质的关键。宾雁多次强调，这套理论在中国未得彻底清算之前，马克

思学说中有生命的东西就不可能成长。这真是宾雁的洞见。

七八、七九年，思想界一些有头脑的人正积极地寻找理论上的突破口。当然，他们的努力仍跳不出马克思理论的框架，但一些人希望能够在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中发掘出新的思想资源，作为批判毛式意识形态的根据。在马克思思想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异化概念就成了这个突破口。宾雁是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人之一。事有凑巧，当时高尔泰先生刚借调到社科院美学研究室，我常和他在一起聊天，书法，绘画，美学，文学，海阔天空。高先生曾把他为女儿手绘的一大本连环画《大怖龙的故事》拿给我看。作品从人物构图到色彩运用，无不超逸高绝。一次我偶然向他提起《哲学动态》正想组织异化问题的讨论。高先生说，他曾在六十年代写过一篇关于异化的文章，可以拿给我看看。几天后高先生来编辑部找我，拉我到走廊无人处，小心翼翼掏出一摞稿纸，稿纸的边缘已经发黄破损，似有水渍在上。高先生说这稿子文革时，藏在莫高窟某洞室，才躲过劫难。我恭恭敬敬接过来一看，文章题目叫《异化辨异》。当晚拜读，其中某些说法我虽不尽赞同，但文章有理有据，很有价值。后得任俊明女士首肯，发表在《国内哲学动态》上。国内刊物上讨论异化问题的文章，高先生这篇可谓滥觞。杂志出刊后，我立即送了一份给宾雁。

之后不到一个月，我收到了从武汉寄来的署名墨哲兰的文章《马克思手稿中的异化范畴》，文中对高先生的文章多有辩驳。作者对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手稿如数家珍，行文极有力量，看得出是一位深思精辩的高人。我将手稿给宾雁看，告诉他讨论已经开始。宾雁很兴奋，还特别问我文章的作者墨哲兰是什么人，问我和作者是否常通信。正是宾雁这一问，我才给墨哲兰去信，三来两往，知道墨哲兰就是张志扬，文革期间被囚禁在单人牢房，手中只有一部《一八四四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志扬读它如茨威格小说《象棋的故事》中的主人公读棋谱，真是“烂熟于胸”。也正是有了宾雁这一问，才有我和志扬二十多年不渝的友谊。

当时社科院院部有个刊物叫《未定稿》，负责人是李银河的父亲林伟。宾雁常去他那里看各种资料，总拉上我一起去。银河的父亲温和开通，必把新收到的稿子给我们看，说“能用就拿去发表，活跃思想”。《未定稿》收到的稿子五花八门，从那里可以看出七十年代末，中国许多人在考虑各种各样的问题。可惜不管是《国内哲学动态》还是《未定稿》，都不是公开刊物，那些鲜活敏锐、言之有物的文章只能“内部发行”，而且仅仅是极少的一部分。公开的刊物上，永远是枯燥无味的废话套话。宾雁每次看稿回来，都感慨万千，说“中国不是没有人才，都让这个制度压死了”。

宾雁关心的问题范围极广，从哲学理论到现代文艺思潮，从政治学到美学心理学，从宗教到国际共运史。他常说的一句话是：“这个问题有意思，要抓紧时间研究研究”。我吃惊于宾雁的学养。他读书又多又快，范围也广。他使用俄文差不多像母语，英文也好。一天我见他在读一本讲谈社出版的《新马克思主义》，才知道他还通日文。

宾雁讨论问题的方式很独特。他总要先提出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是他久已信仰的理想，也可能是一个他所不熟悉的主题，而这个主题干扰动摇了他的信仰。他会围绕这个主题反复诘问。例如对“共产主义理想”这个陈腐命题，宾雁会锲而不舍地追问，“难道这个理想是

全无价值的吗？难道为追求这个理想献身的人都是上当受骗？”但是他又清醒地知道，那么多残暴龌龊、伤天害理的勾当是借这个理想之名而行。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始终困扰着宾雁。从我们相识到他逝世，其间虽有相当的变化，但这个矛盾时而潜隐，时而彰显，总是挥之不去。宾雁对马克思的那些理想主义的论述有相当共鸣。但是和他讨论马克思主义，你会发现在他心目中，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大多包含在他的《一八四四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了，也就是说宾雁所热衷的是马克思思想中最具哲学性和人道主义的那些内容，而这些内容恰恰不容于当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在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地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 在宾雁看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理想。也正是为了探求这个理想，他一头扎进南斯拉夫哲学界的文献中，寻找这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中存在的理由。七八年下半年，宾雁花了很大精力编他的《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他在为这部文集所作的序言中，道出了他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人和人道主义。在这篇没有署名的《编者的话》中，宾雁写道：“人和人道主义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以及社会主义实践中应占据什么位置？是像苏联历史上那样，把物和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摆在第一位而较少考虑人的利益，人的权利和人的发展，把这一切放到遥远的未来呢，还是应该自始就关心人的问题？”南斯拉夫战后哲学发展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在苏联历来的哲学思想中被视为抽象物而排除于哲学之外的‘人’，应该占据哲学思想的中心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要关心的，应该是人的解放”。

宾雁写这篇《编者的话》大约是在七八年底，虽然发表时已是七九年三月。当时中国社会才开始出现政治变动的苗头。许多文革受难者刚醒过来低头看自己血淋淋的伤痕，而宾雁已经站在哲学理论的高度，大声疾呼人的问题，真是空谷足音，振聋发聩。还不仅是这些，宾雁进而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会有人的异化问题。在苏联式的国家集权主义体制下，工人无权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人民本应是政治主体，而实际上国家和以工人阶级名义进行统治的党却成了主体，人民倒成了政治客体”。宾雁所指出的这种社会政治上的异化，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悲剧，它经过列宁的改造而走向其理论初衷的反面。由于密谋起义的需要，列宁将政党改造成密谋集团，拥戴一个被称为领袖的绝对独裁者。列宁认为这是一个需要有铁的纪律，并且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殊集团。它无需任何授权，也不需要合法化过程。它不对被统治者负责，不对社会负责，而只服从那个领袖集团，即党的领导层，最终只对唯一的独裁者负责。在这个阴谋集团打造的社会结构中，没有个人自由的空间，政治组织成为残酷的迫害机器。在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完成以后，统治集团愈来愈依靠意识形态动员和秘密警察监控来实行它的统治。这就是存在于苏联和中国的社会现实。对这个现实，宾雁有清醒的认识。

在《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选编过程中，宾雁很费了一番心思。他想表达自己的理论追

求，又要照顾文集能够顺利出版，在选题上就不能不有所取舍。一天下午，我去《哲学译丛》，想约他下班一起回家，见他坐在那里很伤脑筋的样子，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文集的内容不好定，有些文章不想收，但怕人家说不全面。"他指着一条划着红线的篇目，说这篇文章没意思，谈的是列宁的创造性，基本上是老一套。可文集中要是一篇关于列宁的文章都不收，恐怕会通不过。书出版后，见到里面收了这篇文章。有意思的是，宾雁亲自译了文集中的五篇文章，《论哲学的社会作用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教条主义是革命的大敌》，《教条主义和政治制度》，《同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斯大林主义》，《反映与实践》。仔细读这五篇文章，能感到宾雁呼之欲出的追求：渴望使马克思主义挣脱官方意识形态的枷锁，重新回到它的人道主义源头；把马克思主义从共产党意识形态中剥离出来，让它回归人类精神文化之流。

宾雁当时约我译马尔科维奇的文章《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也属于这种努力。这篇文章的主旨正是宾雁关心的问题"马克思理论的本质"。马尔科维奇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存在的理由"首先是他的理论所想象的历史可能性仍然是有争议的，其次是在他批判的人本学所假设的可能性中，人道主义的价值标准和实际选择最符合当代人类的要求。"宾雁同意马尔科维奇的结论。宾雁几次对我说这篇文章很重要，一定要把它译出来。我怕自己译不好，辜负了宾雁的信任，特意请了我的好朋友、英文修养极好的文冠中先生一起译。译稿交给宾雁，他很满意。

宾雁自己译的文章都用哲学所的标准500字稿纸誊清。他给我看过他亲手誊清的稿子，稿面干干净净，硬朗而不失秀丽的小字，铺展在绿格线内，几乎没有修改的痕迹。宾雁在这本文集中用了两个笔名，一个是刘子安，这是他早年曾经用过的名字，另一个是金大白。一次他颇有些得意地让我猜这个笔名的含义，还没容我猜，他就告诉我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今日真相大白"。我反问他今日何事真相大白？中共中央档案馆没开放，多少谎言藏在那里？这些档案一日不公开，就没有真相大白的时候。宾雁争辩道："终有一天会真相大白"。我说那你应该改个笔名，叫"钟大白"。宾雁大笑。

现在回想起来，七八年真是个有意义的年头。黑夜似乎已到尽头，但仍然阴霾惨布，晨曦已然微露，但拂晓依旧苦寒。宾雁一方面专注于捕捉各种解冻的蛛丝马迹，一方面又为前途未卜而忧心忡忡。七八年初春的一天，我们约好在院里洗完澡一起回家，但那天浴室出了故障，没有热水，我提议一起去街上澡堂泡澡。于是我们径直奔东四十条口上的松竹园浴池。浴池中人很少，偌大的热水池只有两三个人。热雾弥漫中，人与人之间仿佛隔着一层面纱。人泡在热水中，全身松弛，像喝了酒，说话的欲望特强。我忍不住向宾雁透露，我当时正为一位新相识的姑娘神魂颠倒。男人之间的这种私密性谈话难免返诸自身。聊到深处，宾雁就动情地谈起了他和朱洪的恋爱史。他和朱洪相识相恋于俄罗斯，那时他是中国青年代表团的俄文翻译，朱洪是《中国少年报》的筹办人。宾雁说一见到朱洪，就觉得她有屠格涅夫笔下女性的那种气质，温柔中含着内在的坚韧。他动情地谈起朱洪和他在一起所遭受的种种磨难。这种磨难常人难以想象，更不要说在这种磨难中坚持着的日常生活。接着他就向

我“坦白”了他的“软弱”。

文革开始后，他被隔离审查，每天都在中国少年报的红楼里打扫卫生。一天他在打扫四楼的平台，那天天空蓝得神奇。几个月来每天的批判凌辱让他疲惫厌倦之极，他走到平台边上，心里突然涌上一股冲动，心想只要跨前一步，就可以不再看周围群魔乱舞，不再听耳边狂徒喧嚣，彻底解脱这无止无休的折磨。这种解脱因此格外诱人。从四楼平台向东望去是宾雁的家，他站在平台上努力远眺，眼前似乎出现了朱洪的身影，她正在晒台上晾衣服，手中拿着小雁的一件小花衣服。为了把衣服晾得平展，双臂正上下甩动，那姿态平静又优雅。这个幻觉那样真切地出现，宾雁一下子泪水涌出，突然有了抗拒软弱和诱惑的力量，从此他再未有过轻生的念头。宾雁给我讲述这一幕时，声音安详平静，但让人能感到平静之下的情感巨涛。这是一种怎样的对比啊，一面如维米尔笔下的人物，在代尔夫安详平和的家园中栖居，一面如多雷为《神曲》所绘的插图，众生在炼狱中煎熬。这两个画面叠加在现实中国的土地上，惨烈而荒谬。我们中国人就在这惨烈与荒谬中生生死死。

七八年初秋，中共中央发了个有关五七年反右的文件。一天父亲下班回家，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指着桌上的一份红头文件说：“这是和老刘有关的文件，你拿去给他看看”。父亲对宾雁是十分敬重的。父亲说五七年反右他是不赞成的，他当时负责的部门一个右派都没有打。在共产党内，父亲是罕见的能宽容异己的人。他自己有所谓党性约束的一面，但对我的反叛思想、“异端邪说”却能持宽容的态度，允许我在他面前批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允许我抨击中共祸国殃民的种种作为。虽然和我激烈争论，但不压制，不禁止。父亲知道我和宾雁的交往后， 嘱我找个时间请老刘到家里吃饭。宾雁来了，和父亲相谈甚洽。送他出门时，宾雁说“共产党里有好人”。这其实是他始终不变的看法。

我拿起这份红头文件蹬车直奔宾雁家，想着能给他一个惊喜，因为文件里有对定错了的右派给予甄别之类的内容。想到宾雁也许会因此脱离苦海，我心里有点激动。初秋时分，天清气爽，出门正值华灯初上。我兴冲冲赶到三里屯，敲开宾雁家的门，说，我带来了有关右派平反的文件。宾雁大喜，但读完却若有所失地说：“照这个文件，我是没希望的。”边说边把文件递给朱洪，吩咐“把有意思的地方记下来”。朱洪拿文件进了另一间屋子，宾雁就把他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经过详详细细讲了一遍，说全国五六十万右派，只要剩下几个不平反，他也会在其中。我忙安慰他，说事情不至于坏到如此，但也有些沮丧。告辞回家，来时的兴致一扫而光。而后宾雁终获平反，这实在有赖“共产党里的好人”胡耀邦。知道宾雁平反后，我去他家祝贺，朱洪一开门就告诉我，今天许多人祝贺，宾雁喝多了。见宾雁坐在扶手椅上，看我来强撑着要站起来，神志还大致清醒，说今天高兴，你敬一杯，他敬一杯，喝得有点多。我见他不胜酒力的样子，连忙告辞回家。骑车在路上，想着宾雁这个人受的半辈子苦，而今天终有一乐，不知为何竟悲从中来，不由长叹一声。宾雁后来的遭际仿佛证明了我那晚上心中的悲伤是一种出自本能的预感。右派平反在宾雁竟是新一轮苦难的开始。

临近七八年底，各种社会思潮涌动起来，西单民主墙渐成气候，宾雁对此极为关注。自十一月中旬开始，隔三差五，宾雁一定拉我去民主墙看看。他在人群中挤来挤去，手不停地

抄录，魁伟的身材在人群拥挤中格外显眼。见他那种全身心的投入，你不能不心生感动。宾雁又“旧习不改”地乐观起来。十一月下旬的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听到一个外国记者传来消息，他见到了邓小平，邓说“民主墙好”。电话中就能觉出他抑制不住的兴奋。他约我第二天一起去民主墙，说很可能这两天就有重要消息。当时邓正在借社会上的民主力量对付华国锋、汪东兴，而邓本人似乎成了民主转型的希望。宾雁对魏京生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评价很高，但对魏直接针对邓的言论有些担心。第二天中午，我如约找到宾雁，一起去了民主墙。那天有贵州来的诗人在朗诵诗歌，词句铿锵。民主墙前人头攒动，一霎眼的功夫宾雁就不见了踪影。待我找到他，他已经在本上记了不少东西，问他找到些什么宝贝，说都是伸冤、上访的材料。这就是宾雁的性格，不能看到别人的苦难却无动于衷。

我们离开民主墙时已近黄昏。入冬的北京，天黑得早，五点左右，已是夕阳西下。沿长安街东行，骑到天安门广场时，宾雁突然兴奋地高声说：“越胜，我看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我颇吃惊，因为宾雁难得有高声说话的时候，碰到再高兴的事，他也极少会提高声调，永远是那种深厚的、带有胸腔共鸣的声音。而今天，他竟兴奋不能自已。夕阳下看他的脸，染上一层红晕，愈发神采飞扬。天啊，中国竟有这等把民族的命运如此牵挂在心的人，见到民族精神稍有苏醒，他便像个孩子得着了渴望已久的东西，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满足。不，远不止于此，他不仅仅是满足， 更有一种期盼，一种向往，一种祈求，一种冲动，拿自己的热血去浇灌初萌的嫩芽。我心悸动，宾雁啊，难道你忘记那架嗜血的机器仍踞伏在旁？难道三十年的苦难竟没有在你心上留下丝毫阴影？难道冷漠易变又健忘的大众真会听懂你的心声？难道上苍竟会眷顾这苦难的中华民族，用它的慈悲之手为歌吟者加上桂冠？望着眼前这位身披晚霞，已不算年轻，却比孩童更纯真的人，我心生敬畏。

七八年在等待、期盼和思索中过去了。宾雁选编的《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也大致完成。七九年一月，他的右派问题解决之后，开始帮《中国青年报》做些事情，这是他准备重归本行的前奏。七九年二月下旬，宾雁在所里找我，把我叫到《哲学译丛》编辑部办公室，给我看他写的一份内参，事关一个叫曹天予的人。这份内参显然是宾雁动了感情写的，详细讲述了曹天予遭受的种种苦难，强调了他的才华和取得的成就，最后呼吁青年报来关注这个人的命运。我问这人是谁，他又给了我一份报纸，上面有个长篇报道，题目似乎叫《带着镣铐攀登的人》，是写一个女青年克服种种困难，自学成才的事迹。主人公叫曹南薇。宾雁说曹天予就是曹南薇的哥哥，妹妹的许多成就和这个哥哥是分不开的。那是个阴冷的日子，窗外一片灰暗，宾雁一边语气激动地给我讲天予的事情，一边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似乎这个青年若不是他的至亲，至少也和他有极深的关系。其实他们素不相识。我与宾雁有了这一年多的交往，渐渐明白他这人是时刻准备着要把别人的痛苦扛在自己肩上。眼见别人有难，若不能一援其手，他会寝食难安。天生斯人，福耶？祸耶？ 话入正题，他问我有什么办法能帮帮天予。那时天予还带着反动学生的帽子在上海街道受人监管，而他可能的出路是来北京考研究生。但这条路上障碍重重，宾雁也束手无策。大概宾雁知道我有些社会关系可以一用。我当时的女友在科学界很有些能说上话的熟人，宾雁认为她也是个愿意帮人的热心人，或许

能为天予想想办法。果然，宾雁的这些设想在改变天予命运的过程中都起了作用。但那是另一个漫长的故事了。

七九年春，我准备报考现代西方哲学专业的研究生。宾雁也经常不在所里，他的记者老本行开始召唤他。我们在一起谈天说地的时间不多了。研究生考试结束后，我回编辑部，看到办公桌上放着一只牛皮纸袋，上面是宾雁的笔迹。打开是两本书，一本是淡蓝色封面的《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凝聚了宾雁的理论思考。一本是《重放的鲜花》，收录了宾雁等人为之获罪的几篇报告文学，书的封面上部是一片漆黑的底子，下部有一块留白。在这黑白之间，一支殷红的玫瑰奋然出土，枝干扭曲，惨然地微笑着，又像一块血痕，记载着民族的苦难与耻辱。宾雁在扉页上有长篇题赠，我只记得一句话："越胜，送给你，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个黑暗的年代。"

## 二、再入炼狱

> 最勇敢者往往是最不幸者，
> 成仁比成功更值得羡慕。
> —蒙田

七九年九月号《人民文学》刊登了宾雁的长篇报告文学《人妖之间》。这篇报导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新闻史上的崇高地位早有定论。从此，宾雁再一次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重树汉语言说地位的斗争。中共建党之后，造就了一种新的汉语使用方式，在中共意识形态框架内，汉语已不是一种言说，而是一种暴力。它的攻击性不仅存在于外部的政治斗争，而且直指人的内部世界，侵入人的心智、情感、灵魂。它象恶性繁殖的癌细胞，侵蚀着诗经、楚辞、先秦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所奠定的汉语言说的传承。它利用"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建构出一套用于操纵、控制人的活动，麻痹、遮蔽人的心灵的语汇。随着中共凭借语言暴力完成了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掌控，中华民族却因失语而无家可归。

怎样才能获得重新言说的权利？在宾雁看来就是让语言重新面对苦难，重新面对中国人的真实生存。宾雁谈到他对天予的采访时说："我重新获得政治权利后采访的第一个人竟是这样一个受难比我更深更久的人，带有一点象征意义：今后我注定将是这一类人的代言人。"这是一种出自本能的使命感。因为在语言暴力之下，作一个揭示苦难的言说者，意味着将踏上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七九年暑期后，我去社科院研究生院读书，宾雁开始奔波在白山黑水之间。我在日记中曾记过这样一笔："宾雁来电话，说明日赴沈阳，眼前似见他颠沛于途，身后落叶缤纷。"这次通话，我们谈了很久。离开哲学所，他有些遗憾，反复说他对理论问题很有兴趣，有许多问题想研究，还有那么多的书要读，叮嘱我要定期把《哲学动态》寄给他，因为他想了解理论界的动态。最后互道珍重，我半开玩笑地说：别人当记者不

过是个职业，你当记者却要上刀山入火海。宾雁沉默片刻，说“我这是自找”。

八一年底，现代西方外国哲学学会在西安召开年会，我作为会务人员赴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社科院哲学所和北大外哲所的两拨青年学人相逢了。苏国勋是高我一级的学长，我叫他苏大哥。友渔是我同门师哥，做事象他的专业“分析哲学”，一板一眼。北凌是哲学所科研处的领导，虽不是学问中人，但心性相投，也和我们混在一起。嘉映和正琳是北大外哲所的人，两人风格迥异。嘉映的辩论风格是雌伏的，从厚厚的眼镜后面紧盯着你，突然发问，穷追不舍；而正琳则是雄扬的，分析问题天马行空，角度独到，令人拍案。我是见才心喜，更何况八十年代初，正是“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时代，碰到心灵相通，学养相俦的友朋，真是喜不自禁。白天大会听我们上辈学人说些不着边际的废话，会后在宿舍里竟夜长谈。文章砥砺，机锋相搏，思辩互见，妙语迭出，每有精思迸溅，恨不能呼人唤酒，浮一大白。后来据嘉映回忆，和正琳两人十天睡觉时间总共不到二十小时。会议结束后，我们一同乘车返回北京，又是一路的长谈。除了哲学之外，话题更广涉历史、文学、政治各个人文学科。入夜，旅客们熟睡，唯有我们这个卧铺车厢中轻声细语不断。车厢外、旷野中孤灯摇曳，昏暗的车厢内苏大哥、嘉映、正琳手中几点黄亮的烟头，那明暗极象荷兰画派常用的色调，映在我心中，二十多年不褪。

分手后，接到嘉映的信，说这几个人不是轻易就有的，散了可惜，应当有个聚会的机会。于是商定，每月初在嘉映的黑山沪住处开一次讨论会。选定主题，推人做中心发言，围绕主题展开讨论。这就开始了持续几年的黑山沪聚会。最早，参加者有嘉映、嘉曜、正琳、胡平、友渔，苏大哥和我，阿坚也常到会，后来甘阳、庆节、国平也来参加。由于每次讨论的主题结合主讲者自己的研究专题，而且讨论相当深入，嘉映觉得这样说过就丢了太可惜，我就提议每次主讲人都把主题发言整理成文，由我在《国内哲学动态》上发表。于是就有了嘉映的论海德格尔，正琳的谈新黑格尔主义，友渔谈分析哲学，和我对马尔库塞的讨论……。

宾雁是个爱朋友的人，也很愿意结交新人。在他繁忙的记者工作之余，偶有闲暇和我“通个消息”，我自然满怀欢喜地向他介绍了新结识的朋友。宾雁很有兴趣地听我的介绍，说什么时候能安排个时间大家见一见。但由于他超乎想象的忙，这一面要等到几年之后了。我对他说没时间见面也没关系，在我寄给他的《国内哲学动态》上能看到我们讨论的成果。当时我也不过是告诉宾雁这个信息，想他忙，和各地的贪官污吏正斗得紧，不会有时间关注这些太抽象枯燥的东西。谁知，他竟打电话给我，说读了嘉映的谈海德格尔的文章，对里面谈的内容挺有兴趣。电话中我们还对“此在”、“语言是存在的家”等等提法讨论了一番。我说嘉映文章写得很精到，他说会再仔细看看。以他那时的工作节奏，真不知他哪儿来的时间，关注这些抽象的问题。

更有意思的是，他不仅关注这些抽象的问题，还关心当年采访对象的具体问题。因宾雁的努力，天予到了北京，后来和林春相识相爱。这本是个人私事，偏偏关心林春这个“好孩子”的叔叔阿姨太多，反对他们恋爱的人不在少数。结果有些好心人找到宾雁，想让他出面

干涉。大概他那里听到的消息都对天予不利，好像天予和林春谈恋爱有点大逆不道。因为天予到北京后曾经住在我家，宾雁就打电话找我，口气很急，听我讲完事情的原委，他松了口气，说“如果人家是自由恋爱，外人还是不要管。都是大人了，而且天予受过那么多苦。”当时我觉得有点奇怪，天予林春谈恋爱这件事，和天予受过多少苦本没有什么关系。可在宾雁那里，凡是受过苦难的人似乎都有了特权。只有一个例外，就是他自己。

八十年代，是宾雁记者生涯中最富有戏剧性的年代。他踏遍中华大地，见证与言说着无权者的苦难。他自己的命运也是跌宕起伏，无时不在风口浪尖上。他几乎以一人之力，面对强权，担起为那些无权者言说苦难的使命。像卡斯特里奥面对加尔文，索尔仁尼琴面对苏联共产党。前者被卡斯特里奥自嘲为“苍蝇撼大象”，后者被索尔仁尼琴称作“牛犊顶橡树”。宾雁也自承了“笨人刘老大”的名号。确实，宾雁是朴拙的。他厚重、深广，像他家乡的土地。土地从不会取巧迎合，屈膝谄媚，有时它会被浊流淹没，但当浊流退去，依然剩它，倔强地承载包涵，生发养育。我们深知党文化总带着蛮横、伪善、虚饰的特征，它和宾雁这种土地般的性格水火不容。党文化要在那些化脓的创口上蒙上绘了玫瑰的纱布，而宾雁却要撕下这纱布，挤出脓血，剜去腐肉。结果他总躲不开那些政治文化暴行。正如茨威格谈到卡斯特里奥对抗加尔文时所说：“我们多次看到这样一个人，他除了道德上的正直之外，什么权力也没有，却同一个严密的组织孤军作战，那是几乎没有成功希望的。一种教条一旦控制了国家机关，国家就会成为镇压的工具，并迅速建立恐怖统治。任何言论，只要是向无限权力挑战，都必须予以镇压，还要扼住那持异议的言者和作者的脖子。”（《异端的权力》）

好久没有宾雁的消息了。八二年的春节到了，我心里惦记，想去看看他。于是电话都没打，就直奔他家。宾雁住三楼，我刚上楼，就见楼梯上站着几个人，个个风尘仆仆。心里奇怪，大过年的，他们站在这儿干什么？敲敲门，是朱洪开门，她身后门厅里还站着两个人。我以为是家里的客人，她说都是找宾雁有事的，并告诉我宾雁生病了，发着烧。我侧身绕过门厅中的两个人，进了他那间客厅兼书房的大屋。见宾雁斜倚在沙发上，身上披了件大衣，手里拿着笔记本，正在纪录，对面小沙发上有一位妇女给他讲着什么。我才明白他的家已经成了上访接待站。大概是因为生病，宾雁脸色苍白，很疲倦的样子。朝我轻轻点点头，继续全神贯注听那位妇女含着泪诉冤情。我站在那里倒显得碍事，便拜个年就告辞了。朱洪送我到门口，我们相视一笑，她也是一脸无奈。去宾雁家连口水都没喝就走人，这是唯一的一次。后来知道，这样的日子在宾雁家是司空见惯。

宾雁喜欢好电影，他收藏了许多国外名片，我有时会在他那里借电影录像带看。宾雁从三里屯搬到金台路人民日报宿舍后，房子略大了一些，客厅里能放下一组柜子，其中一个柜子里放满了录像带。他向我推荐过几部好电影，其中有《猎鹿人》和《夜间看门人》。有一天我去取录像带，那时他刚从西德访问回来不久。访德期间，他给自己出了个题目，看德国人如何反思和清算纳粹罪行。他当时希望这篇文章能使读者联想到中国，联想到中共建政以来给中国带来的种种灾难，然后问一声，你们反省了吗？他给文章起的题目是《他们不肯忘

记》，下面的潜台词就是：我们忘记了吗？宾雁很兴奋地给我讲他在德国访问期间的感受，特别提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总理勃兰特在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墓前下跪的一幕。他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实行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给德国带来很大变化。它推动了德国社会向自由民主方向发展，并且注重社会公平正义，保护工人利益。他说，看了德国的社会主义，就知道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根本就是假的。他断定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在西欧社会党执政的国家中已经实现了。

我们还谈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纲领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路线的联系。其实宾雁从来都对“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格外敏感。他当年在哲学所编《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就收入了好几篇很有份量的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其中弗兰尼茨基的文章《社会主义和危机》同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家们的论述多有相通之处。我知道在宾雁心目中，有一种理想社会模式。正象他自己写到的：“我为什么没有选择国民党而投靠了共产党呢？……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于青年人所具有的魅力。中国的苦难实在是太深重了，中国人对于改变自己的奴隶地位的愿望实在是太强烈了，因而越是主张激烈、彻底变革的思想越是富于吸引力。”但眼见共产集团国家的社会主义进程，同马克思给出的社会主义理想背道而驰，他开始困惑，希望找出症结何在。

为此我们回顾了百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史。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修正当然是绕不过去的。他指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革命的设想是错误的，认为社会进步应当通过民主改良的方式来实现。其实，他的某些观点恩格斯在晚年也同意了。这就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津津乐道的恩格斯的名言：“资产阶级的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伯恩施坦的继承人，但是比他走得更远，因为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已不同于那个时代。伯恩施坦在哲学上信奉马堡学派的新康德主义，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勃兰特时代的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则吸收了卡尔•波普批判理性主义的思想。受波普“开放社会”的影响，他们提出“开放的民主社会主义”，并从马克思的遗产中继承了有关个人和人类自由的人道主义遗产，把它当做自己的理论基础。勃兰特宣布：“自由精神是我们党的原始基础”。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九五九年哥德斯堡纲领中也指明：“社会党人主张这样一个社会：每一个人都能自由地成长发展，都能以主人翁态度投身于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民主社会主义者认同民主政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强调公平原则，关注个人道德，开放地择取人类精神文化成果，与不同观点的思想流派对话，批判苏式社会主义，显示出它的生命力。

与此相反，列宁在同第二国际的斗争中，分离出另一条在不发达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即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个名称表明，它把组成社会生活的要素之一——活生生的个人，简化为可以用自然科学方法处理的客体。他们相信，在社会生活中同在自然科学中一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掌握在最高领袖手中。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可以简化为具有互换性的标准件。因此他们可以数字化地处理人命，按比例地迫害大众。选择了这条道路的政党必然信奉暴力革命、一党专制、领袖独裁、思想禁锢、舆论控

制、党内清洗、警察滥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视万民如刍狗。它实质上是反社会主义的，霍尔瓦特将之称为“国家主义”。如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可以通过组织工会、发动罢工来捍卫自己的权利，那么在这种国家主义之下，工人则只能听任统治者宰割。这种制度在斯大林手中登峰造极，传至中国，贻害至今。

宾雁在他的自传中说：“这是没有民主与自由的社会主义，大权独揽，不受监督的党的领导，没有人民参与，对人民不承担责任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毛泽东式的‘马列主义’”。宾雁将其称为“四个不改”。他特别赞赏罗莎•卢森堡对列宁的批评：“列宁所主张的极端集中制，本质上不可能产生积极的创造性精神，而只能孕育打更人式的毫无独创性的思想。”他把这句话抄在一张卡片上。在自传中，宾雁还写道：“他们是企图消灭人们头脑中的理性，同时又把个人的自我意识、表达和发展自我以及改变世界的欲望窒息在萌芽状态中。要创造一种全无独立的思维，又无发展自我欲望的，最易统治与驾驭的动物。”我想他的心与罗莎•卢森堡是相通的。

宾雁赞同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但他对苏联、中国的现存社会主义持严厉批评的态度。他认为，人们忽略了这种社会主义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社会主义的血缘关系。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社会主义、苏联的“发达社会主义”和中国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们的政治结构、统治方式，是一致的，可以统称为极权社会主义。汉娜•阿伦特正是把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当作分析极权社会的样板。苏联的克格勃、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墨索里尼的褐衫党，都是用来制造社会恐怖的工具。当恐惧笼罩着社会，并渗入每个人的内心时，专制暴政便高歌猛进。宾雁感慨，德国人在总结历史教训时，往往会反省到全民族的软弱，每个人都有悔罪感。他提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纳粹时期是受到残酷迫害的，但勃兰特却不以此开脱自己的党。他在纳粹受害者墓前毅然下跪，代表的是整个德意志民族的忏悔和认罪。宾雁问我，在中共手下屈死的人命何止千万，有谁曾向老百姓下跪悔罪？我说，他们不会下跪，只会让冤魂下跪来感谢虐杀之恩。宾雁长叹一声，默然无语。

一九八六年，政治气氛略有宽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赵紫阳的干预无疾而终。甘阳从北大毕业分配到社科院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我们从朋友又变成了同事。那时甘阳已经着手筹划《中国：文化与世界》丛书。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他当时的设想是要把西方世界有重要意义的现代学术文化成果大规模迻译到中国来。在我们看来，中国对现代西方学术文化的了解尚肤浅，许多问题的讨论都是无根的游说。我很赞成这种学术建设的基础工作，特别是想到能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做些扫荡意识形态，重建真正的学术文化精神的工作，心里很高兴。甘阳联系了一批北大、社科院的青年学者，组成了《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辑委员会。后来他希望编委会的成员涵盖面更宽一些，我就帮他联络了我的几个老朋友，邀刚从美国回来的银河和正在美国的天予、林春加盟编委会。银河和天予同意了，林春却因为某些考虑而婉拒，让我有些遗憾。

当时三联书店负责人沈昌文先生和董秀玉女士对编委会的工作帮助很大。沈先生开玩笑

说自己是文化商人，但是他确实慧眼独到，看到了由青年学者自组编委会编辑大型丛书的生命力。我记得编委会的代表甘阳、国勋、依依、王炜和我，曾在在三联书店与沈先生董秀玉女士见面，谈合作的事。沈公明确表示，丛书的大政方针完全由编委会自己决定，三联书店只提供出版发行服务。在中国当时的出版体制下，沈先生的这种做法开了先河。八六年气氛宽松，宾雁很高兴，我们见面打电话的机会略多了一些，他一如既往地乐观。我向他谈起甘阳的设想和编委会的工作。他觉得一代新人已经开始成气候了，特别是有了组织形式。我曾把甘阳计划出的书单寄给他，他希望我给他几本已经出了的书。我和甘阳商量，甘阳说“统统给，凡是出了的书都给老刘一份”。我记得大约寄了十几种书给他。

八六年十一月下旬，父亲二次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安然去世。我给宾雁打电话想告诉他这个消息，正巧他不在北京。但当晚他就从外地来了电话，除了劝我节哀之外，特地嘱我代他和朱洪给父亲送一个花圈，以表达他的哀悼。追悼会那天，宾雁送的花圈摆在中间，“刘宾雁、朱洪敬挽”的署名清晰醒目。

送走父亲以后，北京的政治空气紧张起来。八七年元旦，北大等高校学生到天安门广场试图集会，被警察逮捕了若干人。当夜，北大学生冒雪从中关村走到天安门广场，在那里静坐到天亮，迫使当局释放了被捕的学生。一位北大的朋友当天到了我家。他一直在学生队伍中，情绪激动地给我讲了经过。一月八日，在中共高层工作的一位朋友打电话来，说中央书记处已经决定开除宾雁的党籍。我听后悲愤难抑。对我来说，宾雁在不在共产党里并不重要，而是这种公然的政治迫害令人愤怒。我急给宾雁打电话，家里没人。夜里辗转难眠，披衣起来，给宾雁写了一封信，随信还寄给他一部国平写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祈盼着查拉如斯特拉的精神能帮他在这大逼迫来临之际挺住，不要受太大的伤害。多年来我从没问过宾雁是否收到我的信和国平的书，他也从未向我提起。但在读他的自传时，发现他把这封信全文收录在书中，并写道：“我流泪了，谢谢你，我的朋友，你已经为我分担了痛苦。当许多人和我在一起时，幸福便会把我的痛苦淹没。”我突然明白，男人之间只交换思想和匕首，不交换同情和关爱。

一月下旬，电视和电台都播发了开除宾雁党籍的消息。我知道他回北京了，决定去看他。严冬时分，街上行人稀落，上午十时左右，我赶到金台路人民日报宿舍。院门前异常安静，惟在墙外停着两辆212 吉普车。我敲开门，只有宾雁一人在家。他很平静，说昨天来了很多人。又问我，楼下有人吗？我点点头。他走到里间，从临街的窗口往外看了看，随手把录音机的音量开大。坐下就开始闲聊，他向我历数昨天来家里的人都是谁。我开始劝他，反正记者这个行当是干不成了，不如干脆回哲学所。他倒挺感兴趣，问了问哲学所的情况，但说以现在这个身份，哲学所大概不敢再要他回去。又说反正今后有时间了，正好把这些年积攒下来的书读一读，写写那些考虑了很久的问题。我许诺说今后会送许多书给他。坐了大约不到一小时，竟然一句都没提开除党籍这回事。有几次，谈话突然中断，两人相视无语。我能感到他平静外表下掩藏着的心底波澜。他几次催我走，我终于起身道别。出门正要下楼，宾雁突然从后面扳住我的肩膀，说“这一别不知何时能见”，我回头，见他泪水涌出，顺着

面颊的皱纹淌下。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他落泪。

那时他已知道外省与他交过手的那些歹人极欲乘他遭难之际落井下石，要以诽谤罪送他上法庭，他心里在作入狱的准备。不记得如何分的手，只记得一路上想着怎样在法律界找几个能帮上宾雁的人。第二天刘东在前门外珠市口丰泽园请客，大约有十几个人聚会。我到饭店后情绪极坏，国平问出了什么事，我说昨天去看了宾雁，稍讲了些情况，搅得大家败了兴。饭没吃完我就走了，事后才知国平心里郁闷，喝得大醉。阿坚送他回家，途中他醉倒街上，指着路人大叫“你们都醉了！”

春天到了，编委会的工作进展顺利，出书已渐成规模。甘阳提议请宾雁来聚一聚。我去接宾雁、朱洪，在我家附近的德胜饭店吃了一顿饭。编委会的同仁来了十几个人，苏大哥，小枫，一休哥王焱，王炜等都到了。饭吃得非常高兴，甘阳和宾雁谈了很多，把他对编委会未来的设想讲给宾雁。饭后，大家兴致正高，就一起回到我家里喝茶。抛开政治阴影，朋友相聚总是乐趣横生。笑语声中，约林唱起歌来，随后大家请宾雁唱。他站起来用俄文唱起“在那遥远的地方，那里云雾在飘荡，晚风轻轻吹来，掀起一片麦浪”。声音厚厚的，略带点沙哑。众人安静地听着，渐渐有人应和。歌声飘出我的家，散落在黄昏的晚风中。

## 三、他乡的日子

> 多么寂静，周围多么空旷
> 多么微薄，暗淡的霞光
> 象大家一样，你也会消失，我的朋友
> 为何心中又泛起波浪？
> —《夜》 别雷

八九年底，我到了巴黎。经历了八九学运和六四屠杀之后，离开中国，即使不是目的明确的逃离，心中也会有避秦的想法。九零年二月份，我和宾雁联系上了。自他八八年出国，我们一年多未通消息。在这样大的动荡之后再通上话，双方都有无限感慨。我知道六四屠杀之后，宾雁曾来过巴黎，他义无反顾地谴责中共暴行，成为公开的反对派，他在国外的访问便成了无限期的流亡。不久，我接到了他从美国的来信，信中说“在出来的人中，你是我最挂念的一个”，还为我在国外的生存提了些建议。后来，在我申请研究基金时，宾雁的推荐信起到了关键作用。四月份的某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位素不相识的女性，声音亲切悦耳，她告诉我，是宾雁让她来找我的，问我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她就是巴黎七大东亚语言系的谭雪梅女士，后来我一直叫她谭老师，我们因为宾雁的介绍成了十几年的朋友。九零年八月间，我又接到宾雁的电话，说他要去德国参加一个活动，会到巴黎来看我。于是，我们在巴黎相逢了。

宾雁住在圣日耳曼草地附近的麦迪逊旅馆，旁边的小街是狄德罗曾经住过的房子。旅馆门前小广场上是狄德罗手持书笔的青铜雕像，在法国梧桐掩映下，俯视着来来往往的路人。早晨，我去旅馆找宾雁，他正坐在餐厅吃早餐。见我来，匆匆把一大杯牛奶喝完，就开始问我近来的情况。人到了国外首先关注的是如何生存，所以他问的大多是生活上的问题。谈到国内的事情，他问了军涛被捕的细节，我对此所知不多，无法给他更多的消息。但他还是问军涛有无生命危险。我说因为国外的关注，大约不会有立刻的危险。宾雁却担心人在牢里，万一有人下黑手就麻烦了，说共产党的监狱可不是好呆的地方。

聊着聊着，宾雁突然谈起回国的问题，说共产党今后的日子不好过了，因为杀人和社会结了血仇，很难永远靠暴力压制，几年之内会有大变，他就可以回去了。让我吃惊的是，他那么相信人民的觉醒，相信六四屠杀之后中国社会变革必然发生。我本来对此不太乐观，但他的情绪还是感染了我。他一再鼓励我，说人既然已经出来了，就好好看看西方民主社会，有时间多读读书。我提到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里面记录了许多俄国白银时代的诗人流亡巴黎的往事。宾雁对爱伦堡的书很熟悉，他当时还提起几个人的名字，记得有别雷、巴尔蒙特……。下午宾雁又来电话，约好去高行健家吃饭，高先生当时住在巴士底广场附近。晚饭后，他展示了他画的几幅水墨画，有一幅画给我印象很深，画面上部是浓重的墨块，下部似乎是变形的人体，扭曲挣扎着，像“六四”之后中国文人的心情，很压抑。

宾雁在巴黎呆了三天，我们每天都见面。一次我们坐在狄德罗雕像下的长椅上，谈起流亡的中国知识分子有无可能留下些思想文化成果。对此宾雁相当悲观。他认为我们所知道的流亡者大都是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他们离开自己国家，但没有离开自己的基督教文化。那些俄罗斯流亡者，从来就浸淫在欧洲文化之中。象赫尔岑，就是用法文和德文受的教育。十月革命后流亡的人中，既有白银时代的文学家，又有别尔嘉耶夫那样的哲学家。他们离开俄罗斯，但文化血缘没断，只不过换个角度看问题，思想上艺术上还可能有新发展。而中国知识分子则完全不同，首先语言不通，其次出国流亡之前基本上受共产党教育，从思维方式到为人处事，都有很深的烙印。我问他假如别尔嘉耶夫不是在十月革命后流亡法国，他随后的思想发展会认同苏联的意识形态吗？宾雁想了一想说，别尔嘉耶夫对自由看得很重，即使他不离开苏联，也会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这是早晚的事。

他还说到自己的反抗意识和自由思想的由来。那时候，哈尔滨文化气氛中俄国味比中国味浓，宾雁自幼就读俄国文学，后来倾向社会主义，其实是受俄国文学影响。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俄国知识分子，很少有不信仰社会主义的。别尔嘉耶夫就是个社会主义者。听宾雁讲到这里，我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要懂宾雁这个人，恐怕要回溯到拉吉舍夫、赫尔岑、别林斯基直到别尔嘉耶夫这批思想家。这个想法在后来几年中愈来愈清晰。

我问他自己会写什么新东西，他说，现在离开中国了，下笔也难。要换个角度写东西，还要再想想，等一等。他鼓励我，说你本来就是书斋中人，在哪儿不是读书思考？当然要先解决吃饭问题。我告诉他研究基金因他的推荐已经申请到了，生活暂时没有问题。

宾雁临走的那天，巴黎的天空特别蓝，夏天慵懒的气息弥散在路旁一个个咖啡吧里。我

去旅馆接宾雁，送他去巴黎东站上火车。这次他去德国开会，会议组织者给他买的是德国和美国之间的往返机票，他是特意自己买了火车票来巴黎看我的，还要回德国去赶飞机。这份情谊让我深深感动。正像施韦泽说的“在精神上，我们大家似乎是依赖于在生命的重要时刻人们所给与的东西而活着。这个富有意义的时刻是不期而遇的，它不显得了不起，而是非常朴实的。”上火车前，宾雁突然拿出一个信封给我，里面有一些美元。他淡淡地说，“这些美元我到了德国就没用了，留给你吧。”似乎我拿了这钱倒是帮了他的忙。我知道这不过是他照顾我自尊的一种笨拙的托辞，不愿意让我觉得受人恩惠而内疚。他在德国只住一夜就回美国，哪有美元没有用了这回事。这就是宾雁，一条伟岸的汉子，却心细如丝。我坚决推辞了，但我答应需要时会向他开口。他要我保证真有困难时一定告诉他，才怅怅地把信封收起。后来在遭逢家庭变故急需用钱时，我果然张口了，得到了宾雁和朱洪的帮助。

宾雁上车了，最后从车门向我招招手，就消失了。法国的列车不开车窗，我看不见他坐在哪里，只呆站着，直到列车驶出我的视线。不敢流泪的我也觉得喉头哽咽。

九一年十一月下旬，我去美国开会。想到能同生活在美国的老朋友见面心里挺高兴。飞机先达纽约，嘉映接我回家。给宾雁打了电话，和他提起会议是在芝加哥开，我会住在甘阳那里。宾雁便提到甘阳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从民主运动到民主政治》，问我看了没有。他说同意甘阳的观点，中国人该放弃把什么都搞成运动这种习惯了。电话中约好从芝加哥回来到他那里去“好好谈谈”。在芝加哥见到甘阳，把宾雁的话告诉他，甘阳有点吃惊，说“老刘看东西还这么仔细”。从芝加哥回到纽约，嘉映送我去普林斯顿。当时嘉曜、苏炜、晓康等人都住得不远，离宾雁家几分钟车程。那天约好，嘉映和我到了宾雁家，见他精神很好，活力四射。一会儿晓康也来了，说大家正好凑在一起好好谈谈。宾雁过来坐在沙发上，和我面对面，手里又拿出一个小本子，要做记录。我笑他是职业习惯，和人谈话非纪录不可。他就随手把本子放在茶几上再没动它。但是那天人来人往挺乱，谈话始终没能集中深入。

晚上我住在宾雁家，睡在他的书房里，那里书报资料之多，真可谓“铺天盖地”。我睡的那张长沙发，头顶着书，脚蹬着书。晚饭后，宾雁过来，手里拿着一本淡黄色封面的书，要送给我。他一边在扉页上写着题赠，一边说这部书的前言是他写的。我拿过书来看，是《哈维尔选集》。他说为了写这个前言，把哈维尔的东西读了两遍，像《无权者的权力》，他竟然读了三遍，觉得觅到了知音。宾雁写道：“哈维尔未必了解中国人接受精神奴役的过程，但他从观察捷克斯洛伐克现实引出的结论，对于中国人也是适用的。几十年的特殊统治造成了人的精神危机。那么应该怎么办呢？不是靠外在的什么权威，不是通过说教，而是唤起人们去自省，在反对邪恶的行动中自己解放自己。这就必须使人们看到：你对于自己的国家和你本人堕入今天的田地，也是有一份责任的！”他赞成哈维尔所说“在所有包围着我们的危机中，最根源性的一种就是社会的道德危机。如果不首先解决道德危机，便没有任何危机（从经济的、政治的到生态的）可以得到解决。”宾雁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中，多次提到要想真正结束专制统治，个人内在的道德反省是不能缺少的一课，提出要警惕人心

中的“小毛泽东”。他向争取民主政治的人提出了个人道德要求，认为政治生活不能非道德化。我把它当作宾雁的政治遗言之一。

九九年四月，宾雁说要来欧洲访问一段时间，六月底到七月中有十几天的空闲，并说可以来巴黎，在我这里多住几天，好好聊聊。这几年我们远隔重洋，虽然经常通话，但在电话里很难深入对一些问题交换意见。倘能面对面促膝交谈，该是何等的快乐。七月初宾雁和朱洪到了巴黎。接他们到家，朱洪就有点感冒发烧，赶紧找出药给她服下，让她先去休息。宾雁却兴奋得很，在花园里，房子里走来走去，东瞧西看，仔细问我们的日常生活，话题像他这个人，朴实平常。晚饭后，我怕他路上累了，坚持让他先休息，但他还是执意要看看我的“藏书”。在海外谈何“藏书”，不过是各处搜集和请人从国内带来的千把册常读的经典著作罢了。宾雁巡视一番，说还不错，总还有些书读。又得意地说他现在的书比我九一年去时多了不止两三倍。他虽然搬了家，房子大了，但也常常发愁书没地方放。又讲了许多普林斯顿旧书店的好处，一本新书刚上市卖30 美元，一年之后在旧书店3美元就可淘到，让我听得好羡慕。他看到架子上有一本别尔加耶夫的《俄罗斯思想》，就抽下来随手翻着，说我们在巴黎第一次见面就谈到过这个人。那是八、九年前了，而且也不过是提到而已，他居然还记得。

这次宾雁来巴黎，我和雪有个心愿，让他好好放松一下。除了和一些好朋友见见面，基本上在家休息和外出游览。即使谈话，我也尽量找些轻松的话题，但宾雁时不时仍会提出一些严肃的问题。他对法国社会党政府的社会政策很有兴趣，我们给他介绍了社会党在劳工、企业、税收、福利、医疗保险、教育、社会救济等问题上的政策。宾雁对此很感慨，说法国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还特意问起法国共产党的情况。因为法共《人道报》曾是中共的重点批判对象。我们告诉他法共在政府中也有代表，现在的左派政府实际上是左翼联合政府。宾雁说其实左派也有不同的层次，基本政治倾向一致，具体政策可以有分歧，争论、斗争都可以。法共能加入政府，说明它是认同这一点的。我说，它在法国社会中的影响越来越小，得票率也在下降。宾雁说这表明有替代政治力量出现，对选民的吸引力更大。在民主制度下，各种社会利益集团可以通过选举争取对自己有利的政治安排，暴力革命当然不可能发生。看来恩格斯晚期思想的变化，是因为看到了当时社会的变化。那时候共产党还不是既得利益集团，所以能够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调整自己的理论。看得出来这几年他仍然关注着马克思社会革命思想的流变。

知道宾雁是爱喝一口的人，这次为了他的到来，我准备了很好的法国红葡萄酒，可惜他喝不惯。一天饭间，他终于忍不住问我：“有白的没有，来点怎么样”，又有点抱歉地说“多好的洋酒我也喝不出味道，还是老白干儿有劲儿”。初夏是法国最美的季节，选个好天，我们陪宾雁和朱洪去卢瓦河游览，那里古城堡密布，记载着法兰西历史文化发展的脉络。宾雁兴致勃勃听雪给他介绍卢瓦河城堡的历史和人物掌故。中午我们在香堡的森林中野餐，阳光透过浓叶洒下，四周静寂，偶有飞鸟啁啾，伴着我们的笑谈。宾雁那样轻松、快乐。下午到雪侬堡，沿着宽阔的皇家大道漫步，高大的梧桐树搭就天棚，浓荫匝地。宾雁站

在城堡旁边的意大利花园里，望着精美的城堡凌空飞架于舍尔河上，连说“太美了，太美了，美国人不可能有这样的构思。”园中有棵百年老松，枝叶盘虬。盈盈爬到树上，坐在一支横斜的树干上，宾雁倚在树干旁。朱洪连忙抓拍了几张相，说“一老一小和一棵大树在一起，特有意思”。傍晚时分，赶到安布瓦兹堡，这是伟大的达芬奇埋骨之地。当年弗朗索瓦一世接达芬奇到法国来住，他随身携带了“蒙娜丽莎”。这座城堡旁，是克洛绿舍庄园，达芬奇生命的最后几年就在这里生活、工作。庄园里到处挂有达芬奇手记里一些哲理性很强的名言。宾雁一句句读过去，有些遗憾地说“可惜没带笔记本，能记下来就好了”。我们笑他的 “职业病”又犯了。

两天后，我们又驱车向诺曼底进发，想沿着印象派画家的足迹游览诺曼底。到鲁昂时已近中午。先去老市场，那是圣女贞德上火刑架的地方，一四三一年五月三十日，经过宗教裁判所的两次审判，宣布将圣女贞德处以火刑。那些曾受恩于贞德的教士、法官都沉默不语，听任神学院的博士们判决这个异端分子。法郎士写道：“他们在神的女儿受难前夕抛弃了她。”烧死贞德的地方依旧留存着，有一块标牌指明“中世纪的土地”，另有一块标牌标示出火刑架的所在地。对面是贞德的雕像，洁白的形体略显变形地修长，像莫吉尔扬尼的女人体，双手紧握，放在胸前，略扬起头，像呼喊，又像祈祷。宾雁仔细看了贞德受难之地，随后进了火刑架旁的教堂，一座相当现代化的教堂。教堂深处立着一座圣女贞德的铜像。铜像前枝杈形的烛台上燃烧着支支白烛，远望去，仿佛贞德仍在火刑架上受刑。我向宾雁介绍这座教堂的独特建筑风格，但他似乎没听见我说话，只是望着远处的贞德像。我猜想这个受难者的形象会在他心中引起波澜，便悄悄走开，留他一人在空旷的教堂里沉思。

本以为有充裕的时间在返回巴黎时参观莫奈花园，谁知在饭店吃饭耽误了时间，等我们参观完莫奈经常摹画的卢昂大教堂，时间已晚。我们赶到莫奈故居时，已经止票。我有些恼火，怨自己没掌握好时间。宾雁朱洪却安慰我，说看看外面也不错。走到莫奈画睡莲的池塘墙外，看到有块半米多高的石头，宾雁居然一步跨上去，站在石头上向花园里张望，连声招呼朱洪，说“快上来，什么都看得见。”结果我们在旁边扶着这老两口，站在石头上“参观”了莫奈花园。返家的路上，问宾雁还有一座加亚城堡废墟，要不要去登，宾雁游兴未尽，连声说“去，去”。这城堡是狮心王理查统治诺曼底时所建，现在仅剩嶙峋的残迹雄踞峭壁，俯瞰塞纳河水攸攸西去。宾雁一口气登上城堡废墟，叉着腰站立在巉岩之上，夕阳泼洒在身上，天风流荡在发间，远望像座雕塑，让你不敢相信眼前是位75 岁的老人。

离别的时候到了，七月十三日，宾雁伉俪要回瑞典。早饭后，宾雁提议去散步，参观一下我居住的这个千年小城。我家对面是莫罗将军的故居。这位莱茵军团的统帅，吕内维尔条约的签订者，因不见容于拿破仑而流亡北美。在拿破仑称帝后，他以一个共和主义者的身份参加俄奥联军与自己的祖国作战，死于沙皇亚历山大军中。宾雁听我讲着莫罗的故事，沿着城堡围墙缓步而行。走到依薇河旁，他提议要嘿喽儿着盈盈走。大概只有北京人懂得这话的意思，就是让孩子骑在大人脖子上。盈盈已经四岁了，总有二十多斤重，宾雁竟一直嘿喽儿着她从依薇河边走到118 号公路桥下，足足有200 多米。汗水渗出额头，我再三叫他停下

来，他一直不肯。朱洪抢拍了几张照片，那该是多么珍贵的记忆。下午送宾雁走，竟没有分别的伤感，看他那样充满活力，当然相信很快就能再见。两天以后接到朱洪电话得知，她拿着相机下楼去冲洗胶片，被人一把抢走相机。她说不可惜相机，可惜那些胶片，多少珍贵的影像竟永远消失。但我想，这不正是为了让我们把这些记忆深刻心中吗？

宾雁回美国后，我们依然常通话。他写《迷雾重重的中共八十年》，直指中共是否定个人自由，敌视人道主义，视人命如草芥的农民起义军。里面的种种提法我大致是同意的。国内“新左”蜂起时，我们也交换过意见。我知道他对“新左”们的一些提法保持相当的距离。他在七八、七九年就把南斯拉夫实践派称为“新左派”，在他心目中，站在自由主义立场反抗苏式社会主义的反对派才是“新左派”。对那些在警察国家中批判后极权、后现代的“先知”们，他兴趣不大。不过，他的确花了些时间去读吉登斯的著作，认为他的许多提法新颖有趣，但也有些失望，因为没有找到他想要的东西。我建议他去和林春讨论吉登斯的思想，但后来他生了病，我想他没有精力了。

我们之间最后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是去年二三月间，那已经是人们为他举办八十华诞庆祝会之后了。他的癌症已经扩散。那天他很平静地告诉我，将开始新一轮的化疗。随后，他突然问我对王蒙的文学现代化路子有何看法。我说凡是对消解共产党语言专制有益的文学形式，我一概认为有意义。宾雁沉默片刻说，我觉得文学如果不面对社会现实，就好像开车碰见了出车祸的人，你不下车救，开车从边上过去了。我做不到。然后自嘲地说，我这是老掉牙的提法了。后来他又提起旧话，说许多人批评王蒙油滑，但他们忘了“六四”前慰问戒严部队，各部委头头都去了，王蒙当时是文化部长，但他住进医院，没去。“六四”开枪以后，王蒙辞了职。宾雁说，在那个时候，没有人敢辞职，共产党的部长也没有辞职的传统，王蒙是个有底线的人。后来有消息说王蒙讲过攻击宾雁的话，不知宾雁那天问我是不是和这个传闻有关。若真有关，那就更见宾雁的胸怀。

宾雁的病情一天天加重了，我恨不能天天打电话了解病情，或说些给他宽心的话。但我不敢，只能每天祈盼着癌症的发展能够有所控制。雪几次催我去美国看看宾雁，但我知道这只会给他增加负担。下定决心打一次电话，也就是问问他的病情，甚至都不想让宾雁来接电话。但宾雁差不多每次都要拿过话筒来说几句。因怕他累，我总匆匆挂断电话，但听不见他的声音又怅然若失。去年十二月深夜，谭老师突然来电话，说宾雁已去，我如受雷击，明知这一天会来，但不愿听到这消息。连忙给朱洪打电话，巧在朱洪正好从医院回家拿衣物。她那样克制着自己，说“宾雁情况很不好，真的很不好”。接着留下医院的电话，让我过一小时以后再往医院打。原先只是报了病危，我又自欺地燃起一线希望。然而，数小时后，宾雁真的永远永远地去了。他对人说的最后的话中有一句是：“将来我们回忆起这些，多么有意思！”

## 四、看呵，这人

受苦可以成就更深厚的爱

和更宽广的恩慈。

- 圣•特里莎

看宾雁的脸，一张在古希腊贝尔加摩神殿残壁上能寻到踪迹的脸。高耸的额头，开阔的天庭，挺拔的鼻梁。眼睛时常眯着，却掩不住柔和与澄澈的光。和人谈话时总是直视对方，目光绝不游移，坦诚真实，让人信任。修长的眼线一直荡向额角，和额角的鱼尾纹交织在一起。厚实的嘴唇总抿着，唇角微微下沉，透出执拗的性格。听别人述说苦难时，眉峰紧张地蹙起。高兴时开怀大笑，眼睛眯起来，神情松弛。听人讲话入神时，头微微后仰，下颔抬起，一种祈祷的神态。平时，脸上的表情柔和安详。沉思时，深深的皱纹透出刚毅，有种嶙峋之美。卡莱尔在描述乔托所绘但丁的肖像时这样写道："这是反映现实的绘画中最令人悲愤的面容，既是完全悲剧性的，又是激动人心的面容。其中有孩童般的温顺、柔和和文雅之情为基础。但是所有这些感情，仿佛又被凝聚成尖锐的矛盾，变为克制、孤独、骄傲而绝望的痛苦，好象透过用粗大冰柱筑成的监狱，一个温和轻柔的灵魂向外窥望，使人感到他是如此坚定、倔强和坚韧不拔！"读到这段话，眼前会浮现出宾雁的面容。

一次，宾雁给我看一份人民日报内参，内容是陕西一些共产党村干部随意吊打村民的调查。记不清这份调查是不是他写的，只记得他声音低沉，反复说"吊起来打，什么家伙都用上，吊起来往死里打，无缘无故就吊起来打。"抬头看他，脸上表情是那样悲愤，似乎打在自己身上。我于是明白，别人的苦难在宾雁那里都要化成自己的体验，才能真切，才能唤起他尽一己之力去拯救苦难的决心。

在宾雁身上蕴积着深厚的悲悯。在我看来，悲悯和怜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怜悯的属性是外在的，它带有某种居高临下、施舍的味道。一个富人会怜悯穷人，因为他会偶动恻隐之心。但这不是悲悯。悲悯的属性完全是内在的。它是那种置身其中，感同身受，来自内心冲动的奉献。它不来自恻隐，而来自仁慈。因此才能够在大苦难大逼迫中保持它的完整性和一贯性。这就是阿奎那所说的："邪恶不能彻底摧毁仁慈的包容力和正当性"。

在悲悯的深处，我们能够发见，它与施韦泽"敬畏生命"的思想相通。因此它超越了恻隐、同情、怜悯的局限而跨入更广阔的爱的空间。在施韦泽那里："关键在于，人如何对待世界和他接触的所有生命。只有人认为植物、动物和人的生命都是神圣的，只有人帮助处于危急中的生命，他才可能是伦理的。"自古至今，一切伟大的心灵都是相通的。普鲁塔克在批评马可•伽图的矫饰的正义时指出："我们知道，慈善比正义的范围更广。法律与正义，我们只能施之于人类，但慈善和仁爱则是从人们和善的心田涌流而出，就象由丰富的泉源中溢出的泉水一样，其恩泽甚至施加到不会说话的畜牲。"这使我想起宾雁在干校劳改时，为了制止孩子们虐待一只猫而惨遭批斗的情景。在宾雁身上，本能地充满对生命的敬畏，他尊重每一个有生命的个体，关注他们的快乐、忧伤、幸福、苦痛，不让任何虚伪的借口、空洞

的名义扼杀、剥夺个人的权利。我们太熟悉“以革命的名义”犯下的桩桩罪恶。宾雁的心在提醒我们，永远不要以国家、发展、进步的名义变邪恶为神圣。要警醒着，以敬畏生命来对抗一切毁灭性的力量：专制的国家、蛮横的意识形态。

在宾雁那里，一切匿名化都被粉碎了。在他笔下，没有为党为国为主义献身的无名无姓者，而是王广香、李日升、傅贵、郭建英、陈世忠……，一个个具体的人，一桩桩具体的苦难。他的关怀永远着落在弱小无助者身上，对充斥中国大地的党政军国喧嚣、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宏大叙事，他似乎充耳不闻。甚至绞索已经收紧，他也不作英雄受难状，只是坦然、坚韧地承受。甚而会去想“那些比我受难更深的人”。因此，对中国“知识精英”们万花筒般变幻的各类说辞，他敬谢不敏；对警察国家中文人聊以自慰的思想手淫，他冷眼旁观。却总在内心质问着，什么是更重要的，思潮还是思想，国家还是个人。面对强势的加尔文，卡斯特里奥宣告：“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教条，而是杀死一个人”！林昭质问残暴的警察“那不是血吗”？宾雁控诉中共“随意枪决许多优秀的中国青年人，疯狂一词已不能解释他们的所作所为”。这些直面屠杀的告白简单有力，不是“知识精英”的巧言所能遮蔽。在宾雁的法庭上，夹边沟的白骨，长安街的血肉就是铁证。没有借口，不可辩驳。哪一滴血不是鲜红的？！

正是个人的具体的苦难让宾雁转向马克思主义又质疑马克思主义，追寻社会主义又反抗以社会主义之名所犯下的罪行。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最初冲动发源于消除社会不公，人民的苦难，而现在社会仍然不公，人民依然受苦，怎么能将社会主义所经历所制造的一切往历史的档案中一塞了事”。也正为此，他才关注民主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发展，认同它对人的自由的追求。

有人说宾雁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其实这个标签远远不能反映他的精神活动的复杂性，他的思考要深入得多，视野要广阔得多，精神来源要丰富得多。他汲取马克思理论中的人道主义遗产，但摒弃暴力革命、阶级专政的专断推论。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要关心的，应该是人的解放……，即使当思想分歧已经转化为政治斗争，也不要忘记把一个人当作人来看待”。任何主义的标签都不能准确反映和彻底涵盖宾雁的思想追求，他如罗丹的“思想者”，魁伟的身躯山岩般稳坐，粗壮的手臂支撑着硕大的头颅，脸上的沉静有着某种苦恼的期待，期待着新的思想风暴的到来。

人们常说宾雁是“青天”。这或许是苦难者习惯的幻象。其实，没有哪个称谓比它离宾雁更远了。“青天”常用的后缀是“大老爷”。“青天大老爷”是站在苦难者头上和对立面的。他们是有权势者，是统治集团的一员。无论是包公还是海瑞，他们的作为是依靠统治集团的授权。他们不过是王道与霸道的选项，面对的同样是没有权利和尊严的草民。作“青天”的前提是和统治集团保持一致，当“自己人”。用时髦的话说，是“体制内”的。此时你有按资分赃的权利，甚至会得到作“青天”的资本，像包龙图的御赐铡刀。但是当你站在“草民”，站在无权势者一边时，情况就彻底变了，更不要说你是反出体制的叛逆。宾雁是站在“草民”和“无权者”一边的，他的敌人是苦难制造者，也是“青天”制造者。宾雁

的劳作就是要消灭制造青天的土壤，让民族中的个体成为自由的有尊严的个体，从而让民族成为自由的有尊严的民族。这是权势集团不能容忍的。在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强权”质问同是神祇的赫淮斯托斯为何不赶快执行宙斯的命令，把普罗米修斯钉上悬崖：

“为何拖拖拉拉，心生怜悯，
你难道不恨他。
众神可恨他入骨，
因为他把你们的秘密泄露给凡人”。

宾雁就是这样一个“揭秘者”。他不断言说着“真实的存在”，号召人们鼓起勇气去“生活在真实之中”。宾雁不是青天，他是土地。

人们还常说宾雁是“民族的良心”，我却对此有些困惑。如果组成民族的个体是背信、贪婪、懦弱、麻木、腐化、自私，那么这个民族的良心在哪里？如果一个民族中的个体，心里充满了奴隶的恐惧，它让民族丧失创造力，丧失感受崇高事物的能力，那么这个民族的良心是什么？如果一个民族中的个体因暴君暂时放松了轭套而得了温饱的生活，便急忙亲吻暴君的手，那么这个民族又如何去发现它的良心？良心不属于“民族”这样一个空洞的集体概念，它只属于个体。良心的觉醒，良心的发现，良心的坚持，都要由个人承担。我们太放纵自己的懦弱，把本应该反躬自问的责任都推给了宾雁，让他一人去承担对集体暴行、犯罪共谋的良心拷问。而我们却躲在“民族良心”的浓荫下心安理得地品尝“人血馒头”。让我们把“民族良心”的重担从宾雁身上卸下来吧，把它交到每一个人手里，让个体的良心担起它的责任。正如别尔嘉耶夫说的：“只有当我们摆脱了内在奴役的时候，也即我们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停止在各方面归罪于外在力量的时候，我们才能摆脱外在奴役。知识分子新的灵魂就会诞生。”

宾雁是一个大智大勇的人，他的大智常以旁人视作“愚”的方式表现出来。如果他适时而退，如果他缄口不言，如果他不在意“真实的生活”，在现存体制内，以他的资历和威望，不知能获得多少令人垂涎的好处。宾雁说，确有相当要好的朋友苦口婆心劝他“收敛”一些，劝他“识时务”一点。甚至有人传下高层人士的话，说宾雁“只要改正了他的缺点，一定会作出很大贡献”。宾雁说，这话的意思是要我当“歌德派”，并且“必有重赏”。他说这话时，气度高贵，凛然不可犯。他知道这是一条西西弗的道路。区别在于，西西弗是神罚的苦役，而在宾雁是自选的献身。“他必须拼命地做一件无所成就的事情。这就是对人世热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加谬）

令人感动的是，宾雁的选择并不为了某种宏大叙事所需，而只为了“人们在受苦”，只是因为“我见过许多受苦受难的人”。这种选择带有某种悲剧英雄的味道。但对宾雁而言，甚至悲剧这个词都有些戏剧化的夸张。说他是悲剧式的英雄只是外在的观照，宾雁从来不觉得他是个不幸的人。相反，他认为自己是幸运的，甚至是幸福的。正像他写的：“当很多人和我在一起时，幸福便会把我的痛苦淹没”。他的幸福感是极为人性化的。这种幸福感不来

自于获得多少实际利益，占有多少物质财富，博得多少世俗声名，而来自友谊、忠诚，来自正义的伸张和受难者的微笑。

和他初识，我曾经以易卜生笔下的布朗德看他，后来发现完全错了。在布朗德那里，民众需要由掌握了上帝真理的人来教育。他对待民众的态度是傲慢的，非人化的。他率领众人登山，队伍中有女人说“我的娃娃病了”、“我脚疼”、“哪有一滴水解我渴”？布朗德的回答是“你们的奴隶的烙印真够深……。回到你们的坟墓里去”。队伍中有人问“拼搏要多久，要流很多血吗？”他的回答是“它要一直延续到生命的尽头，直到你们牺牲了你们的一切，直到你们从妥协折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遵守全有或全无的戒律”。布朗德的这种蛮横的“解放者”的形象，要以被解放者的永恒牺牲为代价。他口口声声说他如何爱他的民众，那不过是要求奉献的口实。因为“爱不为伟大，只为细小。从细微的小事中体现博大的爱”（圣•特里莎）

宾雁对人的爱就是这种细小中的博大。他会因收到不幸者的申诉信而彻夜难眠，他会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去回应呼喊他的人。他会为不让一只猫受火烤而忍受凌辱，他会对强大暴虐的统治者说“不”！甚至在他病情危殆时，也不会忘记对朋友的一声问候。在事关大小、轻重的选择时，他会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立场回答“我不接受最高的和谐，这种和谐的价值还抵不上一个受苦的孩子的眼泪……。假使小孩子们的痛苦是用来凑足为赎买真理所必需的痛苦的总数的，那么我预先声明，这真理是不值这样的代价的”。我们不说这种爱的崇高，我们只说这种爱的高贵。崇高是属神的，而高贵是属人的。

宾雁的心灵是一奇迹。几十年的磨难，经受屈辱、背叛、心灵的煎熬、肉体的疲惫、意识深处的贱民地位、对妻子儿女的负罪感，重重重负，需要何等的承受力。我们见过多少人，在迫害之下人格扭曲了，心灵阴暗了。受迫害妄想症、监狱综合症被带到正常世界上，把社会当作监狱，把正常的人际交往当作对敌斗争。他们再不会体验正常的亲情、友爱、信任。这是迫害者的罪孽，也是被迫害者的不幸。但宾雁却是相反的例子。他信任人偶尔会达到轻信的地步，总不相信别人做某种事情是出于恶意。他对某些人的不满会随着想起这个人受过的苦而烟消云散。在他内心里，真正没有敌人，他只对制造苦难的制度发言。即使偶尔提到某个人的名字也只因为他充当了这个制度的代表。他宽厚、博大、对各色人等中那些难以容忍的行为，也至多不过发出呼吁，“让我们讲点良心吧”！共产党特殊的施虐—受虐政治心理结构，竟然不能侵害他慈悲的心怀。看他的心灵以单纯对繁杂，以坦荡对狡诈，以包容对偏狭，以宽恕对伤害，你不能不感叹神造常人，偶尔也会失手，留些奇士在这世上，如茫茫人海中的岛屿，作遇难时救援的基地。

我常常思索宾雁独特的精神气质来自何处，追寻他所赖以为生的土壤、养料、水分和阳光。以宾雁的勇敢无畏、不计得失的行为方式，我们联想到中国士大夫的舍生取义、求仁得仁的道德追求，从他对不幸者的同情、关爱和援手，我们能见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道德证明，从他行事方正坦诚，我们能见到“君子不亮，恶乎执？”的道德修养。但是，这都是太表面化的比附。

宾雁说："受过'五四'以来新文化熏陶的我，对于古文本身就有一种反感，而孔子著作中散发出来的教人循规蹈矩、安分守己、孝悌忠信的一套说教，从形式到内容都令我感到窒息。这同我从生活和文学作品中学到并且向往的自由叛逆精神完全背道而驰"。他自己承认从没有读完过孔孟的任何一部著作，中国传统思想对他的影响并不格外重要。相反，"父亲从苏联带回了俄国的自由主义，对我后来的成长起了决定性作用"。这种影响甚至反映到他的气质中，以致有人批评他"像没落的俄国贵族"。宾雁喜欢读别尔嘉耶夫的著作，简直象出自本能。正是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灵魂》中指出："俄罗斯的自由主义者与其说是国家制度的拥护者，不如说是人道主义者。"也正是他指出："俄罗斯灵魂正在燃烧着。这颗灵魂永远为了人民和整个世界的苦难而忧伤，这是一种难以抑制的痛苦"。一个自由的人道主义者，一颗为人民的苦难而忧伤痛苦的灵魂，这才是宾雁人格的生发之地。我简直要说，宾雁，你仿佛是一个俄罗斯的灵魂长在了一个中国人的身躯里。

一九五八年，宾雁在山西平顺县劳改，在他的行囊中，竟然一不带毛选，二不带马列，而是带了"足有三块砖头厚的三卷《别林斯基全集》和同样厚度的四卷《俄罗斯作家论文学劳动》"。在他最需要精神支持的年代，陪伴他的是别林斯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每日繁重的劳动结束之后，宾雁伴着如豆烛光苦读《战争与和平》。我能想象得到，安德烈•包尔康斯基受伤躺在战场的草地上，眼望蓝天的那一番哲学思考，会怎样地打动劳改犯宾雁的心。

在宾雁的思想中，我们常能瞥见到别林斯基的影子。别林斯基说："当个人感到痛苦的时候，群体的生活对我有什么意义？当百姓倒在泥泞中的时候，地上的天才生活在天空中，这对我有什么意义？"宾雁也同样认为，当社会现实责任召唤作家的时候，他不能躲进贪新骛奇的纯文学中。他对逃避现实的文学始终持怀疑态度。这种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更是直接来自别林斯基。甚至他对人道的社会主义的认同也与别林斯基相似。但是，别林斯基也有狂热激进的一面。他说："人们是非常愚蠢的，必须强迫他们走向幸福。同千百万所受的屈辱和痛苦比较起来，几千人所流的鲜血又算得了什么？"这种近似列宁的言论，在宾雁的思想中却见不到痕迹。

凡涉及到个人权利、个人自由时，宾雁更是站在赫尔岑一边的。正是赫尔岑先知般地注意到在社会主义中应如何维护个人的完全自由。他直斥付立叶的法伦斯泰尔是"兵营"，它会压抑人的个性和精神生活。赫尔岑把自由视作社会革命的目的。以塞•柏林总结了他的思想："他也希求社会正义、经济效率、政治稳定，但这些仍必须永远次要于保护人性尊严、支持文明价值、保护个体不受侵犯、维护感性与天才不受个人或机构凌辱。任何社会，无论因何理由，未能防止对自由的这些侵犯，而开启门路，使一方可能施辱、一方可能屈辱，他都断然谴责"。我以为这同宾雁的追求是一致的。

宾雁这一代人受俄国思想和性格的影响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可惜这种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俄罗斯思想中视自由为神圣，以平等为理想。它的献身精神，广阔深厚的博爱，同情苦难，仇恨专制的情怀能激发、滋养崇高的人格。另一方面，它的圣愚现象，权力

迷信，暴躁与麻木交替，残忍与奴性共存，又成为激进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温床。在俄国蜕变为苏联之后，这后一方面的特性又格外恶化。

宾雁是受前一种影响的范例。而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后一方面的影响却更大，所以我们会赶走赫尔岑、萨哈罗夫、肖斯塔科维奇、阿赫玛托娃……，留下斯大林、日丹诺夫、李森科、叶若夫……。宾雁谴责这种逆向选择："爱、快乐、怜悯、善、良心、和美从口语中消失，自我、人、个人不再在出版物中出现。这自然是它们首先从生活中，从而也就从意识中消失的结果，同时也是原因"。为了恢复这些词语的地位，他劳作一生，因为他深知，恢复这些词语的地位就是恢复人的地位、尊严和自由。或许这些词语在当下的中国已不再重要，但是当一些"知识精英"沉醉在伪盛世的狂歌艳舞与酬酢的浅斟低唱时，宾雁却依然呼唤我们"听一听苦难的呻吟和愤怒的呐喊"。

宾雁离世之后，朱洪寄来一张他最后时光的照片。那是晚秋时分，木叶摇落，碧草上已铺就一片金黄。宾雁坐在秋阳之下，面容清癯，白发微疏，嘴角挂一丝微笑，神态平静安详。我端详这张照片，突然觉得这神态似曾相识。终于想起，它极象乌东为晚年伏尔泰所作的那尊雕像。区别在于伏尔泰的微笑是嘲讽的，泄露出他那些刻毒的小把戏。宾雁的微笑是宽厚的，显示着他的仁慈与博爱。伏尔泰是一个思想锐利的哲人，一个在高山和泥沼中同样得意的人物。而宾雁却只是在大地上奔走劳作。

他是巡游九州四野的不倦的歌手

他是苦难大地生发养育的自由的灵魂。

宾雁，我知道你是带着遗憾告别人世的，因为当局的卑劣懦弱，你未能安息在故土，而你是如此地深爱那方土地和百姓。我倒想换个角度来看。我们谈论祖国，却不谈论祖国背后的不义。只有在祖国这个概念成为善与正义的道德载体时，爱它才是正当的。西蒙•薇依甚至认为："只有在希特勒式的制度中，祖国才成为独一无二的观念"。陈独秀干脆说："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你知道，伟大的但丁也是长眠于流亡之地的。佛罗伦萨当局曾以认罪为他返乡的条件，但他傲然拒绝了。他说："如果我不认罪就不能返回的话，那我绝不回去"。他葬于拉文纳，在他的墓碑上刻着："我但丁葬在此地，是被家乡拒之在外的人"。那战胜汉尼拔，拯救了罗马的大西庇阿，因受了加图不公的指控，愤然去国，在利波纳终其一生。他墓上的铭文高傲地宣示："我绝不要马革裹尸，回到忘恩负义的祖国"。夏多布里昂赞叹道："流亡异国只能抹去凡夫俗子的名字，却能使英雄永垂不朽。美德令我们崇仰，当美德背负了苦难，就更能打动我们的心灵"。宾雁，倘如此，你是毫无遗憾了。

宾雁，我与你自七八年相识，至今已二十八年。当时我只是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躁动不安地注视着世界。与你相识，是我受的最大恩惠。后来读到施韦泽说："我们每个人都应深深感谢那些点燃火焰的人。如果我们遇到受其所赐的人，就应当向他们叙述，我们如何受其所赐"。但我竟从未对你说过一声谢谢，因为男人的矜持而忽视了感恩。

《世说》载"吾时月不见黄公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古人对人格的向往与尊崇要

远胜于今天。你所喜爱的别尔嘉耶夫说："我们很少有人会被个性的尊严、个性的荣誉、个性的正直和纯洁所吸引"。在我看来这近乎暴殄天物，因为世上最珍贵的东西正是高贵的人格，这往往是造物的恩赐。

宾雁，你曾对我们这一代寄予厚望，甚至以为我们这一代人能看到自由中国的曙光。但让你失望了。少年时的朋友，如今或已居庙堂，或已成硕儒，或腰缠万贯，或已变闻人。但这外在的成功，就是我们的最终追求？记得年轻时，我们曾发出过"不自由，毋宁死"的誓言，而今，我的朋友，可曾记得这青春的信念？歌德曾慨叹：

"对他们我唱出过第一部的人们
再也听不到我这后半部的歌咏
友爱情深的聚会，如今久已离分
消失了的呀，啊！是那当年的共鸣
我的哀情唱给那未知的人群听
他们的赞叹之声适足使我心疼
往日里，曾谛听过我歌词的友人
纵使还在，已离散在世界的中心"。

每颂此诗行，令人感伤而惆怅。

宾雁，我写完了这篇回忆，为你，为朱洪，也为我自己。不知你可满意？月中，我带着文稿来到布列塔尼海边。就是这里，我们曾经相约要一起来度假的。深夜，面对桌上凌乱的稿子，我想起你，想得心痛。这十几天似与你朝夕相对，伴着涛声与鸥鸣。今晚稿成，我和雪又到海边去了。落日在它消逝前的几分钟里，突然余威大发，撕裂云层，将布列塔尼海岸涂成赭红。海湾对面，夏多布里昂埋骨之处，圣马洛城迎向夕阳的玻璃窗燃烧起来。只一瞬，火焰突然熄灭，一切归于寂静，只剩轻风低语，细浪吻岸。碧海深处，一颗流星闪过，象你，隐入幽邃的历史。此刻，沙翁的名句在脑中浮现："你并没有消失，不过感受了一次海水神奇的变幻，化作富丽而珍奇的瑰宝"。

8月24日，草于第纳尔海滨
8月31日，修订于奥赛小城

# 骊歌清酒忆旧时

一

那是七二年暮春的五月，街头正弥漫着槐花的清香。我刚从怀柔山中回京轮休，就接到了萍萍的电话，说有个人挺有意思，你来见见吧。傍晚，唐克就背着他的吉他到南锣鼓巷149号来了。

萍萍家与我家是世交。我们两家住得很近，百十米的距离抬脚就到。萍萍是师大女附中的才女，高挑的身材，妍丽的容貌，在我这个青涩少年的眼中，是幽居深谷的佳人偶落尘寰。她的声音好听，清脆中带着难得的胸音，歌喉宛妙。以她的才识风貌，天生一个沙龙女主人。所以她家那个幽静小院常有各路人马聚会，说的都是中国以外、民国以前的雅事儿。

我那时十七、八岁，正是青春萌动之时。虽然模样呆头呆脑，但心里满是普希金的浪漫、雨果的激情。萍萍大概看我“孺子可教”，又碍着老辈儿的面子，常常带我玩。这天她来电话约我去，我立刻就奔了“高台阶”（胡同里的老百姓管萍萍家的宅子叫高台阶）。萍萍家当庭一颗大核桃树，繁枝厚叶，浓荫匝地，遮住了小半个院子。我推门进院，见大树下立着一条汉子。身高一米八以上，宽肩细腰长腿，面色白皙，眉峰外突，双眼下凹，阔额方脸，鼻梁高挺，细看有胡人相。此人长发披肩，一条细腿裤紧绷，屁股的轮廓清晰可见。照现在的说法是“性感”，按当时的看法，叫“流氓”。他左手扶在核桃树干上，右肩上挂着一把大吉他，古铜色的漆皮已经脱落。萍萍介绍说“他叫唐克，是北京汽车制造厂的”。我在工厂看惯了穿劳动布工装、剃着“板寸”的工人师傅，乍一见这副行头打扮的人，颇觉惊讶，觉得有点像港台特务。唐克朝我一笑，他笑起来倒不像坏人，显得有点腼腆。

进客厅坐下，萍萍说：“唐克会好多你没听过的歌”。我很好奇，想听唐克唱，尤其是弹吉他唱歌的情形，只在小说里见过。唐克不忙弹唱，反问萍萍：“上次给你抄的歌，你学了吗？你来唱，我伴奏得了”。我这才知道此前他们已经对过几次歌。萍萍说：“你还是先唱几首吧”。唐克从沙发上站起来，搬过一把椅子，坐下，开始调弦。轻拨慢捻，随手给出几个琶音，流泉般的叮咚声就在屋里漾开了。调准音，他回头问萍萍唱哪一首，未等答话，自己就报了名：“唱《蓝色的街灯》吧”。在吉他轻柔的伴奏下，歌声起了：

“蓝色的街灯，
明亮在街头，
独自对窗，
凝望夜空。
星星在闪耀，
我在流泪，
我在流泪没有人知道。

谁在唱啊？
远处轻风送来，
想念你的，
我爱唱的那一首歌”。

唐克的嗓音不算好，沙沙哑哑的，但有味道，而且音准极好。唱到高音处，梗起脖子，额头上青筋绷露，汗水涔涔，一副忘我的样子。眼睛只盯着左手的把位，动情处会轻轻摇头。这是什么歌啊！缠绵、忧郁，那么“资产阶级”！在他轻弹低唱之时，我的眼泪几乎要落下来。我们从小只听过毛主席语录歌，那些配了乐的杀伐之声。而这《蓝色的街灯》却把我带到另一个世界。凭这歌声，我喜欢上了唐克。

但唐克并不把我放在眼里。唱完歌，他只是看着萍萍，期待着那里的回应。我忍不住说：“真好听，再唱一支吧。萍萍说，你会很多歌”。唐克仍然看着萍萍，问：“想听哪一首”？问话里含着期待。萍萍轻轻应一声“随便”，便不再说话。唐克低头，只在吉他上摩挲着，不时弹出几个和弦。我突然明白，今天在这屋里，我是多余的。再看唐克，满眼的惆怅，琴声中涟涟流出的全是爱意。没错，他在追萍萍。片刻的寂静，唐克突然奋力一击琴箱，随即琴声大作，唱出的歌也不像前首的婉转低迴，歌词似乎皆从牙缝里吐出，带着嘶嘶的爆裂声：

“葡萄的美酒令人沉醉，
苦口的咖啡叫人回味。
没有人理我，
我也不理谁，
一个人喝咖啡，
不要谁来陪。
我要喝，
葡萄美酒加咖啡，
再来一杯也不会醉，
没有人爱我，
我也不爱谁。
一个人喝咖啡不要谁来陪”。

歌声中的绝望让人心碎。后来我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苦咖啡》。

唐克爱上萍萍，他注定要喝苦咖啡了。萍萍早有男朋友，是总参作战部首脑的公子，家住景山后街军队大院将军楼。此人生得孔武有力，是地安门一带有名的顽主。每来萍萍家，必是锰钢车、将校呢、将校靴，行头齐全。他不大读书，也不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真

正是根红苗正。我奇怪萍萍和他在一起怎么会有话说。

天色渐晚，唐克几次请萍萍唱歌，萍萍都未答应。待他起身告辞，已是繁星满天。我请他把今晚唱的歌片抄给我，他敷衍地应着，显然没想到这几支歌对我的意义。在萍萍那里，这歌是追求者的奉献。在唐克那里，这歌是倾诉爱慕的语言。而对我，却是一个新世界的展现。我陪萍萍送唐克到门口。月光透过宽厚的核桃树叶泼洒在院子里，天风轻拂，地上满是光影的婆娑。有一刻，萍萍与唐克相对而立，光影中，这对俊男倩女宛若仙人。一霎那，我觉心酸。

离开"高台阶"，陪唐克向锣鼓巷南口走，没几步就到了炒豆胡同，我要拐弯回家。和唐克打招呼再见，告他我就住在路北第一个门。唐克仿佛猛然醒过来："噢，咱们留个地址吧，今后好联系。你不是要我的歌片吗？我抄好就寄给你"。离开萍萍，唐克好像还了魂，说话的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了。刚才在萍萍家客厅里若有所失的恍惚不见了，举手投足透出几分潇洒。听说他要和我联系，我挺高兴，便把工厂的地址给了他，告他我平日不在北京，两周才回来一次。唐克走了，双手插在裤兜里，上身微微晃着，披肩发和身上背的吉他一跳一跳的。我呆立着，看他消失在灯影里。那不是蓝色的街灯，而是橙黄色的，昏暗、朦胧。后读龚自珍《已亥杂诗》，见有："小桥报有人痴立，泪泼春帘一饼茶"句。那就是年少时的我吧。

回到怀柔山里不久，就接到了唐克的信，里面厚厚的一叠歌片，都是他手抄的简谱，工工整整，一笔字相当漂亮。看看自己那笔破字，更从心里佩服他。唐克给我的信很长，尽是些我不知道的事儿和词儿。我印象最深的是"甲壳虫"。因为他抄给我的歌片儿里有两首英文歌，原词没有翻译，是Yesterday 和Michelle。那时我会的英文词超不过百十个，根本看不懂这歌说的是什么，可他在信里特别提到给我的歌片儿里有"甲壳虫"的歌。后来才明白"甲壳虫"就是Beatles的中文译名，现在大多称"披头士"的。信有点烫手。那时候，若让革命群众发现，唐克教唆犯的罪名是逃不掉的。"传播黄色歌曲，毒害革命青年"，为这关几年大牢是家常便饭。但我喜欢。读他的信，有点心跳，却高兴他拿我这么个小屁孩儿当朋友，弄些犯禁的东西传给我。在禁忌的时代，哪个年轻人没有渎神的冲动。更何况我又生来有反骨，专爱惹是生非，让我妈夜里睡不着觉，做梦都是我进了局子的事儿。七二年，"甲壳虫"已经散伙快两年了，四雄单飞，列侬已经写出了不朽名曲Imagine。当然，这是我后来知道的。那时，在中国大陆，听说过"甲壳虫"名字的又有几人？因了唐克，我算一个。

信，我是精心藏好了，歌则和好朋友一起躲在山沟里人迹罕至处偷偷学唱。唐克当时抄给我的歌，现在还能记住的有《寻梦园》、《蓝色的街灯》、《晚星》、《唐布拉》、《苦咖啡》、《魂断蓝桥》、《告别》。这些歌和当时的社会氛围全不搭界。我们就凭它，有了一种别样的生活。唐克给我的歌和当时流行的苏俄歌曲不一样，似乎来自另一种文化，大约是从英美到港台的一路。这些歌里少了苏俄歌曲中浑厚忧郁、崇高壮烈的情绪，多了缠绵悱恻、男嗔女怨的小资情调，更个人，更世俗。后来我偷偷唱给几个知心好友听，没人不爱。

既有信来，必有信往。我得给唐克回信，为了证明我有资格做他的朋友，而不仅仅是萍萍的“灯泡”。好歹那时也胡乱读过几本书，得在唐克面前“抖抖份儿”。

这封信足足花了我一个星期的工余时间。每天下班之后，别人都回宿舍了，我一个人躲在车间的角落里，打开机床灯，趴在工具柜上写。字难看，就写慢点，一笔一划的，学问不大就拽着点，东拉西扯的。当然，我的“杀手锏”是萍萍，就凭这名字，拿下唐克不成问题。当时我刚通读完《鲁迅全集》，正好拿来卖弄。我给唐克分析了一通他为何不该爱萍萍。在我看，一是萍萍已经名花有主，二是像唐克这么一个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庭的闺女也不般配。记得信中还用了“贾府上的焦大也不会爱上林妹妹”之类的比喻。我并无伤害他的意思，只真心希望他认清爱的无望，不要徒费心力。就算信写得不招唐克待见，相信我的单纯坦白他会理解。

每天写完回宿舍，已是繁星高挂，夜幕四垂。沿着八道河往宿舍走，河水的鸣溅伴着稻田里的蛙声，汩汩、咕咕，交相回应。满山坡的栗子花香得醉人，偶尔蛙鸣止息，能听见玉米拔节的“咔嚓”声。带着刚才一逞“堆砌”之快，飘飘然觉“万物皆备于我”。

信发走后便撂在脑后不去想它。

## 二

又是一个轮休日。刚一到家，我妈就说，这几天老有个叫唐克的找你，留了电话号码，让你回来后给他回话。一看是个公用电话号码，下写“请传新街口大四条45号唐克”。

我心中忐忑，不知唐克收到我的信没有，会有什么反应。傍晚时分拨通了电话，唐克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音调高昂、兴奋。先听他说“你这封信写得可是花了力气”，接着大谈萍萍也是爱他的，并不是他单相思。又说起他最近见了一个什么人，两人谈起《人·岁月·生活》这部书。接着，洛东达、莫吉尔扬尼、毕加索等名字子弹般飞来。接下来说一定要见面，给我讲讲这本书。随后他压低了声音问我，萍萍读过这本书吗？说实话，这部书的名字我是第一次听到。问唐克，这书是谁写的，他竟然一时语塞，没说出来。唐克立刻要约我见面，叫我到他家去，只是有点抱歉地说，他家地方太小。第二天下午，我们约在新街口丁字路口，几分钟后就站在唐克家门前了。

新街口大四条在新街口以北豁口以南，斜对着总政文工团排练场。胡同不算窄，沿街有老槐树。唐克家院子门不大，进门左手是个长方形的小院，搭着许多小棚子，院子显得拥挤。顶头一颗大槐树，遮了半个院子的荫。唐克家是北房，只一间屋，约二十几平方，屋子分成两部分，靠里一张大双人床，靠外一张小单人床。简简单单几件家具，倒收拾的干净。屋子中间已经摆好了一张方桌，桌上几盘小菜，一瓶北京红葡萄酒。迎门坐着一位老人，鹤发童颜，腰板挺直，双目炯炯有神。他就是唐克的父亲，以后我一直称他唐伯伯。

看气度，老人绝非等闲人物。与唐克交往多年，我从没有问过老人是干什么的，唐克也未提起过。只偶闻他曾是民国时期演艺界一位重要人物。直到前些年，唐克寄给我一份国民

党C.C.系祖师陈立夫给他的亲笔信的复印件，称他“克信贤侄”，才知道这位唐老伯和C.C.系关系绝非寻常，能与陈立夫兄弟相称。唐克告我他的名字就是陈立夫所起。

老人见我进来，点头相迎，命我坐下，开口便说：“我看了你给唐克信的信”。我才知道唐克本名克信，人称唐克乃是简称。老人道：“看你年纪轻轻，还真读了不少书，不像唐克信，不学无术，整天鬼混”。我心一虚，知道是我信中天南地北，古今中外胡拽的结果。随后，唐伯伯又讲了一通青年人应该如何上进，和报纸上差不多。唐克烦了，催着快吃饭。饭后老人又夸了我几句，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吓得半死的话：“唐克信这孩子，我就交给你了”。

我记不起来当时如何回答。以我当时的阅历，肯定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现在回想，一位耄耋老翁，把二十几岁的大小伙子托付给一个十七八岁的半大小子，有多滑稽。唐克对此倒是听而不闻，也许这小子太过顽劣，老人不知已经把他托付给几多人了。老人起身离席，走到院中洗漱了一下，就回屋和衣倒在靠里面的大床上。唐克冲我一招手，我们就溜出了屋子。

东西向的院，唐克家靠东侧，顶西头有个小院和大院子中间隔着门道，小院中有一小屋，隐秘得很。唐克引我进去，说他平时就住在这间小屋里。小屋仅有五、六个平方，一单人床，一双屉桌，桌前破椅一把，坐上去嘎吱响。若一人坐在床上，一人坐在椅上，空间仅可容膝。开灯，是盏北京当时最流行的八瓦日光灯，嗡嗡响了半天也不见亮。唐克猛拍，终于亮了。一眼见正墙上挂着唐克那把心爱的吉他，在惨白的灯光下有森森色。唐克摘下吉他，轻抚琴箱，讲起这把吉他的来历。这琴是他从一位朋友处淘换来的，以前，它是一位苏联专家的。这位专家的父亲三十年代曾是国际纵队成员，参加过马德里保卫战。战败后归国，带回这把吉他。唐克告我，这种手抱挥弦的吉他叫西班牙古典式，适合弹奏古典乐曲和歌吟伴奏，声音浑厚。另有一种吉他音箱狭小，需用拨子弹奏，声音尖亮，是夏威夷吉他，适合小乐队演奏。又告我吉他大师塞戈维亚就是弹奏这种西班牙古典吉他。从此，我又知道了一个神圣的名字：塞戈维亚。

吉他在唐克的抚弄下似乎有了生命。磨损的漆皮透露着岁月的消息，不知何年，几多良夜，它曾在佳人窗下倾诉。许是刚才吃饭多喝了点酒，唐克有点兴奋，不停抚弦欲歌。我怕夜深搅人，尤其是唱被禁止的音乐。他说街道大妈和他关系不错，还曾说他唱得好听呢。那晚，唐克唱了《晚星》，一首此后几十年和我在一起的歌：

“傍晚，我望着夜空，
想起你，知心朋友。
你远在天边，
几时才能和你相见。
晚风吹着我的脸，
星儿啊，

又随风飘散，
飞到我身旁，
永远陪伴着我。
如今我寂寞悲伤，
有谁知道我在流泪，
只有你啊，
知心的朋友，
可是你远在天边。
如今我孤零无靠，
今往何处去流浪，
只有你啊，
知心的朋友，
可你远在天边”。

屋子小，拢音，琴箱共鸣更显丰厚，唐克的声音也格外动人。已微醺的我是彻底的醉了。琴歌声歇，我起身告辞，已是午夜时分。骑车往家走，洒水车刚过，新洒过水的街上，清凉阵阵。街上没人，我兴奋，放声大唱，从新街口一路唱回家。到家门口，忽听身后有人说再见，一看是唐克，说怕我喝多了路上出事，就一直跟我回了家。看我平安到家，便掉头走了。

三

那年夏天，怀柔山区爆发山洪，淹毁了我们工厂。抗洪救灾后，工厂已无法生产，全厂工人返京自找地方实习。我去了北京起重机械厂，一呆就是一年多。

这段时间，和唐克隔三差五就见面，跟他学歌，听他胡聊，当然也从他那里学东西。“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看太阳”，是唐克在一封信中抄给我的巴尔蒙特的诗。这诗行对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人实在有颠覆力。我们从小接受的信条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的人”，是为了“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唐克却用巴尔蒙特的诗告诉我：睁开眼睛吧，这世界上还有其他好看的东西。在听到北岛吟诵出“我不相信”的决绝之前，我一直以“看看太阳”的态度来生活。那时，我也寻到过普希金、拜伦、雪莱的诗，把那些滚烫的诗行抄在秘密的小本子上，藏在心底：

“我要凭那无拘无束的卷发
每阵爱琴海的风都追逐着它
我要凭那墨玉镶边的眼睛

睫毛直吻着你颊上的嫣红”

但拜伦的爱琴海对七十年代的中国太轻柔明媚。中国是死海，粘稠污浊的海水里涌动着无数受苦的灵魂。踟蹰在巴黎街头的巴尔蒙特才更贴近我们。

七十年代，北京在不同时间流行过不同的书。《人·岁月·生活》文革前就已在内部出版，但它最受青年人“追捧”的时间大约是七十年代初。这本书最流行的时候，我没读过，我知道它是听唐克说的。书的内容相当丰富，但唐克不断向我提起的主要是艺术家在巴黎的生活。他最津津乐道的故事是一位画家在洛东达咖啡馆门口脱得精光，一位警察看看他问道：“老头，你不冷吗”？唐克抛给了我一大堆名字，莫吉尔扬尼、毕加索、马蒂斯、“洛东达”、“丁香园”、“洗衣坊”、“蒙马特”。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扇小窗子，透过它，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可惜，我们虽然常提起巴尔蒙特、阿波利奈尔，但没读过他们的诗。我们谈论印象派、立体派、抽象派……，但没看过它们的画。我们拿新鲜名词娱乐自己，更由于物质追求被严酷地禁止，对精神的追求就来得格外强烈。“洛东达”对唐克或者说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唐克谈起它就像饕餮之徒谈起菜谱？后来我明白，“洛东达”不仅意味着无数开先河、领风骚的艺术家曾聚集在它昏暗肮脏、烟气弥漫的厅堂里，更因为它代表着自由的思想与创作，代表着特立独行的人格，代表着精神上的相互启迪与召唤，代表着友谊能打破民族国家的藩篱，仅因为道义相砥、精神相通而地久天长。

我要读这部书，问唐克，他没有，而且我发现他并未真正读过这本书。他所知道的内容大半是听来的，或是得自友人之间互相传递的那些隐秘的笔记本。我有几位大朋友，是文革前101中的高中生，家里都有些背景。其中有一位门路极广，我们叫他“老胖子”，我请他帮忙。等了挺长的时间，老胖子才告我找到了，说这书印得很少，他是通过马海德的公子幼马找到的。马海德在共产党内的地位类似白求恩，属于为革命服务的国际友人。幼马是个混血儿，为人慷慨仗义。老胖子和他家住隔壁，关系很熟。我当晚就跑过去取回书，老胖子限我一周还书。这书用旧报纸包了个皮儿，两册，黄黄的书页。后来我知道，当时流传的这部书并不是全本，它只有四个部分，而爱伦堡一共写了六部分，一直写到“解冻”。拿到书，我通宵达旦地连读带抄。仅一周时间，恨不能把这书吞吃下去。看了才知道，书的内容极丰富，远胜过唐克的“口头传达”。它不仅记述人物、事件、场景，还有更深入的思考，而唐克似乎并不在意这些需要更高智力活动的内容。他是通过感觉来吸收，通过听力来汲取的，以至一次我把抄下来的段落给他看，他竟问我“这是什么书”。

但这并不妨碍他“生活在别处”。当“全世界人民都向往着祖国的首都——北京”时，唐克却向往着“巴黎，宛如一朵灰色的玫瑰，在雨中盛开”。当全国人都爱看“伟大领袖毛主席慈祥的面容”时，唐克却想看毕加索笔下那些变形的“丑女人”。在大伙都爱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时，唐克却要唱“一个人喝咖啡不要人来陪”。在一片灰色的萧瑟中，唐克是一点绿意。和他在一起聊天，我们说的几乎是另一种语言。“两报一刊”生产的套话消失在新街口大四条的陋室里。那里有缠绵的琴声，和“恨今朝相逢已太

迟”的叹息。

四

这段时间，唐克的兴趣集中在电影和摄影上。现在每次见面，他都会谈到某部电影，有些是文革前上演过的，像《战舰波将金号》、《第四十一个》、《偷自行车的人》，更有些他也只是听说过。他给我讲过帕索里尼的《迷惘的一代》、格里耶的《去年在马里扬巴德》。最津津乐道的就是“人家真的好电影根本没有故事情节，全靠镜头说话”。哪怕他没看过，这些电影里的新潮思想也会让他兴奋。他有几个在电影界混的朋友，有关现代电影的信息大半是从那儿听来的。唐克的本事就是 “听”。但是他的“听”有一种天然指向，他有兴趣去听的东西一定和人类精神世界的拓展有关。在社会震耳欲聋的革命喧嚣中，他是个聋子。但哪儿有一丝有价值的异响，他马上竖起耳朵，循声而去。

尼克松访华之后，文革的势头稍有疲软。随后维也纳交响乐团、费城交响乐团、斯图加特室内乐团相继访华。阿巴多、奥曼迪的名字在小圈子里不胫而走。这几个外国乐团我都没听成，因为除了江青和她的一些死党，剧场里坐的大都是士兵，整团整营地开进去，一声令下就座，开始受罪。记得斯图加特室内乐团演出那天我回怀柔山里办事，晚上站在宿舍凉台上，习惯性地拿出我的九管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找那些传道讲经的电台，它们往往在两段圣经之间放一段古典音乐。但那天还没调到短波，就清晰地听到了莫扎特的《弦乐小夜曲》，原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居然播了一段演奏现场实况。听得我顿觉星光灿烂，万山奔涌。回城后唐克来找我，得意洋洋地说他听了这场演出的现场。怎么可能？其实他用了一个极简单的方法：在民族宫礼堂台阶下昂首挺胸站好，某首长在门前下车，立即紧紧跟上，稍抬双臂，做保护首长状，跟着进了剧场，然后立即闪进厕所，等没人时进去找个空座坐下即可。他告我，剧场空座很多，越往中间坐，越没人敢问你。关键是你要心里觉得自己是大爷。

七四年，邓重回权力中心，各种“另一个世界”的东西通过难以察觉的缝隙透进铁屋。唐克敏锐地嗅到了一丝异味，于是像暗灰吹了氧气，火苗陡起，开始四处征战。自斯图加特室内乐团混场告捷，他又发现总政文工团排演场常演“内部电影”。当局为了“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弄了不少日本的战争片来教育群众，如《山本五十六》、《啊，海军》、《虎、虎、虎》、《日本海大海战》……。先是在高干中演，随后扩及文艺界的核心队伍。但唐克两头不搭界。总政排演场就在家门口，肉香扑鼻却不给快饿死的饥汉分一杯羹，是无天理。一天，唐克突然兴奋地告诉我，他看了《啊，海军》，随后给我大讲东乡平八郎初入江田岛海军学校，教官嫌他回答点名时声不够壮，便大声喊“我听不见就是听不见”。为了让我能身临其境，唐克模仿台词竟至声嘶力竭，青筋绷露。我问他哪里弄的票，他先说是朋友给的，问他是谁，他有点恼火说，别以为只有你们这些人才能弄到票，我有我的办法。后来他不断有电影看，每次看完都会向我炫耀。那几个月，是自相识以来，他最快乐的时光。

但渐渐地，他再不提看电影的事。新波是唐克的乐友，弹一手好吉他。唐克和他吉他二重奏，都是新波弹主旋，唐克弹伴奏。一天新波不经意地告诉我，唐克画不成票了。我再问，才明白前几个月，唐克出入内部电影院如趟平地，原来是靠画入场券。他发现一家常演内部电影的剧场（我不记得是不是总政排练场）的入场券是油印在一张淡粉色的薄纸上的。这种纸在文化用品商店很容易找到。由于这种纸很薄，油墨洇得厉害，所以用黑墨水笔很容易画。唐克是在剧场门口捡到人家随手扔的入场券，然后回家制作。他原有绘画的根底，画出的入场券几可乱真，从来无人察觉。但前不久，入场券改道林纸铅印了，唐克无计可施。所以近来再无电影看，人也郁闷起来。

一天我上早班，下午两点刚出工厂门，就听唐克大呼，一看他正在马路对面等我，双腿蹬地，跨在自行车后架上，前摇后摆好不惬意。没等我走近，就急着告诉我，他又看了一个多么棒的电影。我逗他说，又能画票啦，他撇嘴道："谁画了，我自己买票看的"，语气大有二奶扶正、穷人乍富的得意。这次他看的电影叫《爆炸》，是官方准演的罗马尼亚电影。主角是一位名叫"火神"的消防队员，为了救一艘要爆炸的外国轮船出生入死。唐克最喜欢男主角的那张脸，比起中国银幕上那些装腔作势、一本正经的死人脸，"火神"的脸确实太让人动心。这是一张沟壑纵横的瘦长脸，倒八字眉，塌鼻瘪嘴，但内藏英武之气。此人言语幽默，行动果敢，是我们从未见过的冷面英雄。更让人吃惊的是，电影中竟然有一皮肤半黑的窈窕女郎，身着比基尼泳装，在舰桥、舷梯、甲板间跳来跳去。蓝天碧海、烈火浓烟衬托着鲜亮的桔黄色三点式泳装，果然赏心悦目。唐克坚持认为审片子的人在这个镜头出现时正巧睡着了，以至让这大逆不道的镜头出现在中国观众眼前。这片子唐克看了多遍，还一再鼓动我多去看几遍，说这种片子每个镜头都值得琢磨。

摄影是唐克一贯的喜爱。他有一台老式的单镜头反光135相机，曾给我看过一些他照的人物特写，我当时认为水平相当高。我对摄影一窍不通，全听唐克启蒙，从他那里知道了牛顿的黑白反差效果、布拉萨依的人物照。他珍藏着一张不知哪里找来的布拉萨依照的毕加索相。他对我说，这张相片不符合一般人物肖像的规则，画面切割不均衡，但是人物表情捕捉得太精彩。还拿起尺子在这张照片上比划，说要是他照，他会裁掉多余部分。他对摄影很下功夫，手边几本有关摄影理论与技巧的书，快让他翻烂了。他自己拍照，也自己冲洗，放大机是自己手工制作。他把那间小屋弄成暗室，常常一干就是通宵。有一阵他和唐伯伯闹气，把全套冲洗相片的设备搬到炒豆胡同，夜里我陪他干活。在暗红色的灯光下，见一张相纸从显影液中渐渐显出形象，真有一种快乐。他洗过许多照片，但我现在唯一记住的是他给自制的放大机照的相。构图极朴素，那架细脖大头的放大机孤零零的悬置在照片的中间，似有种哀怨的表情。他自己吹嘘说这张静物照可与牛顿的片子相比。

## 五

唐克在北京汽车制造厂干的是机修钳工的活，这个工种是工厂里技术要求最全面的。要

能判断机器的毛病出在哪，还要能动手修，有时配件不凑手，就得自己动手做。唐克在工厂上班是百分之百吊儿郎当，泡病假、请事假、迟到早退司空见惯。但他群众关系总混得不错，哥们儿、姐们儿、大伯、大妈一大堆。领导恨得牙痒痒，不知整过他多少回，可他一仍其旧，死不改悔。唐克学了手艺也不闲着，总想着自己捣鼓点玩意儿。他建议把我爸五十年代初从越南带回来的那架菲利浦收音机拆了，做个音箱。那时我已经沉溺于古典音乐不能自拔，但没有好设备听。他说可以把我那架北京604开盘磁带录音机接到音箱上，扩展低音。立体声概念，也是听说过没见过，以为弄两个音箱左右一摆就是立体声。终于他把我爸的收音机拆了，其实他只用里面的那只八寸喇叭。他的木工活挺漂亮，外壳还贴了一层深咖啡色的木纹塑料贴面。音箱的原理是他自己瞎琢磨的，但背面开反射孔，内里塞棉套吸音，还真符合声学原理。音箱做好以后，他精心往面板上贴了一个商标牌 “Toshiba” ，后来才知道是大名鼎鼎的日本东芝。也不知道他打哪弄来的。

音箱做好后，唐克又有新的设想：“设计剪裁缝制衣服”。七十年代，大陆几亿人的服装基本上是一个样式，都是脱胎于军装的毛服。唐克平时就要把工装裤改窄，包臀裹腿。他不能忍受穿万众一面的毛式服装。这回他要自己设计款式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把当时叫“老头衫”的圆领衫裁短，长度仅及肚脐。下摆不缝，留着毛边。再就是把劳动布工作裤彻底改造，臀围、大腿围收紧，膝盖以下开成大喇叭口，裤脚毛边，一边的膝盖上剪开一洞，拉出布料的粗纤维。这款似乎是从电影《爆炸》里学来的。难得的是唐克追萍萍失败之后，身边再无女性，而他妈妈也早已不在世，设计的服装全靠自己缝制。他的女红技巧如何，我不能评价，但那身打扮招摇过市，绝对得让“雷子”盯上。

一天中午，唐克来我家，我俩在院门口说话。这时我妈已对唐克提高了警惕，让我少跟他来往，所以他总是在胡同里跟我会面。唐克背靠墙，一脚立地，一腿屈起，脚蹬在墙上。屈起的一腿，恰恰把膝盖上的大洞暴露出来，像裤子破了没补。我姥爷回家，见我和唐克在说话，便点头而过，谁知走过去几步后，突又掉头回来。姥爷是深度近视，他摘下眼镜，弯腰仔细端详唐克裤子上的大洞，然后一言不发，掉头而去。

姥爷是北京市武术协会委员，身怀绝技。太极、通背、形意、八卦掌、五禽戏，样样精通，更有一独门功夫“太极短剑”。文革前他曾带我去看他在北海体育场表演。此套剑术形似太极拳，做起来身形悠缓，气随意走，意气相连，绵绵不断。但前臂内侧暗藏一尺短剑。格斗时，翻腕刀锋立现，一剑封喉，制敌死命。因此套路太凶狠，姥爷从不传人。我表叔曾跟随罗瑞卿掌管公安部，几次劝姥爷将此绝技传给公安学院武术教研室，但姥爷执意不从。后来他对我说：“我怎知学剑的人是不是好人，他要学了去干坏事怎么办”？看来姥爷早知“国家机器是不能信任的”。

唐克走后，我回家，姥爷叫住我问，你这朋友是何人？家里是不是特困难？有无父母？我奇怪姥爷为何问此。姥爷发话道：“这孩子可怜，裤子破成那样还穿了上街，家里没人给补。你叫他进来，把裤子脱下，让你妈给他缝缝”。我妈一听大乐，在旁边朝姥爷喊：“人家那是时髦”！姥爷到了也不明白破衣烂衫如何时髦。再见唐克，相告此事。唐克大感动，

说今后再见了姥爷非给他“磕两不可”。果然，唐克以后再来家中，总找机会和姥爷聊天，哄老爷子，竟至姥爷甚喜欢他，还要教他习武，说赵家孩子全不学他的玩意儿，实在可惜，颇有“广陵散不复传矣”的感叹。不知姥爷要教唐克的功夫中有无他的独门绝学“太极短剑”。

七四年开始批林批孔。像我们这种平日爱“学习”的人大半被组织进了“工人理论队伍”，负责向革命群众宣讲毛的理论。为了配合批林批孔，中国书店上了一些中国古典文学、史学、哲学原著，我们因此有机会读些以往找不到的书。唐克对新鲜玩意总有兴趣。当时北京汽车制造厂的工人理论小组在北京挺出名，所以让他们和北大中文系的工农兵学员一起编辑、注释辛弃疾的词选，因为当时辛弃疾被列入了法家队伍。唐克和厂里工人理论队伍的头儿关系很好，常和人家瞎聊。人家在干活、搞注释，他也趁机读了几首辛词，因喜爱就要和我分享，居然弄到一部人家刚注释完的底稿给我，打字油印，整整齐齐一大厚摞，像本书的样子。唐克自己做了个封面，用挺漂亮的毛笔字题上《稼轩长短句》。后来才知道这是以元大德年间广信书院刊印的《稼轩长短句》为底本，参照前人注释编成，里面大约袭用了不少邓广铭先生的研究成果。反正是工人阶级用，不存在抄袭和版权问题。那一阵我们以背稼轩词为乐。唐克常有独解，犹喜《贺新郎》送陈亮一首，最感叹陈亮别去，稼轩不舍，竟踏雪追人。古人高意勾起唐克远游之心。不几日他告我将独自远行，游历名山大川。既念到“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便要亲往拜谒。我问他可有盘缠？他笑答“一甑一钵足矣”。

六

唐克开始浪迹天涯，几乎每周有一信寄我，信中记载所行遇之奇事。大凡风物人情、遗痕古迹、绝词妙文皆详录之。我不知他的行止，只凭着收到的信知道他到过哪儿。他在成都寄给我的信有十多页，大抄武侯祠、杜甫草堂的铭文、楹联、题诗。记得武侯祠所悬巨匾题“义薄云天”，祠内有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杜甫草堂则有一联，我深爱之：“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随后，唐克在重庆买舟而下，过三峡时，他抄录盛弘之《三峡》名句给我：“每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岫传响，哀转久绝”。他沿途记载长江名胜，在武汉下船寄信给我，信封上注明“发于武汉长江大桥”。随后，顺江而下，过黄冈赤壁，览小孤山，在九江下船奔了南昌。

唐克出发时号称只带了五块钱，沿途多半靠混车、蹭票、扒车而行。他在宝鸡曾上一煤车，半夜几乎冻死。时常饿肚子，但总有好心人帮忙，或请饭，或留宿。在陕西曾被路警抓获，关了好几天，据他说全凭善搞公关，和小警察东拉西扯，最后竟然套出交情，放他出监。唐克没读过《在路上》，我们那时也不知道凯鲁亚克的大名，但唐克肯定是“路上

派”的先锋。后来看到霍姆斯评说道：“《在路上》里的人物实际上是在‘寻求’，他们寻求的特定目标是精神领域的。虽然他们一有借口就横越全国来回奔波，沿途寻找刺激，他们真正的旅途却在精神层面。如果说他们似乎逾越了大部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他们的出发点也仅仅是希望在另一侧找到信仰”。我想，这就是唐克上路时，未曾明了的意义。

唐克自南昌一路南下，在去广州的火车上遇见了阿柳，一位文静、秀美、单纯的姑娘。他一到广州，就爱上了这座城市。他来信说和北京相比，广州太自由，太有意思了，说天高皇帝远，总有草民喘气的地方。还抄了黄花岗烈士陵园里的一些墓碑铭文给我。他在广州呆了好几天，寻访到几位琴友，和人家练琴对歌，受到热情款待。据说他带去的几支歌“关震”，广州琴友盼他携琴南下。因此，唐克有南下之意。加上和阿柳相处的热络，更使他打算辞北远行。

不记得他又转了什么地方，但收到他的最后一信是寄自云南昆明滇池。这已是他离京数月之后了。这封信用红线竖格信纸，极工整漂亮地全文抄录了大观楼“天下第一长联”。信中大抒登临感怀。那时他凭栏临风，望八百里滇池浩淼，叹岁月空逝，立志奋起直追。信写的激昂慷慨，与往昔唐克的消颓大相径庭。再读他抄给我的长联，却更喜：“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真惭愧，唐克当时走过的地方，大半我至今没有去过。有关知识皆来自唐克在路上寄给我的那些信。这些信极有价值，可惜三十年过去，都散失了。八二年，中国现代西方哲学讨论会在庐山举行，我奉命打前站，去武汉办往九江的船票。随后顺江而下，一路默念唐克曾写给我的大江形胜，竟如昨日。过小孤山时，天刚破晓，大雾迷江。一山兀立，江水拍舷，思念的歌声自心底悠然而起。那时唐克已移居广州，我与他久不通消息了。

唐克回京时，我已回山中。待半月后相见，他憔悴又忧虑，全不见旅途中来信时的亢奋。原来这次闪的时间长了，工厂要处分他，严厉至开除。如何收场，我已经记不得，但不久唐克就坚定地告诉我，他要南下。“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唐克要走，对我是件大事。几年来，他是我最亲近的朋友，我的启蒙者。他的怪论激起我读书的冲动，他的琴声带给我多少快乐。但这次，他真要走了。我曾找出许多理由挽留他，但他一句话让我无言：“北京是你们呆的地方，不是我呆的地方”。交往这几年，唐克常讥讽我的出身。他把和萍萍恋爱的失败归结为门第之过，总爱说：“你们是贵族，想要什么有什么”。开玩笑！中国哪里有什么贵族？因为贵族并不仅意味着你站在国家阶梯的第几级上，它更是文化，是教养，是责任，是荣誉，是骑士精神的延续。如果魏玛大公奥古斯特不尊崇歌德、席勒，如果克腾侯爵利奥波德不崇仰巴赫，那他们不过是头脑冬烘的土领主，而国朝之肉食者大半头脑空洞、人格猥琐、行为下作，何来高贵的血脉绵延子嗣？我看那些官宦子弟，大半粪土。而唐克倒有些贵族气。我这样告诉他，他觉得我说反话。

唐克要动身了，几个朋友在大四条唐克老宅为他饯行。似乎天亦伤别，那天阴沉沉的。入夜，雨渐渐落了，滴在院中大槐树上，簌簌作响。我们喝了不少酒，在座的朋友有吉他高

手。呜咽的琴声和着细雨淅沥，别愁离绪伴着未来憧憬。唐克那天看起来很平静，似乎不为离开北京伤感。广州有阿柳，有新朋友，也许有未来。那时的许多青年人，是“有向往，无未来”的。唐克终于拿起了琴，想到今后恐怕很难再听见这把老吉他的声音了，我有点伤心。唐克抚琴作歌，唱的《魂断蓝桥》。此曲用英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的曲调，但歌词全变：

“恨今朝相逢已太迟，
今朝又别离。
流水幽吟，
落花如雨，
无限惜别意。
白石为凭，
明月为证，
我心已早相许。
今若天涯，
愿长相忆，
爱心永不移”。

不知出自何人手笔，颇有柳七遗风，歌之怆然。歌毕，唐克放下琴，沉默不语。这是我听他在北京唱的最后一支歌。

唐克走后，先时常有书信来，地址是广州市粉末冶金厂，那是阿柳工作的地方。渐渐信淡了，竟至全无消息。后来听人说他曾两次奋勇游向香港，但均未成功，被捕获后送农场劳动，吃尽苦头。我曾旁敲侧击问过他是否如此，他顾左右而言它。其实我佩服他的勇敢，他爱死了那种“另类生活”，不仅想而且干，以自己青春血肉之躯去搏取。我担心的倒是他一旦真得到了，会心满意足吗？我以为不会。他的命星高悬在那里。

七

七八年底，所里派科研处刘树勋处长带我到几个省的社科院调查外地理论界的思想动态。知道行程后，我试着往广州粉末冶金厂阿柳处给唐克写了封信，告他我将赴广州，希望能和他见面。但直到动身，也没他的回音。到广州后，省社科院的人安排我们住广州白云宾馆，我又给唐克发一封信，告他我的住处。本已不抱能找到他的希望，没想到，第二天早晨正在餐厅吃早茶，唐克大摇大摆地来了。

久不相见，我是欣喜异常。唐克却仍是一脸的满不在乎。白云宾馆餐厅后面有一室内花园，奇花异草，怪石流泉，相当漂亮。唐克进去转了一圈，出来似有不平，说：“你小子真

会挑地方，要不是找你，这地方我连进也进不来”。七八年时，白云宾馆是广州高档宾馆之一。唐克大概嫌我这个当年一块混的小哥儿们有点堕落。刘先生事前听我讲过唐克的故事，忙从旁圆场道：“工作需要，工作需要”。那时我正读马尔库塞，这次出差手边带了一本他的原著《单维的人》，正巧放在餐桌上。唐克拿起来翻了翻，又是一脸不屑的样子：“嗬，都读洋文书了，中文学会了吗”？我知道他也就是在外人面前“乍刺儿”，便一脸憨笑，随他挤兑。待坐下说起我们在广州的日程，才知唐克早有一个详细的安排，要带我去不少地方，还要见他广州的朋友，似乎要给我展示他在广州的生活。树勋先生大人大量，说你和唐克玩去吧，和社科院谈话的事我一人去就行了。后来广州的公事几乎都由刘先生一人包了。谈话间广东省社科院来人接我们，见面就说，李一哲放出来了，现住省委招待所东湖宾馆。我一听就来劲，想去找他们，但树勋先生碍于公务身份不便前往，便商定由唐克陪我以个人身份去会李一哲。

文革中的李一哲也曾名动京城。他们的大字报在北京广为流传，以其思想开放、言辞犀利、辩才无碍而受人喜爱。第二天下午，和唐克约好见面，他带我去了东湖宾馆。天阴沉沉的，在宾馆门口和站岗的士兵稍费了些口舌，等我拿出盖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红印的介绍信，才放我们进去。李正天、王希哲、陈一扬(李一哲就是三人名字中各取一字拼成)三人住在一座二层的灰色楼房里，楼道很暗。他们的房间约二十平米，摆着四张双层床，靠窗一张二屉桌。说是招待所，比起号子里也好不到哪儿去。屋子很暗，我们敲门进去，三人显出吃惊的样子。待我自报家门，屋里才有了活气儿。李正天身材不高，头大，脖子短，毛发稀疏，前额宽阔，大眼镜后面一双慧眼，外表有点像列宁。说话声低，吐字很慢，谈话间会偶尔站起来走几步，旋即又坐下。是个沉静的思想家。陈一扬自始至终在上铺没下来，大半时间躺着。人极消瘦，暗黑色的脸，整个一广东农民。他在监狱里受尽折磨，身子搞垮了，偶尔插话也是气微声低。王希哲是三人中唯一显得生气勃勃的人，不停地动，时而坐下，时而站起，讲话中气充沛，慷慨激昂，挥手顿足。他脸上棱角分明，高鼻、阔嘴，秀眉丽眼，模样相当俊秀，惟下颌尖削，透出几分尖刻与激烈，像托洛斯基。

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话题大得吓人，不离世界大势、中国前途、高层斗争。王希哲已经开始思考批判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顺带着对毛的继续革命论大加鞭笞，思想极激烈。李正天不大谈理论，只谈广东省委主要领导人对他们的关照。当时主持广东军政的是习仲勋。唐克静坐一旁听李一哲们高论。等我们告辞离去，问他的观感，他似对三人评价不高。以后他和李正天交往过一段，终因性格不合而分手。

第二天一早，唐克就来宾馆接我去白云山一游。天亦晴亦雨，白云山遍山滴翠，繁花满地，异香扑鼻。我们沿山路缓行，身边白云氤氲，修竹新松，错落掩映，风起处隐隐有涛声。过碧池，四围云杉笔立，池边雕栏玉砌，池中有金红色的鲤鱼数尾，游荡碧水中。唐克兴高采烈，一面指点我观赏，一面提醒着北京现时的萧瑟，显示他决定南迁的正确。我无语，见他得意，自是为他高兴。一路行来竟不遇人，惟唐克喧语回响空谷。

傍晚，唐克引我至阿棠家，阿棠是他新结识的琴友。瘦高个，文静腼腆，但一手吉他弹

得出神入化。唐克得意地说，他早晚带阿棠去北京，让北京玩琴的人见识见识。我们和阿棠坐在窄小的天井中，听阿棠弹唱。所唱多用粤语，我如听天书，但曲调一路的缠绵悱恻。唐克介绍说是邓丽君的歌。我笑唐克入乡随俗，从甲壳虫到邓丽君，照单全收。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世上有歌星如邓小姐。阿棠所唱歌中有一支给我印象颇深，问唐克，告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告别阿棠，上公交车返回白云宾馆，一阵急雨袭来。唐克说广州天气就如此，一日数晴数雨。公交车上乘客寥寥。急雨扑打车窗，水雾迷蒙中见街灯明灭。唐克与我坐在车的最后一排，他一时半刻竟已将《月亮代表我的心》连词带谱写在一张纸上，又哼唱几遍，将歌片递给我，说明天唱几遍就会了，港台歌好学。难得我从北到南一千多公里，再受教于唐克，学会一支新潮歌曲。

离穗前我执意要去看阿柳，结果仅在粉末冶金厂门口匆匆一见。她的开朗、大方、娴慧的性格让我喜欢。她拿我当自家兄弟，说现在住处太局促，不好请我去，将来总有机会，接我当贵客。我心存感念，只盼唐克收心，与阿柳花好月圆。与唐克握手道别，唐克信心满满，说，一定会回北京，我们北京见。谁想到此一别竟二十五年，再见是在巴黎。

## 八

流寓海外多年，时常想起唐克。渐渐离大陆远了，对那边的事也多疏离，惟存一点对老友的念想。后多方打听到他的电话，记在本子上却始终未和他联系。九七年新年，我试着拨通了电话，居然是唐克接的。匆匆几句问候，给他留了我的地址。不久收到他的信，仍像以往，厚厚一叠，内有他拍的照片。除了一帧为女儿唐棣所摄人物像以外，都是他拍的广告。一个盘子，几只苹果，摆成塞尚静物画的样子。这些广告照，我估计卖不出去。他的信仍然写得有趣，信中说他这么多年唯一不变的是对艺术的热爱。我有点感动。看看他拍的那些并不成功的广告，再想想三十多年前他钻在自己的小暗室里精心冲洗的风景照。在摄影技术上，没显出多少进步，在艺术表现力上，也无法比。

我给他回了信，信中难免有点怀旧的感伤，大约提起他当年远游，一路给我写信的事，也提到了大观楼天下第一长联。再接他的回信，里面又有他的手迹，重抄大观楼长联。字仍那样漂亮，但笔锋中已有岁月的苍凉。

零二年，突接唐克的信，说阿柳和唐棣参加了欧洲旅游团，路过巴黎，不日即到。我和雪问清了到巴黎的日期和住处，便去酒店等她们。在酒店大厅里坐了很久，终于见到母女俩。从阿柳脸上几乎看不出岁月的痕迹，似乎七八年在广州分手时她就是这个样子，仍然瘦小、安静，只是眉宇间多了成熟和自信。唐棣则是个小美人，穿着入时，举手投足间透出妩媚。坐在酒店的酒吧里闲聊，说起唐克，小唐棣颇对老爸不以为然，小有抱怨。我说她老爸是我的启蒙者，对我一生有重大影响。她几乎不相信，瞪大眼睛，一副吃惊的样子，撇撇嘴说：“我老爸什么也不会，对家里也不负责”。听她这么说，我心里有些不安，真想告诉她：噢，孩子，别这样说你的老爸，其实他很“负责任”。他的责任是在冰封的雪原上用青

春燃起篝火，让那些想逃离心灵监狱的人能得些温暖。你无法想象你老爸所负的“责任”，那是一种 “自由的责任”。我得益于此，并心怀感激。你老爸确实“什么也不会”，那时他只知一事，就是相信监狱之外有另一种生活，而这一事却造就了我们的整个世界。唐棣，宽容地对待你的老爸吧，他或许不合你的要求，但他曾创造了自己“真实的生活”。好孩子，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你们的时代刚刚开始。然何者为佳，只有神知道。

零三年，唐克要来巴黎了，来看看这座“宛如一朵灰色的玫瑰，在雨中盛开”的城市。我和雪去酒店等他。见唐克从旅游大巴上下来。我们远远看他，正热热闹闹四面招呼着，想必一路又俘获了那些大姐的心。我叫他，他回头看见我们，一脸的笑，眼睛都眯上了。晃着身子走过来，还是老样子，只是肩上没有了那把老吉他，换了一架老相机，镜头后面的折箱已磨出白痕。这种款式的相机，怕只能在巴士底狱广场周围那些卖古董相机的铺子里才能见到。我随口问他哪里找来这么个古董，他立即给我讲了个故事。说这架相机是七六年天安门事件时江青特批从德国进口的“蔡司”机，专为拍那些“暴徒”。一共进口了两台，都归公安部专用。现在一架存档了，另一架就在他手上。目前他供职于“广州科学技术园区”，专负责摄影，所以必须用这种“顶尖”的相机。我有点不相信这事，但他言之凿凿，而且报出一大堆相机的数据，唬得我再不敢说话。他倒没完，抱怨萍萍的妹妹光光，说她就在慕尼黑，却不帮他的忙。原来这架老“蔡司”丢了根快门线，而蔡司公司总部就在慕尼黑，光光很容易就能找蔡司公司给他配上这根快门线。天啊，就算这是江青同志七六年在德国买的相机，如今三十年过去了，还能配上原型号的快门线？有点天方夜谭。

放下相机这件事，我们把唐克接回了家。拉拉杂杂闲聊，主要听唐克讲他在摄影方面取得的“成就”。他特意带来一张广州科技开发园区的全景照片，大约有两米长，照片上高楼鳞次栉比，一派纽约式的景象。他说马上要去昆明国际花卉博览会拍照，并随手送我两个精美的镜框，里面是蝴蝶标本。唐克说了半天，似乎就是告诉我，他已经“与时俱进”了。我能感到他平日在国内受到的压力，似乎“盛世”激流冲得他有点站不稳了。我心痛他，忙把话岔开。唉，老兄弟，我只想知道：在心里，你的日子过得可妥贴安稳？终于，我们谈起了旧日时光，唐克的声音开始低沉，缓缓地变得从容。随后便向我要一把吉他。我却没有为他准备。雪半开玩笑说，只有盈盈玩的一把儿童吉他，唐克却高兴地说“拿来试试”。这把儿童吉他在他手上，像巨人手里的一片树叶，小到不成比例。但他仍努力要调出音来，挣扎了一会，终归不能成调，便颓然放下，眼睛中流出失望。这真是我的不是，我们见面总要唱歌的啊！

第二天晚上，我们接唐克去蒙马特。这是几十年前他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名字。在这座小山上，聚集着雷诺阿、梵高、毕加索、莫吉尔扬尼、M·雅各布……。二十世纪巴黎艺术家群诞生在蒙马特，成长于蒙帕纳斯。“洗衣坊”故事就是唐克讲给我听的。我们沿着古老昏暗的小街漫步，看山下巴黎万家灯火。想象着一扇古老的门后突然走出海关职员亨利·卢梭，他笔下的潘神正吹着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忧郁的笛声飘荡在晚霞未褪、明月已升的天际。我们几乎不再说话，沉默表达着感动。走到梵高画鸢尾花的咖啡馆时，里面已经挤满了

人。找不到座位，我们就在隔壁的咖啡馆坐下，要了啤酒和咖啡。里面一位姑娘正唱，一个小乐队，两把吉他，一只架子鼓。歌是摇滚风格，节奏铿锵，声音高亢。这已不是旧时毕加索们所唱的歌，那时的蒙马特小调悠扬、诙谐，像毕加索拿来作画题的《曼侬，我的美人儿》。

唐克听着，沉默着，似乎这歌声离他很远很远……再看他眼神，有点迷茫，或许这蒙马特的氛围带他回青年时光。姑娘唱毕，我们酒也喝完了。已是深夜，该走了。唐克起身，突然问我可否把桌上的垫纸和酒杯垫带走，因为上面印着蒙马特的图片和这家咖啡馆的名字，可以留个纪念。我说可以吧，于是唐克俯下身来。仔细把垫纸折好，一折又一折，像在折起他的青春，折起他流逝的年华，然后那样细心地把折好的垫纸放进贴胸的口袋里。我们转身下山，把岁月和梦想留在身后，留在蒙马特高地上。

唐克走了，因为是旅行团集体活动，我没有去送他。纳兰词云："谁复留君住。叹人生，几番离合，便成迟暮"。既然我们生命中的快乐与悲伤尽溶化在这送往迎来中，又何必一送？

唐克，老兄弟，你如今在哪？那把老吉他是否已常悬壁上，久不作声？摘下它吧，请抚弦再歌一曲，在喑哑的歌声中有我想说的话："晚风轻轻送来，想念你的那一首歌"。

2008年7月10日初稿
2008年7月30日改定

# 跋

宾雁去了，我心痛如割，想无论如何要写点东西纪念他，此时不动笔，读书识字又有何用？于是带着稿子去布列塔尼海边，每夜灯下疾书。雪在边上，我手写一页，她便在电脑上录下一页。十天稿成，算在宾雁灵前一哭。

辅成先生去了，我彷徨无主。自初识思想，便与先生一起，或远或近，心灵上没有片刻分离。先生今天不在了，这世界变得空空的，才觉得自己的心灵的成熟远不到离师自立的程度。我不能不动笔，留下先生在我身边。

佛家常以灯喻指明破暗，以宣佛法，故《五灯会元》中说“是知灯者，破愚暗以明斯道”。而燃灯者，即指明破暗之人。宾雁和辅成先生是我的“燃灯者”，唐克兄弟亦是我的“燃灯者”，是他在我只知道政治口号的时候，教我歌唱。

承道群先生美意，把这些文字拾掇起来，集为一册，期许有助于这灯光照射久远，此是道群先生功德无量。北岛兄亦与我反复切磋书名。在此，向他们深表谢意。

汉娜·阿伦特说过：“即使时代黑暗，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照明，这种照明未必来自理论和观念，而多是源于明灭不定，常常很微弱的光。这光照来自那些男男女女，来自他们的生活和著作。无论境遇如何，这光始终亮着，光芒散布，照彻世界，照彻他们的生命”。正因此，歌德临终前会要求：“多来些光”。

书中文稿本来是写给朋友们看的，现要刊布，便请朋友们就此说几句话。于是朋友们便以宝石般的语言赠我。拿来置于书首，也算是借来一些光亮。好朋友，即使仅为了你们，写作亦是一件快乐的事，我又岂敢怠惰。是为跋。

2010年2月3日于巴黎